

芳雪疏香

吴江妇女史话

孙虹 主编



FangXueShuXiang

wujiang funv shihua

山東畫報出版社

谨以此书

献给“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设立一百周年

(1910—2010)

编委会

主 编：孙 虹

副 主 编：沈小红 李宁宇

编 委：孙 虹 沈小红 李宁宇

孙允芳 张育英 梅 静

俞 前 周浩锋

编 撰：俞 前

序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设立一百周年，也是落实2001—2010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年月里，由吴江市妇女联合会组织编撰的《芳雪疏香——吴江妇女史话》一书正式出版了，值得庆贺。

吴江，位于太湖之滨，历来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建县一千一百多年，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着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他们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女子英才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以自己的坚韧、勤勉、博爱、聪慧，在吴江的历史上留下了绚丽的华章！无论是明末时以文学成就名震全国的叶小纨和叶小鸾，还是在革命年代追求光明的张应春，无论是为了祖国的丝绸事业呕心沥血的费达生，还是在新时期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范小青和王芳，直至当代，又有一大批女性在各行各业里成为令人瞩目的铿锵玫瑰，她们理应被历史记住，值得每一位吴江人去学习和传颂。

女性，永远是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群体；母亲，是温馨的源头和最好的老师。珍爱女性，应该是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芳雪疏香——吴江妇女史话》一书以时间为序，把数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吴江涌现出的数十名优秀女性及历史事件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系统地了解吴江的妇女英才的成长和成就，了解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所具有的伟大人格，这对于今天的吴江人都是一种鼓舞和鞭策！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建设“乐居吴江”，乐居，既要物质上的丰盛，更离不开精神文化的肥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将是我们共建美好家园的一个新亮点。希望大家能从本书中吸收到一些营养，也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关注妇女事业，为共建和谐吴江作出贡献！

2010年2月

（作者系中共吴江市委书记）

目录

赵氏义修垂虹桥·····	1
沈宜修夫唱妇随·····	4
婉约诗人张倩倩·····	9
戏曲作家叶小纨·····	11
一代才女叶小鸾·····	14
女侠名姝柳如是·····	18
诗人吴琼仙·····	21
郑佩宜智救柳亚子·····	24
孙中山为之写墓志铭的倪太夫人·····	28
王母教子·····	31
杨纫兰开创吴江第一个蒙养院·····	34
近代教育的先驱倪寿芝·····	37
金松岑与《女界钟》·····	39
女中豪杰张应春·····	42

电影明星殷明珠·····	49
丽则女校·····	53
“五九”国耻纪念碑·····	56
新女性沈华昇·····	58
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	64
吴江花木兰沈月箴·····	67
倪淑英血染神仙山·····	71
南麻革命三姐妹·····	75
地下党员杨秀云·····	77
与潘玉良相伯仲的唐蕴玉·····	80
南社诗人陈绵祥·····	84
新南社社员柳无非·····	88
翻译家柳无垢·····	91
山歌女王陆阿妹·····	95
全国文教群英会代表姚梅凤·····	99
画家王雪蕉·····	102
“女相如”杨德·····	107
出版家黄宝珣·····	111
“丝绸之母”费达生·····	116
“中国板栗之母”柳鏊·····	121
吴江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徐彩珍·····	126
吴江第一个全国劳模沈宜宝·····	130
吴江第一批全国三八红旗手·····	133
全国先进小组王瑞娟小组·····	138
吴江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141

钢琴演奏家唐可·····	145
我国第一位艺术教育学博士钱初熹·····	148
著名作家范小青·····	151
梅花奖得主王芳·····	156
亚运会金牌得主梁懿·····	159
全国女子举重冠军王珠·····	161
柔道冠军王娟·····	164
巾帼农贷：助推妇女创业·····	168
玫瑰园：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172
吴江市图书馆：首个全国“巾帼文明岗”·····	175
吴江市妇联“百”字系列寻访活动·····	177
后 记·····	181
史料主要来源·····	183

赵氏义修垂虹桥

垂虹桥历来以“江南第一长桥”名闻遐迩。民国以前，吴江东门外是吴淞江和太湖的交汇口，汪洋一片，垂虹桥就横卧在浩浩的江水之上，宛如与天地相接，壮丽无比。

垂虹桥建于宋庆历三年（1043），当时是座木桥，全长千余尺，起名“利往桥”，取有利于百姓往来的意思。它是吴江境内最长的桥，其实也是江南最长的桥，因而亦称“长桥”。桥的两头建木坊，上写“利往”桥名；桥中建有一亭，称“垂虹亭”。到宋天圣年间，赵球任吴江知县，又在桥上建了松江亭，用来接待宾客，松江亭后称如归



垂虹桥旧影

吴江垂虹桥塔景



垂虹桥和华严塔

亭，就是宾至如归的意思。治平三年（1066），知县孙觉招募民工修垂虹桥时，曾将桥上如归、垂虹两亭内的百余篇题咏编成《松江诗集》。以后历朝，垂虹桥几经修建。元大德八年（1304），该桥孔曾扩建为九十九孔。泰定二年（1325），垂虹桥由木桥改建成石桥，桥中间有三个大桥孔，可以容大船穿心而过。桥的两头还建起了“汇泽”“底定”两只亭子，并各立着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垂虹亭飞檐立柱，石狮子雄伟健壮。入夜，明月当空，垂虹桥呈现出了“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的美景。在垂虹桥的修建中，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其中一则《赵氏义修垂虹桥》特别有意义。

明成化十六年（1480），垂虹桥因年久失修，倒塌现象严重。巡抚御使刘魁途经吴江，在巡视中见垂虹桥如此衰落，就命令县官重修。县官接到指令后，十分为难，因为县衙门资金短缺，一时拿不出充裕的银两来修桥。

就在知县畏难时，忽然手下人来报：有义妇赵氏愿意捐资修桥。知县闻讯，喜出望外，立即上报巡抚刘魁，刘魁就叫知县亲自上门受捐，并要大力褒奖捐资人赵氏。

赵氏为什么要动用这笔巨大资产重修垂虹桥呢？原来赵氏丈夫屠晟原在当朝为官，因病早死，留下了一笔遗产和两个儿子。屠晟临终时嘱咐赵氏，要好生抚养两个儿子，遗产作为他们将来成家立业之用。不料屠晟去世不久，大儿子也死了。失去了丈夫，长子又走了，赵氏连遭不幸，思索着日后怎么让小儿子能有所作为。

赵氏听说本县要修垂虹桥而缺少资金，就有了想法。她叫来了二儿子，说出了捐资修垂虹桥的意愿，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父亲的遗产原为弟兄两人所有，现在你的哥哥已经过世，遗产全部归你所有了，我一来怕你将来拥有如此一大笔资产，不思上进；二来想积点德，为你造福，你意下如何？”儿子点头应允了。

于是赵氏托乡里人周堙告知了知县，捐了一千多两白银。知县受捐银两后，立即组织人力修垂虹桥。垂虹桥修建工程由苏衡指挥，杨端主管，从成化十六年开始，到第二年三月完成。垂虹桥有着独步江南的特色景观，成了历代文人游历抒怀的迷人之处。明正德三年（1509）的中秋之夜，当时的吴中名人沈石田、祝枝山、文徵明、唐伯虎等为好友戴昭送行，在垂虹桥畔，祝枝山引首“垂虹别意”，唐伯虎作画，大家作诗，留下诗书画合璧。这一长卷几经辗转，现由美国收藏家约翰·M·克劳斯特珍藏。

为了褒扬赵氏义修垂虹桥的行为，巡抚刘魁指令吴江县铭刻碑记。文人钱溥为此写了《重修垂虹记》，赵氏的义举留在了史册上。



修复后的部分垂虹桥

沈宜修夫唱妇随

沈宜修（1590～1635），字婉君，副都御使沈琉之女，出生在与吴江汾湖叶氏齐名的文苑世家松陵沈氏。她自小聪明，四五岁时就能过目成诵，而且相当懂事，父母对她十分钟爱。由于家庭因素，除了父母偶尔教读外，沈宜修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世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通文墨，幼无师承的沈宜修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勤加钻研，常能“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稍长大一些，就手不释卷，显露了才华。



沈宜修

万历三十三年（1605），沈宜修嫁与叶绍袁为妻，当时只有十六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



叶绍袁

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无怪乎时人叹道：琼枝玉树，交相映带。

那一年，叶绍袁十七岁。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叶绍袁青春豪迈，工于诗词，成就了一段美满婚姻。婚后数年，叶绍袁为了科举考试，读书学馆，当时叶绍袁与堂弟叶绍颀住在一起读书，发愤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作策论之类的文章，叶绍袁每每成文，都拿

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其见解让叶绍袁心服。为了帮助叶绍袁，沈宜修还常替叶绍袁抄写其为应试所作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特别是小楷，看见的人都称赞有古时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的风格。

吴江沈氏家族是明清时期一个颇有声望的文化世家，先后诞生过文学家一百四十多人。女性人才辈出，在诗词曲文各个领域内成绩斐然、作品林立，先后有二十七位女性作家有诗词及戏曲作品流传。她们分列于沈奎六世到十世五代人中间，其中六世九人：沈大荣、沈宜修、张倩倩、李玉照、顾孺人、沈倩君、沈静专、沈媛、沈智瑶；七世十一人：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叶小繁、沈关关、沈静筠、沈宪英、沈华鬋、沈淑女、沈蕙端、周兰秀；八世四人：沈树荣、沈友琴、沈御月、沈菴纫；九世二人：沈咏梅、金法筵。十世一人：沈绮。她们分别是沈氏家族的女儿、儿媳、孙女、外孙女，以血缘和婚

姻为纽带，形成母女诗人、姐妹诗人、从姐妹诗人、妯娌诗人、姑嫂诗人等，具有显著的家族性特征。

沈宜修成亲后，丈夫叶绍袁在科举考试中却并不顺利。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沈宜修一方面节约开支，勤俭治家，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补贴家用，日子过得很清贫。叶绍袁在沈宜修的支持和鼓励下，于明天启五年（1625）金榜题名，取为进士，走入仕途。叶绍袁在京城做事，沈宜修在家里，常常牵挂和思念丈夫。曾在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在薄雾笼罩的庭院中，带着伤感，写下了婉雅的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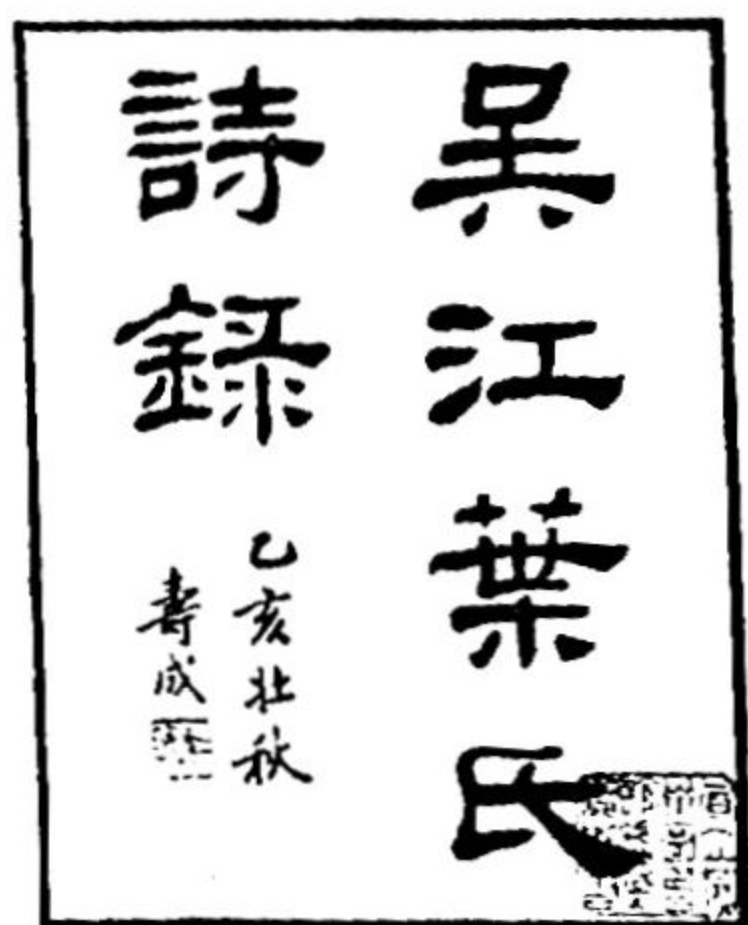
叶绍袁当官后初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二年再改工部主事。他为官清廉，后来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以母老为由告归，回到家里，隐居汾湖。

叶绍袁与沈宜修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袁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叶绍袁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作了八首和诗，其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其第一首中有“地是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黛，曲小可浮杯”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萧洒，一枕莞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沈宜修伴随丈夫，读书吟诗。有一次夫妻俩在灯下诵读鲍照的《愁苦行》，叶绍袁想起自己的身世，面对贫困的现状，不由感慨万千。沈宜修深知丈夫心中的想法，就劝他说：“不必为贫苦愁恼而忧伤，文中自有欢乐在，何须再去留恋那种惊心动魄的官场生活。”

叶绍袁夫妇从此就在文学中寻找乐趣，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们的言行也熏陶了子女，全家醉心文学，歌咏唱酬，过着穷困而理想

的生活。沈自徵在《鵬吹集序》中这样描写姐姐沈宜修：“生平钟情儿女，皆自为训诂，岂第和胆停机，亦且授经课艺。当夫明月登台，则箫史共赋；飞霞集户，则谢女呈篇。”谢女呈篇，彩蝶绕膝，这是沈宜修最舒心的时候，三个女儿作了《题疏香阁》的诗句，自然要让母亲评论指点一番。高兴之余，沈宜修亦和了三首。



和长女昭齐韵：

叶氏书影

旭日初升幌，瞳胧映绮房。梨花犹梦雨，宿蝶半迷香。轻阴笼霞彩，繁英低飘翔。待将红袖色，帘影一时芳。海棠还折枝，拂镜试新妆。新妆方徐理，窗外弄莺簧。

和仲女蕙绸韵：

远碧绕庭色，参差映日明。竹间翠烟发，竹外双鸠鸣。径曲繁枝袅，嫣红入望盈。博山微一缕，烟浮画罗生。芳树清风起，飘飘落霞轻。

和季女琼章韵：

几点催花雨，疏疏入画楼。推帘望远墅，烂锦盈汀洲。昨夜碧桃树，凝云缀不流。朝来庭草色，挹取暗香浮。飞琼方十五，吹笙未解愁。次第芳菲节，琬琰知未休。

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书香门第中，纨纨、小纨和小鸾三姐妹琼映玉辉，花萼相鲜，颖藻风飞，惊才玉立。

他们的名声留在了历史上，叶绍袁夫妇和儿子叶燮、女儿叶小纨、叶小鸾一家五人被录入了《中国名人大词典》，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

婉约诗人张倩倩

张倩倩是明末吴江女诗人，沈宜修的表妹。《词苑丛谈》中收录了她的词作《忆秦娥》：

风雨咽，鹧鸪啼破清明节。清明节，杏花零落，闷怀千叠。情惊依旧和谁说？眉山斗锁空愁绝。空愁绝，雨声和泪，问谁凄切？

这首词情调凄切，令人泪下，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悲凉和诗人对丈夫的依恋思念之情，后被选入1983年版的《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

沈宜修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沈琬又宦游在外，所以沈琬将自己的妹妹也就是张倩倩的母亲接回家来，照顾沈宜修。姑姑对沈宜修疼爱有加，视如己出。张倩倩也与沈宜修朝夕相处，成为闺中密友，直至沈宜修出嫁汾湖。

张倩倩与沈宜修的弟弟沈自徵成婚。沈家是个大家族，丈夫也是个才子，曾写过《渔阳三弄》，在明代杂剧史上颇具名气，与徐文

长并传。闲暇的时候，她会填一些小词，给沈自微看。沈自微细细地评点着，笑着露出赞赏之意。但她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把它丢在火上焚了。因近亲结婚，生育的三女一子都早夭，因此夫妇间感情大受影响。沈宜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沈宜修的第三个女儿叶小鸾出世后，她希望这个孩子可爱的笑脸能弥合弟弟与弟媳之间那道隐隐的裂痕。那年暮秋，把叶小鸾抱进了张倩倩家。

张倩倩把叶小鸾当作亲生孩子一般看待，不但呵护宠爱有加，还常常教育叶小鸾读书识字、课读诗文。小鸾寄育的第二年春天，沈宜修去看望父亲（小鸾的外公）时，张倩倩对沈宜修说：是儿（这个孩子）灵慧，日后当齐班（昭）蔡（文姬），姿容也非寻常人可比。张倩倩因而对小鸾的教导格外上心。叶小鸾在舅母的照料下，很早就显露了不凡的才情。

张倩倩虽才貌双全，然生计艰辛，终年抑郁不堪，三十四岁就离开了人世。她作的诗词少有存稿，故作品传世不多。沈宜修为其作传，谓其才情不在李清照之下。

戏曲作家叶小纨

叶小纨（约1613~?）字惠绸，江苏吴江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卒年不详。

叶小纨是叶绍袁、沈宜修的二女儿，家学渊源，翰墨环境，自身的素质和勤奋精神，造就了一代才女。叶小纨自幼聪颖过人，四岁能背蔡琰的《悲愤诗》和白居易的《琵琶行》，十岁就能吟诗作对填词曲。一次母亲让她以词、曲牌名作对，她一口气说了“一斛珠；满江红”、“点绛唇；剔银灯”、“天仙子；虞美人”、“金缕曲；桂枝馨”等七八副对子。父亲一旁笑道：“吾儿当为易安（李清照）矣！”

明代时，吴江戏曲家沈璟与当地的一批曲家形成了明代戏曲的“吴江派”，与同时期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对立，相互探讨，使明代戏曲创作一时兴盛。后来“吴江派”演变流传而称为南曲，也即是现在昆曲的先导。叶小纨的母亲沈宜修是沈璟的侄女，因而叶小纨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叶小纨由父母作主嫁给松陵沈永楨，沈永楨是沈璟的孙子，为她作曲填词提供了优越条件。



叶小纨

1632年，小妹叶小鸾、大姐叶纨纨因多病先后夭折，叶小纨血泪千行，肝肠寸断，伤感之余展纸挥毫，著成杂剧《鸳鸯梦》，以为追念。她创作的《鸳鸯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戏剧家，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的地位。

《鸳鸯梦》一剧写了蕙百芳、昭綦成、琼龙雕三书生金兰结义、生离死别的故事。实际写的是她们姐妹三人难分难舍的手足之情。“蕙”、“昭”、“琼”分别是叶小纨、叶纨纨、叶小鸾字号的头一个字，年龄也相符合。开头从西王母因三侍女尘缘未断，谪罚她们下凡写起，下分四出：第一出写中秋佳节三好友同游凤凰台；第二出写蕙百芳苦苦思念昭、琼二友；第三出写传来琼龙雕病逝的噩耗，蕙百芳赶去吊丧，正在抚棺痛哭之时，又听到昭綦成因悲痛过度而身亡的丧音，蕙百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第四出写琼、昭二友死后，蕙百芳从此“逍遥云水，访道寻真”，经吕纯阳指点，醒悟到“人生聚散，荣枯得失，皆犹是梦”，终于回头重新与昭、琼相聚，同回瑶

池，全剧情节生动，结构井然，词情并茂，音律和谐，满纸血泪，凄婉动人，故有“殊清警拔俗”之评。杂剧收笔后即受到江南文士的评点称道，一时争相购读，海外亦有流传。

她的舅父、明代戏曲家沈自微说：“词曲盛于元，未闻擅能闺秀者；蕙绸出其俊才，补从来闺所未有”，称赞小纨才气开女子创作戏曲之先例。她的公公评其作品“俊语、韵脚不让酸斋、梦符，即其下里，亦犹是周宪王金梁桥之声，”虽赞誉偏高，但这位女剧作家确实具有相当的文学造诣，使贯云石、乔吉望尘莫及。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该剧也有中肯的评论：“叶小纨《鸳鸯梦》，寄情棣萼，词亦楚楚。惟笔力孱弱，一望而知为女子翰墨。第颇工雅。”叶小纨所处之时代，使她居于阁闺之内，其作品难脱脂粉气，又缺乏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取材内容较为狭窄。即便如此，叶小纨作为一名首创杂剧的女作家，仍有其应具的地位，并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视。日本学者八木泽元君于1959年在东京出版了一部《明代剧作家研究》的专著，全书共有九章，书中专辟一章（第九章）研究介绍了叶小纨，这一章中分“叶小纨一家”、“作品”、“年谱”，以及“《鸳鸯梦》杂剧”等篇，并附有叶小纨诗辑。崇祯年间，《鸳鸯梦》和她的诗集《存余草》都被她的父亲叶绍袁收入《午梦堂全集》。

叶小纨三十四岁寡居，诗作极多，晚年选了其中的二十分之一，编为《存余草》，但未能留存。

一代才女叶小鸾

叶小鸾（1616~1632），明末吴江女诗人，叶绍袁和沈宜修的三女儿。叶小鸾刚满六个月，就被舅母张倩倩接过去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

叶小鸾在舅母的照料下，很早就显露了不凡的才情，四岁时就能背诵《离骚》及万首唐人绝句，终卷不遗一字，而且还能略知其含义。舅母教其识字，过了几天考她时，故意写了错别字来让她识，小鸾也能辨别出来，对舅母说，这个字弄错了，舅母是不是误写了？让舅母越加怜爱。七岁时，叶小鸾已能赋诗作对。

叶小鸾十岁时，那年回家正是秋末冬初，她与沈宜修在灯下夜坐，门外风吹竹林唦唦作响，帘前月光如水。沈宜修偶然出了一个对语：“桂寒清露湿……”，叶小鸾当即接口说：“枫冷乱红凋。”沈宜修十分高兴，认为她有谢道韞“柳絮因风起”的才思。

长到十二岁，身材颀长的叶小鸾面前的头发已覆盖了面额，姣如玉人。这一年，叶绍袁授南京武学教授，全家迁居南京，叶小鸾随同父母一起来到古都南京。南京地势险要，做过几朝都城，气势雄伟，



叶小鸾

有虎踞龙盘之称，长江万里奔腾而下的宏阔气象，钟山高耸入云的磅礴之势，十里秦淮河的繁华烟水，风格变化的殿宇楼台，无不使初出家门的叶小鸾感到外面世界的精彩纷呈。历代诗人笔下的不同的南京城，那些已然逝去的人物和故事，尤其是与诗歌有关的传说，都使小鸾怦然心动，想着要用自己的笔来描写她所见到的南京，写出自己的感受。于是，在览长干桃叶、阅黄沙白草之际，由父母教授作诗之法，聪慧的小鸾学过之后，即开始尝试着自己作诗。在南京的这段日子，小鸾作了不少的诗。少年能作诗已属难得，少女作诗在当时更加少见，在叶绍袁处见到小鸾诗歌的文人、士大夫都啧啧称奇，纷纷把诗作录下来带回去，小鸾的诗作便在南京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可惜，这些在南京学写的诗作，后来无一存留，母亲沈宜修作了这样的推测：“想是小时语未工，儿自弃去邪。”

叶小鸾十二岁时，就曾吟成《春日晓》这一五言绝句：“揽镜晓

风清，双娥岂画成？簪花初欲罢，柳外正莺声。”早上起来正在梳妆的少女，听到屋外黄莺的鸣叫，连梳妆都没有心思了，活泼泼地写出了少女的心态，清新的少女形象如画。一个刚学诗的小姑娘，写出了这样生趣盎然的诗句来，令人惊叹，连父亲叶绍袁也赞道：“初学遂有此等句，真是夙慧，岂在垂拱四杰之下。”有一年与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回家时舅舅沈自炳送了她一首诗，其中有“南国无双应自贵，北方独立讵为惭，飞去广寒身似许，比来玉帐貌如甘”之句，但这些都不是她所喜悦的。

明末，佛教盛行，小鸾十三岁那年，曾随母亲和祖母到杭州天竺敬香，礼拜观音大士，路过西湖，当时夕阳在山，暝烟笼树，小鸾感而赋《游西湖》五绝一首：“堤边飞絮起，一望暮山青。画楫笙歌去，悠然水色冷。”人们到杭州西湖，总要感叹西湖的繁华，小鸾却不羨西湖的浓抹，只爱西湖的淡妆。她欣赏的是堤边的飞絮，注意到的是泠泠的水色，令父亲叶绍袁惊奇不已：“十三岁女子，不喜繁华，而喜笙歌去后之水色，清冷凄凉之况，超凡出尘之骨，已兆此矣。”

由于生活贫困，为求生计，舅舅沈自徵决计仗剑北游，叶小鸾牵着舅舅的衣服问何时归来，让舅舅黯然。沈自徵入京城谋职后，留下张倩倩独守空房，张倩倩把全部心思都化在了叶小鸾身上。

张倩倩亡故时，叶小鸾已回到父母家中，听到张倩倩的死讯，叶小鸾哭得死去活来，悲痛之极，写下《己巳春哭沈六舅母墓所》一诗：“十载恩难报，重泉哭不闻。年年春草色，肠断一孤坟。”

叶小鸾勤奋好学，琴棋书画样样会。她喜幽静，每天练书法，临王子敬《洛神赋》或怀素草书。十六岁的时候有族姑善琴，略为指教，她即通数调，清泠可听。家有画卷，即能摹写。有年夏天，



叶小鸾手植的蜡梅树

她舅舅沈自炯寄给母亲一把画扇，叶小鸾就仿着画起来，画得很相似。叶小鸾不分寒暑，静坐北窗，一炉幽香，与琴书为伴。沈宜修曾这样夸她：“你不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少年朋友。”她长得很美，但不喜欢被人称赞。一次，她父亲开玩笑地说她有绝世之姿，她不高兴地说：“女子长成倾城之色又有什么用？父亲何必把这个加在女儿身上呢？”她认为女子光长得漂亮是没有用的，只有真才实学才是立身

之本。

叶小鸾与昆山张立平订婚，临近婚期，其父因家贫，四处借钱，焦愁不安。她说衣粗布裙，普通人都是这样子，父亲为何还要劳苦地奔忙？很可惜这个思想高洁、品性不凡的奇女子，竟在离结婚只有五天的时候病逝了。

叶小鸾虽然只活了短短的十七年，但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却很丰富，以至于曹雪芹在写《石头记》中的“黛玉”时也留下叶小鸾的影子。清晚期“诗坛第一人”袁枚也因叶小鸾的“眉子砚”收藏于广东陶绥之手，而在《随园诗话》中将叶小鸾写为粤人，由此而成文坛的一段公案笑谈。她与班昭、蔡文姬、李清照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才女。

女侠名姝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影怜，后改姓柳，名隐。后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她是浙江嘉兴人，幼年被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自小才华横溢。柳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书法笔法像虞世南、褚遂良。年稍大，流落青楼，成为秦淮八艳之首。



柳如是

柳如是曾经与南明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友好，特别与陈子龙情投意合，但陈子龙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氏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向她求婚，她都看不中。崇祯十四年，柳如是二十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谦益娶柳如是后，为她在常熟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

柳如是处在明清交替的时代，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

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自尽以保存节气，并愿陪他一起去死。钱谦益假意应允，与柳如是一起坐着小船到了尚湖，商定投湖殉国。船在尚湖上游荡，眼看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钱谦益仍没有动静，只是凝视着湖边的风光。两人相对无语，最后钱谦益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见他这等模样，忽然转身，独自奋身要往水里跳，却给钱谦益硬拖住了。

看到平日里满口豪言壮语的钱谦益，关键时刻却贪生怕死，柳如是气恼万分。回家后，她又为钱谦益准备了刀子和绳子，让他要么自刎，要么自缢，说这样才能保住忠臣烈士的名节。可钱谦益就是不依。五月份，多铎兵抵南京，钱谦益率先出降，并代为招抚江南。

钱谦益做了清朝的礼部左侍郎，柳如是决绝地与他分了手，到苏杭一带云游，去拜访她的姐妹和故友。钱谦益在北京尝够了亡国奴的滋味，后来推病回到了故里，柳如是闻讯也回来了，两人算是和好了。这场事变，倒是折腾出钱谦益几分血性来，他开始积极参与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去，家中资产几乎用尽。顺治五年，钱谦益因抗清被株连被捕入狱，柳如是正病在床，跃然而起，冒死随夫从行，并自认资助反清之罪，愿替丈夫受死，但官府不信，只关押钱谦益。钱家一族无人敢出头，儿子吓得缩成一团。柳如是变卖家产，赶至北京，各处打点，三十万两银子用尽，一月后，钱谦益无罪释放，柳如是去接他，钱谦益失声痛哭。

此后，钱谦益与柳如是一起为抗清酬资觅饷出谋划策，才彻底消除了两人之间的芥蒂。夫妻两人在频繁的秘密活动中结识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和反清斗士黄宗羲。一天夜里，钱谦益到了黄宗羲住的地方，拿出了七锭黄金，对黄宗羲说：“这是我夫人相赠的钱，她怕我不敢

前来计议抗清，所以用资助的名义，催我夜访。”

后来，柳如是、钱谦益又与一支抗清队伍的首领姚志卓接上了关系。一天夜里，姚志卓一个人来到了钱府，诉说了他的困难。原来在一场血战中，他的水军被



柳如是墓

强大的清军偷袭，三千壮士死伤一半，一百条战船片帆不留，残部在海滩芦苇丛中忍饥受冻，季节已经进入了冬天，他们连棉衣都没有穿上。柳如是听后，立即拔下了头上的金簪，摘掉耳上的玉坠放在桌子上，凄然地对姚志卓说：“江山沦落，国家不保了，我还有什么心思穿金戴玉？”接着，她又将家中仅存的一些金银珠宝装了箱子，选了十几名精壮的庄丁，当夜送姚志卓去找队伍。

半年以后，姚志卓的水军又在海上出现了，这支队伍英勇善战，抗击清兵，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队伍扩大到了七八万人。后来，在攻打崇明岛的战争中，姚志卓中箭身亡，队伍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郑成功，一直打到了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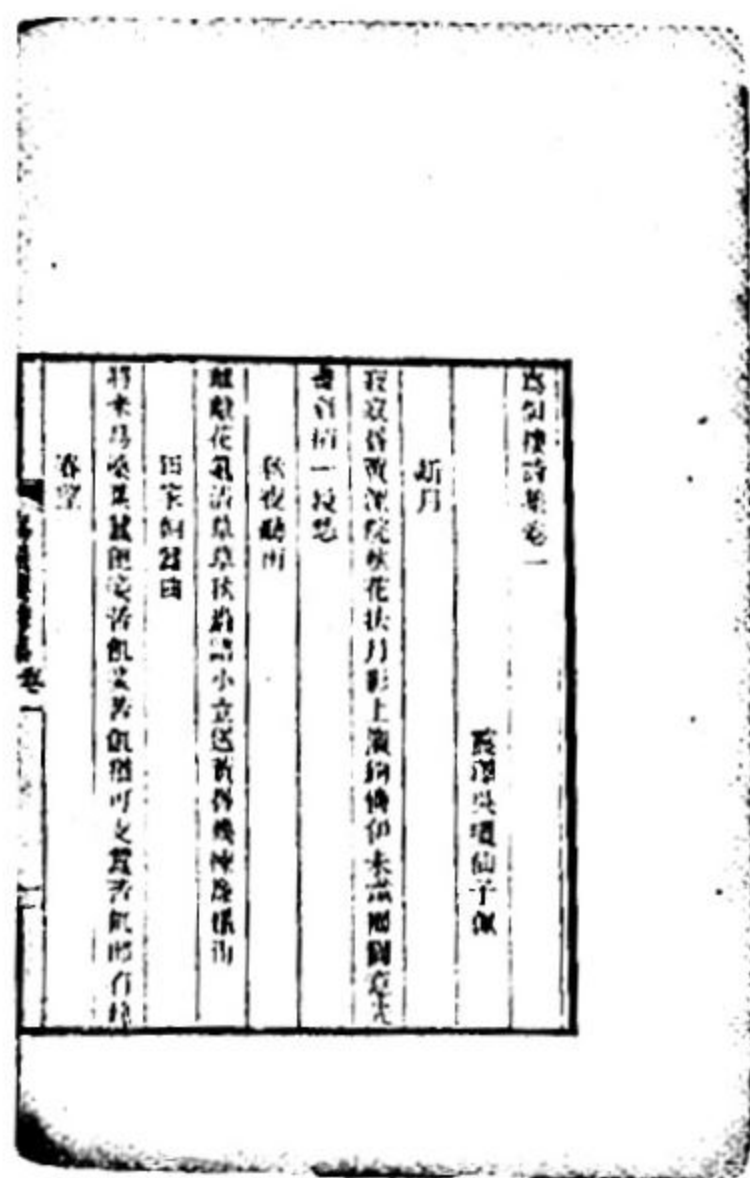
柳如是作为一个女子，助资反清，以自己的人格节气，得到后人敬重，大史学家陈寅恪在晚年花大力气写了一部奇书《柳如是别传》，称她为“女侠明姝”。

诗人吴琼仙

黎里镇黎花街徐家弄有写韵楼，为清代中叶著名女诗人、画家吴琼仙（1768～1803）的书斋。

吴琼仙，字子佩，号珊珊，平望镇人，幼年在家塾读书，爱好诗文。后来嫁给黎里人徐达源。夫妻感情非常好，可以称得上天造地设，当时的人很羡慕，有个叫陈基的写过一首《呈珊珊夫人》诗：“公然新妇嫁参军，清福修来海样深。论到新诗开笑口，提将春梦替酸心。解围客避青绫帐，写韵簾垂碧柳阴。好似彩鸾重降世，忍寒扶月夜听琴。”

比一般才女所幸运的是，吴琼仙婚姻生活可谓温馨美满，从出嫁到去世，其间只有徐达源在京城做官离别索居，其他都在弹琴赋诗、焚香读画度光阴。他们之间那种夫妻



吴琼仙遗集

和美、家庭圆满，相敬如宾、夫唱妇随，曾在当时传为佳话。

文学家袁枚在乾隆五十年（1785）来徐家小住三天，见徐吴夫妇“天机清妙”，就双双收为徒弟，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有如下记载：“余过黎里，诗人徐山民邀余住在其家三日，率其妻珊珊夫妇双拜为师。二人谋天机清妙，已分别同人集及弟子集中矣。又见山民寄内云心随书至，何嫌十里之遥船载人归当在一更以后榻见倡随风致，有刘刚夫妇之思。”袁枚把徐达源、吴琼仙夫妇比作了同道成仙的刘刚夫妇。

吴琼仙又以性情婉淑，很得翁姑欢心，常奉太夫人之命在家乡附近的山水清绝的地方游历，泛舟莺脰湖，落履虎丘山等，因而她的诗富有江南柔山软水之情，她的《莺脰湖诗》，写尽了莺湖风光：“湖光十里碧粼粼，画出江南二月春。逢着桃花依要间，此中可能避秦人。近水人家先得月，垂杨时节未闻莺。徐枕旧馆分明是，何处东风第一人。”

芦墟人文学家郭麐与姚鼐、袁枚最为知己，也很敬佩吴珊珊，他在《樗园消夏录》中曾有过如下描述：“吾乡闺秀能诗者宜秋夫人而外，有吴珊珊琼仙、袁柔仙淑芳。珊珊为徐君山民之配，山民刻意为诗，闺房中自相师友，清丽之词入其家《玉台集》中，亦当不愧。柔仙为汀湄笙生之妹，陈君秋史之室，答大雷之书，传谢家之学风，美流发其来有，自与珊珊居近论茗过从，论诗谈艺亦闺中美谈也。”

吴琼仙三十六岁英年早逝，但她的《写韵楼诗集》却将她的英灵流芳千古。她的《写韵楼诗集》由沈璟作序，吴江出过二个沈璟，同名同姓。一个沈璟出生于1553年，卒于1610年，字伯英，号宁庵，唤号聃和，别署词隐生，明吴江松陵人，精研曲律，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戏曲创作流派“吴江派”。另一个沈璟出生年月不祥，卒于1816年，字树亭，亦作树庭，号云集。为吴琼仙《写韵楼诗集》作序的应

该是后一个沈璟。

沈璟在序中对吴琼仙的诗作了如下评价：“写韵楼诗集不吟绮语，不作壮语，花前月下，泠泠清清，一句一字，皆从肺腑流出，譬之光音天人，未食地肥积雪，满林明漪见底，有真情存焉者也……。”

写韵楼诗集在吴琼仙逝世后刻印，刻板后，当地名流纷纷提笔为其题咏为吴琼仙哀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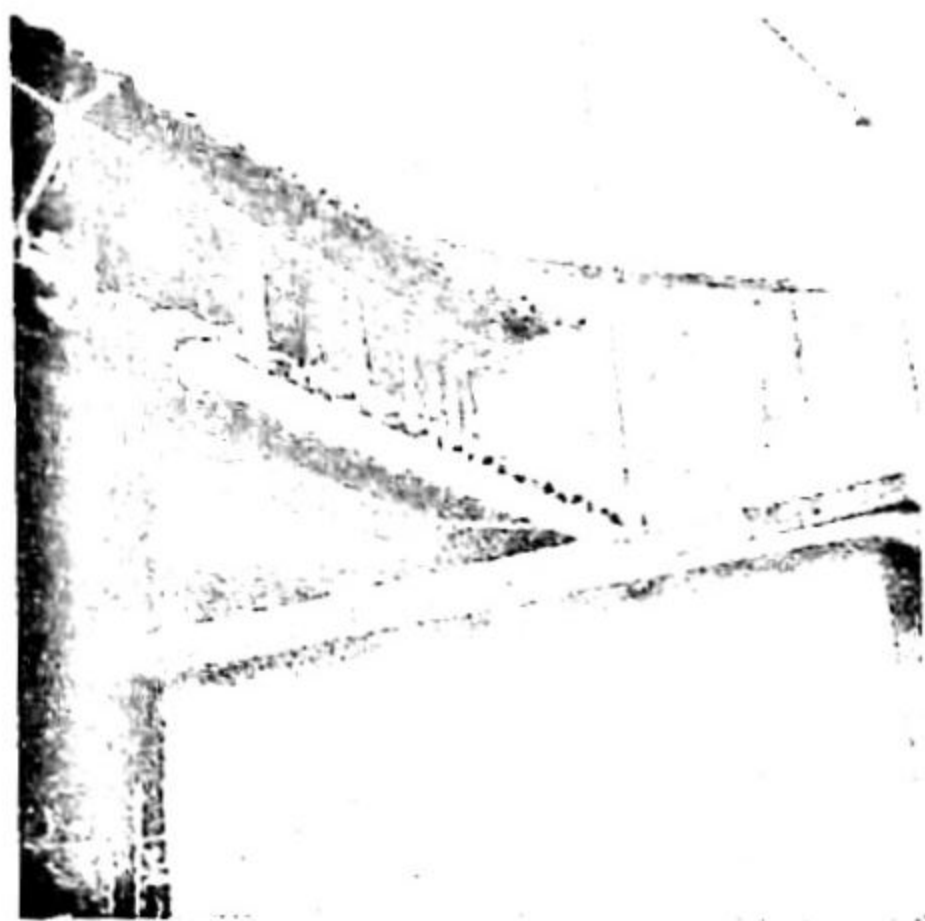
赵翼：“一卷兰苕点笔成，清才值得被它卿，若非萧史亲传出，谁识奏楼引风声。醜挑咏絮也清新，未便能惊贺季真。今日麻姑坛下拜，始知世有女仙人。……”

杨复古：“九天咳唾，珠玉随风堕。引凤箫吹锦瑟和，领取绿窗清课。彩鸾写韵家风，闺房秀出江东。何以南州都讲，西河一瓣香供。”

洪亮吉：“人间奇福都曾占，郎是兰成，妾是双成，读书敲诗岁屡更。三生慧业终难昧，写韵前生，用韵今生，尚剩灵根付再生。……”

写韵楼上，吴琼仙写出了《写韵楼诗集》，《写韵楼诗集》也使写韵楼成了当地名胜。人们经过这里，就会想到《写韵楼诗集》，想到吴琼仙，于是，也会涌出勃勃诗情。郭氏过写韵楼，见壁间画兰团扇，怀念吴琼仙发出了如下感慨：“含墨空斋有所思，瑶华何处寄相思，露条雨叶江皋路，愁绝烟螺澹扫时。”

吴琼仙不仅作诗还能作画，曾经画了自己的小影刻在石头上。当年平望平波台上，曾有陆鹤臞书写并刻石的吴琼仙《写韵楼诗》，也是后人对这位才女的纪念。



吴琼仙住过的写韵楼

郑佩宜智救柳亚子

郑佩宜（1888～1962）出生于盛泽镇的一个经商家庭，幼年丧母，父亲郑慈谷，字式如，清朝末年组建盛泽商会，出任商会会长兼办文案。郑式如在家中创办郑氏小学只招男生，她只好隔着门听课。十六岁时，受新思潮影响，决心放足，为了不违祖母意，只好白天裹足夜晚放足，终未成为“三寸金莲”。十九岁与柳亚子结婚，从此患难与共，成为终身伴侣，并加入了南社。



郑佩宜

戊戌维新后，为了拯救国难，开发民智，郑慈谷让出居宅，拿出积蓄，招聘贤能，在家中大厅创办了盛泽第一所学校——郑氏小学。儿子咏春、桐荪在此就读。郑氏小学张榜招考新生，里中子弟争赴就读。佩宜听到二位兄长在大厅琅琅的书声，非常羡慕，常常伫立在一边捧着书本旁听，放学后再请哥哥们转教。郑佩宜生性聪慧，几年下

来，粗通文墨，还学到了一些英语知识。

1906年10月19日，柳亚子与郑佩宜在盛泽郑宅举行了吴江破天荒的“文明结婚”。大凡结婚，只要不是赘婿，婚礼总是在男家举行，可柳亚子的婚礼却偏偏在女家。吴中旧俗，新娘头上得戴一种翠珠装饰的“头面”，盖上四方红巾，这方巾直到洞房里才能由新郎揭掉，俗称“挑方巾”。新郎新娘要在红毡毯上行三跪九叩大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再夫妻对拜，参拜结束。新郎用一根红绸带将新娘引入洞房，其间的繁文缛节还有很多很多。柳亚子与郑佩宜的婚礼不用跪拜，只是鞠躬。柳亚子身穿长袍马褂，郑佩宜不戴头面，不盖四方红巾，身穿红色衣裙。婚礼开始，一对新人同时向长辈行三鞠躬礼，然后互相三鞠躬，礼毕赴宴。这文明婚礼开了全县风气之先，人们争相观看，门庭如闹市般拥挤，此举轰动了全镇，也震动了整个吴江。

婚后，佩宜对丈夫生活上悉心照料，政治上多有帮助。柳亚子到上海、广州、南京雅集或开会，乃至亡命扶桑，避难香港，她都随夫君相随相依。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以国民党左派著称的柳亚子先生亦被列入通缉黑名单。同年5月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接到密报，柳亚子、郑佩宜夫妇已从杭州回到黎里，于是，命令驻守苏州的十七旅旅长张镇，迅速捉拿柳亚子。当天晚上，张镇派出一队士兵，乘坐汽艇，驶往黎里。

汽艇到达黎里已深更半夜，国民党士兵将柳宅前后围住，用枪托猛烈砸门。柳亚子的胞妹柳公权被砸门声惊醒，她手持烛台，正想去看看哥哥、嫂嫂，但见卧室内烛光明亮，她嫂嫂郑佩宜十分镇静地在唤她哥哥柳亚子起床。这时，砸门声越来越激烈。郑佩宜与柳亚子耳



郑佩宜与柳亚子（国画）

语几句后，就吩咐几名佣人持烛台前行，自己领了柳亚子，离开了卧室，来到了第五进楼房西首第一间。这间房的西片墙，有一间狭长形的复壁，“复壁”俗称“密室”，郑佩宜让柳亚子藏身复壁，再吩咐佣人移几幢箱子把复壁的小门挡住，不露一点痕迹。随后，郑佩宜回到卧室内，叫侍女阿吟和她同睡，又叮嘱女儿无非和无垢，睡在床上不要起来。

突然间“轰”的一声，大门被撞开了，国民党士兵蜂拥而入，指名要捉拿柳亚子。当士兵搜查柳亚子夫妇卧室时，只见床上睡着两个女人，就逼着郑佩宜说出柳亚子的去向。郑佩宜沉着地回答：“不在家里。”就不再理睬他们。有的士兵搜查柳亚子两个女儿的卧室，想从她们口中知道柳亚子的下落，可是这两个十多岁的姑娘很聪明，只冷冷地说：“不知道。”

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叫：“柳亚子在这里！”楼上的士兵闻声冲下来。一个士兵冲着一个长袍的男子喝问道：“你是柳亚子？”这人被吓得期期艾艾地说不出话来。另一个士兵认为不错，他是“哑子”，

而要捉的正是“柳亚子”，就不由分说把那个男子带走了。此人确实不是柳亚子，而是柳亚子的妹婿。

柳亚子幸得夫人机智，藏身复壁，得免于难。数日后，他们全家东流，避难日本。

郑佩宜随同柳亚子结识何香凝、经普椿等知名人士，拜会毛泽东、周恩来等政坛领袖，风云际会，堪称女中英杰。郑佩宜五十八岁寿辰那年，柳亚子特地为她撰诗二首，其中第二首：

怀抱平生马克思，最难燕妮共艰危。苍生满眼成何济，青史他年已有辞。

黻佩未能偕负载，风云还拟仗鎡基。何当奋我垂天翅，安稳双栖到凤池。

在诗中，柳亚子说自己崇信马克思，把佩宜夫人比作燕妮，充分表达了对夫人的恩爱、敬重和感激之情。

孙中山为之写墓志铭的倪太夫人

陈去病（1874～1933）出生时，他的父亲陈允升已经在当年夏历二月初三去世，是个遗腹子，没出生几天，就由生母倪太夫人抱着回到了吴江同里镇的陈宅大院。

倪太夫人是元代名画家倪瓒的后裔，继承了倪瓒的血脉，她很早就通晓大义，熟悉礼仪，并且也懂得诗文。陈去病由倪太夫人抚养长大。倪太夫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对陈去病的一生有很大影响。

陈去病五岁起，倪太夫人就安置了书桌，开始亲自教他识字读书。到了陈去病七岁的时候，为了让陈去病受到正规的教育，倪太夫人就在陈家设立了私塾，专门请老师，并且安排族中的弟子与他伴读，他从这时开始，学习《史记》、《汉书》等。

陈去病自小性情躁急，负气慷慨，倪太夫人就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经常给他讲述做人要忍耐的道理，用“大苏氏能忍”说法开导他，使他佩服。后来，就根据这意，又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佩忍”。

由于祖上的影响，倪太夫人很喜欢名家的书画，当时同里有个

名画家叫陆恢，寓居苏州河沿街。陆恢精通书画，后来曾被吴大澂聘任湖南巡抚府。倪太夫人通过人介绍，到陆恢的处住，带了陈去病的文章和书法作品去求教。陆恢见陈去病年少好学，十分喜欢他，殷勤地指点帮他，还亲自为陈去病作了画。这使陈去病大开眼界，在文章和书画上大有长进。

由于陈去病的父亲、叔父去世早，没有男人在外赚钱，陈家日常的生活只能靠祖传家产来维持。倪太夫人就经常对陈去病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她经常告诫陈去病目前国运维艰，家庭困难，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不要有非分之想。

一天，她把陈去病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读‘素衣将敝，豆粥难求’之语，知九重流离困苦如此，吾侪幸安居饱暖，又妄求非分，恐祸及之矣”。“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出自记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光绪等人西狩的事件。她说的意思是：当她读到“素衣将敝，豆粥难求”的句子时，知道朝廷的人也有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幸福，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如果还要有非分的想法，恐怕就会有灾祸降临，这在陈去病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为了使陈去病能多与有知识的人交往，倪太夫人除了请人给他授课外，还经常请有识之士来家中作客，并且置酒招待，留客人住宿，在与客人交流和饮酒时，常常把陈去病带在身边，使他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



女之师表



孙中山

在倪太夫人的教诲下，陈去病成了一个胸怀大志的人，1915年8月，陈去病得到指令，与督军参谋长周凤岐、警政厅长夏超等人谒见孙中山，陪同孙中山游览西湖。在旅途闲暇中，陈去病向孙中山叙述了自身家世：现父、叔、母都已去世，陈去病葬他们于同里竺字围。叙述时，他讲了他是遗腹子，是母亲倪氏含辛茹苦教养成人。孙中山听了也很有感触，边听还边记笔记，说回去后为他的母亲写墓志铭。就在这次途中，陈去病请孙中山为墓园题写了坊额：“二陈先生之墓”。

1917年1月，陈去病收到了孙中山先生写的《陈母倪节孝君墓并序》。在序中，孙中山写出了对陈去病的期望：“而余所尤望于去病者，当只承先训，敦品立行，以达贤母之孝；坚持雅操，勿效于邪，以彰贤母之节；毁家纾难，毋纵于欲，以葆贤母之义；亲亲博爱，物与民胞，以广贤母之仁。”

这仁孝节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儒学的传统，也体现了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同时也对陈去病的人生进行了寄言。序后，写下了墓碑铭：

玄黄剖判，两仪攸分，媪壤滋植，冰蟾代明，
命不常融，道无终杏，蒙难艰贞，事乃有济，
猗嗟陈母，千乘之英，孝侔齐女，节媲陶婴，
寡鹄休歌，丸熊益励，翼卵完巢，绸缪庶几，
遭时板荡，倬彼弘谋，用财自卫，倚柱沉忧，
遗孤彬彬，德音用嗣，我铭其幽，永诏来祀。

王母教子

同里镇上的王家，是个有渊源声望的大族。相传是明代辅国大臣、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的后代。王家出了个王绍鏊（1886~1970），后来当了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副部长。他出生时，王家已经中落，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意即望他继承先祖王鏊之业。后王绍鏊取字恪成，也是继承先祖文恪公的意思。王绍鏊的母亲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治家有方，对他的成长起了有大的作用。

王绍鏊的曾祖和祖父都曾当过地方官，而他的父亲却一直不仕，在镇上当了名中医，不幸在



王绍鏊与母亲合影

王绍鏊六岁时便早逝了，遗下绍鏊兄妹二人。王母年轻守寡以后，便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希望倾注在了孩子身上。

王绍鏊自小受母亲的人生观影响，就在“留耕堂”里，母亲给王绍鏊讲苏武出使匈奴，讲薛仁贵东征，讲杨家将，讲岳飞、文天祥。母亲讲的这些人物形象深深地印在了王绍鏊的脑海里，他在母亲的故事中渐渐长大了，知道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是要他像历史上的忠臣一样，为国家出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不作圣贤，便成豪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的座右铭。

1902年，母亲把他送进了金松岑在家乡创办的新学——同川学堂，和柳亚子是同窗，开始接受新思想熏陶。

二十岁那年，已结婚生女的王绍鏊，偶尔读到了日本清水澄写的鼓吹民主立宪的著作，就决定要到日本留学，当时族里长辈兄弟指责他，但他的母亲对他大力支持，她毅然卖掉了自己的陪嫁田，并又亲自出马，向叔叔求助举贷，用合会的方式去亲友中筹措，终于筹得了王绍鏊的留学经费。王绍鏊这才如愿以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这在王绍鏊的心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王绍鏊后来常对人说，母亲是他的第一个真正的老师。

正由于王绍鏊母亲的开明与理智，为王绍鏊的人生打下了基础。王绍鏊早年曾在同里参加金松岑、薛公侠创办的理论研究会，辛亥革命前夕从日本回国，参加了章太炎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担任交际科主任干事。后倡导走议会政治的道路，南北呼号、联络同志，致力于国家政治改革。1931年“九一八”爆发，王绍鏊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到北京，与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3年秋，在革命风雨洗礼中成长成熟起来的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

成立后，王绍整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定。王绍整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了国家栋梁之才。

杨纫兰开创吴江第一个蒙养院

杨纫兰（1880~1927）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母亲，在吴江民国历史上，杨纫兰是一颗生命短暂的流星，却是一位大放异彩的女性，她用自己的才华、智慧与激情写下了吴江民国女性的新传奇。

杨纫兰出身世家，家底殷实，其父杨敦颐国学基础深厚，却不守旧，让女儿和六个儿子一起上学，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的学医，有的从事艺术创作，有的钻研建筑设计。

杨纫兰早年受父亲杨敦颐影响很大，并且这种影响是中西合璧的。杨敦颐旅居沪上，充分认识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一视同仁先后将子女从吴江的乡镇送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分别就读于著名的南洋公学、务本女学等新式学校，开拓子女的视野，使他们系统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这为杨纫兰姐弟日后成才作了最好的铺垫。

杨纫兰到上海求学时间是在1902~1903年之间，是在长子费振东（1902~1975）出生之后和女儿费达生出生之前。她到上海就读于务本女学，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民国女性之一。她在学校里一

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文化，一面和有抱负的同学纵谈天下大事，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民主共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注重教育等理念已经系统地扎根于她年轻的心灵，她曾在同里发起妇女放足运动，在当时的小镇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杨纫兰回到同里古镇生了费达生后，父亲杨敦颐出资在镇上成字圩开办了一所专收女童的群雅女塾，由杨纫兰掌管女塾事务并执教。群雅女塾虽还只是私塾，影响也不及后来金松岑的明华女校和任传薪的丽则女校，却与黎里倪寿芝1903年创办的求吾蒙塾（今黎里中心小学前身）一起成为吴江最早的女子私塾。

不久，费家从同里搬到了松陵。清朝末年，吴江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幼儿教育更是一片空白。杨纫兰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萌生了以自己的学识和力量创办吴江县第一所蒙养院的想法，藉以改变吴江幼儿教育现状。1911年，杨纫兰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县城松陵镇积善弄办起了私立第一蒙养院。当时，国内的幼儿教育刚起步，许多人还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蒙养院就读。为了办好蒙养院，她率先示范，将自己的子女费青、费霍、费孝通先后送到蒙养院就读。蒙养院创办后，杨纫兰是既当院长又当教师，全力做好蒙养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当时蒙养院的课程完全是新式的，入院幼儿除了学识字，还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等，唱歌时还有脚踏风琴伴奏，这在百年前的中国是很新鲜的。她还为蒙养院的孩子们设计了统一规范的院服，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式的时尚之举。初创时的蒙养院设有一个班，



杨纫兰与家人合影，抱着的为费孝通。

有教师三人，有入院儿童二十四人。私立第一蒙养院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民国元年，民国临时政府对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重新作了调整和部署。

1913年，私立第一蒙养院并入吴江当时著名的爱德女校，成为该校附属的幼稚园。是年，爱德女校幼稚园设有大小混合班一个，有教师三人，有入园幼儿五十余人。另外，也是在这一年，震泽镇上也开设了蒙养院，吴江的幼儿教育由城区延伸到了乡镇。杨纫兰开办的私立第一蒙养院，尽管班级、教师和入院幼儿人数都比较少，但是开创了吴江幼儿教育的历史先河，民国期间吴江的幼儿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杨纫兰去世的前一年，即1926年，吴江境内已经有幼稚园五所，有入院儿童二百四十八人。

费璞安、杨纫兰夫妇共有五个孩子，长子费振东毕业于上海交大，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宣教司副司长；次子费青，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北大教授，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三子费霍，解放后在上海城建局担任工程师；四子费孝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女儿费达生是我国丝绸工作的开拓者。195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费振东、费孝通均为全国人大代表，费青为全国政协委员，被传为美谈。

近代教育的先驱倪寿芝

倪寿芝是黎里镇人，十八岁嫁王燮卿，又称王倪寿芝，婚后不久，丈夫就病逝了，没有子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胞弟倪与三劝勉下，前往上海城东女校求学，学成回到黎里。第二年，又在倪与三的支持下，以簪珥等首饰捐助，设立“求吾蒙塾”，自任学监，从事儿童教育，办起了黎里镇第一所私立小学，现为黎里镇中心小学。

校舍设在自己的住宅内，有教室两间，教员“退息堂”一间，以“天井”，也就是房屋间的空地为操场。该校男女生兼收，设国文、算术、自然等课程。由于办学有方，学校声誉日起，校舍不敷使用。后设私立小学分部，学校成立“嚶鸣手工会”，学生所作工艺品，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奖章、奖状各二。次年，因经费拮据，停办男学。民国三年（1914），私立小学与



倪寿芝

黎里镇明懿女校合并，成立吴江第四区第一女子国民学校，倪仍任校长。这时，倪寿芝捐资新建六楼六底校舍，开设国文、算术、自然等课程，实行复合教育，一个教室设有两个以上年级。当时张应春的父亲张农到学校教书，张应春也就读于这个学校。

学校招收女生，改革课程，不读“四书五经”，遭到当地封建遗老和顽固势力的攻击，倪寿芝对此毫不畏惧。由于学校有别于传统的教育，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电影明星殷明珠也是在这个学校受到了倪寿芝的启蒙教育。

倪寿芝创立了“女子放足会”、“嚶鸣手工会”等，鼓励女子放足，学习多种技能，以自食其力，争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倪寿芝办的学校，被黎里老百姓称为“洋学堂”，洋学堂内的女学生都是“洋丫头”。当时，尽管天足运动已经很有声势，但是黎里守旧的家庭仍然要女儿缠足。好几次，倪寿芝带领一批“洋丫头”，去做说服动员工作。殷明珠是“洋丫头”中最为突出的一位，敢于抛头露面，敢于发表意见，黎里女子小学的教育对殷明珠以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倪寿芝艰苦卓越的办学作风，得到了当时江苏省政府民政厅的赞许，由厅长应德閔亲自书写巨大匾额，送到了倪寿芝的家里，镇上的人都来祝贺。

1914年秋，倪寿芝因病辞去校长职务，但仍捐田七十余亩充作学校经费，拆去家中花园假山作为学校操场。该校自20世纪30年代又开始男女生兼招。

倪寿芝办学在当地树了典范，得到了后辈的效仿。1987年，她的侄女、先后在美国和国内任高级医师的倪征琮个人出资设立“纪念王倪寿芝办学奖励基金”，每年以其利息款奖励黎里镇中心小学优秀教师。1994年，她的侄子、国际大法官倪征燮个人出资二万元在黎里镇中心小学校园内建造一座“王倪寿芝纪念亭”，还亲自撰写匾与碑文。

金松岑与《女界钟》

1903年，是中国近代妇女女权革命的一个重要年代。这年有一部令人震耳发聩的著作问世，那就是《女界钟》。该书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在短期内就销售一空。1904年1月出版的《女子世界》第二期用“看!!!看!!!看!!!”来渲染《女界钟》。

金松岑（1874~1947）热衷于女界启蒙，要求男女平权，脱离受奴役的地位，所著《女界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宣传妇

女解放的出版物之一。此前对男女平等思想虽然也有过宣传，但是，这些文章比较零散而不系统，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较肤浅。如梁启超的《倡设女学书》专著也发表于《女界钟》之前，但维新人士所提倡的女权思想，只求“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金松岑



《女界钟》

而金松岑认为，女子占国民人口的一半，重视女子教育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之而废”，只有革新教育，普及女学，男女共受教育，以教育新法启迪女界，提高女子自身素质，才有可能发挥这国民人口一半的力量。全书论述了女子之道德、女子之品性、女子之能力、女子教育之方法、女子之权力、女子参与政治、婚姻进化论，这是颇能鼓舞女界，振奋人心的愿望。也有人称《女界钟》为“近代史上最

早的妇女解放运动专著”，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给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金松岑在《女界钟》第六节中说到女子应当恢复的权利有六种：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对于教育女子的宗旨，他又举了八条：一是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是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是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是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是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是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是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是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女界钟》一书约三万字，全面控诉了女子的苦楚，系统讨论了男女平等问题，倡导婚姻自由、女子教育和女子参政，呼吁女子自我解放，主张应当恢复女子的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和婚姻自由六种权利，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书稿完成后，金松岑认为邀请几位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女性来为

该书作序，不仅可以加深女界对自身解放的认识，也可以提高书稿出版后的战斗力和影响力。这样，具有民主思想并且活跃在吴江女界的杨纫兰无疑是他最为理想的人选之一，此外金松岑还邀请了侯官林、黄菱舫两位杰出女性。

《女界钟》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风行一时，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激励成百上千的妇女肩负起救国重任。

“五四”时期，向警予在湖南创办周南女校校刊时，更是直接将《女界钟》用作了刊名。

1904年4月，金松岑创建吴江县内第一所女子学校——明华女校，以西弄内的二三间民房作为校舍。教师由自治学社教师兼任，金松岑亲自教国文、音乐。他还亲自为女校撰写了《女学生入学歌》：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校旗妩媚东风轻，喜见开学辰，展师联队整衣巾，入学去，重行行。/脂奁粉漉次第抛，伏案抽丹豪。修身伦理从教师，吟味开心第，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好，女同胞。/缙乐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怀期，东西女杰益驾驰，顾巾帼，凌须眉。/天仪地地球万国图，一日之摩挲。理化更兼博物科，唱歌音韵和，女儿花发文明多，新世界，女中华。/紫裙窈窕芳艸系，戏入运动场。秋千架设球网张，皓腕次第攘，斯巴达魂今来乡，活泼地，女学堂。/鱼更之跃灯花红，退习勤功课。明朝休沐归家同，姐妹相随踪，励志愿作女英雄，不入学，可怜虫。”

明华女校的毕业生中有杨纫兰、费达生等人，该校后称西弄小学。

《女界钟》与明华女校，是金松岑留在吴江妇女史的两大亮点。

女中豪杰张应春

张应春（1901～1927），1901年11月11日生于吴江县黎里镇葫芦兜村（今北厍黎星村），父亲张农是清末秀才，自小喜好吟咏，与四位堂兄堂弟并称“葫芦兜五子”。1917年，四十岁的张农参加了柳亚子主持的南社，以文学鼓吹革命。正由于张农的革命与开明，才有了后来革命的张应春。



张应春

1908年，张应春成了本村张合祠十里徐斋私塾的罕见的女学生。1912年入父亲、叔父创办的葫芦兜初级国民学校读书，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12月悍然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年号为“洪宪”，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张农应聘到黎里女子小学任教，张应春就随父亲到该校读书。这黎里女子小学由倪寿芝创办，张应春在这里受到

了启蒙教育。当时，黎里女校校方迫于政治压力，规定学生记载《课堂日志》时，一律使用“洪宪”年号。这天，轮到张应春和柳均权在班上值日，张应春年虽小，却十分关心时事，她俩悄悄地商量一番，张应春在《课堂日志》上赫然填上“民国五年”四字，在大庭广众，她俩义愤填膺，大骂袁贼倒行逆施，黎里女校一片哗然。

1919年，张应春从黎里女子小学高小毕业，考入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23年受聘松江景贤女中教职，次年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1924年暑假，张应春甩着惹眼的齐耳短发回到村上，葫芦兜里顿时象扔进一块大石头。人们议论纷纷，张应春依然故我，大模大样地串门走户。她还说服胞妹秀春、留春、堂妹同春、连春也剪了发辫，张应春给这偏僻的乡野带来了一股新时代的春风。8月，她又在《新黎里》报上，急切呼吁迅速革除女子蓄发的封建陋习：“我们的女同胞呀！大家快快起来提倡呀！……”

1925年10月，在侯绍裘、姜长林的介绍下，张应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天起，她已随时作好准备，下决心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身，



张应春（左一）在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与同学们习刀舞

她异常兴奋地写信给柳亚子：“我以为自己入了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革命。”

在侯绍裘的支持下，张应春于1926年3月8日创办了《吴江妇女》。目录上有发刊词、祝《吴江妇女》、《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妇女的“人心”、《吴江妇女》与“三八”纪念、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三八”纪念宣言。张应春在巡捕房和军阀的注目下，勇于承担发行工作，她在刊物上注明了通讯处：“上海望志路永吉里四十一号张应春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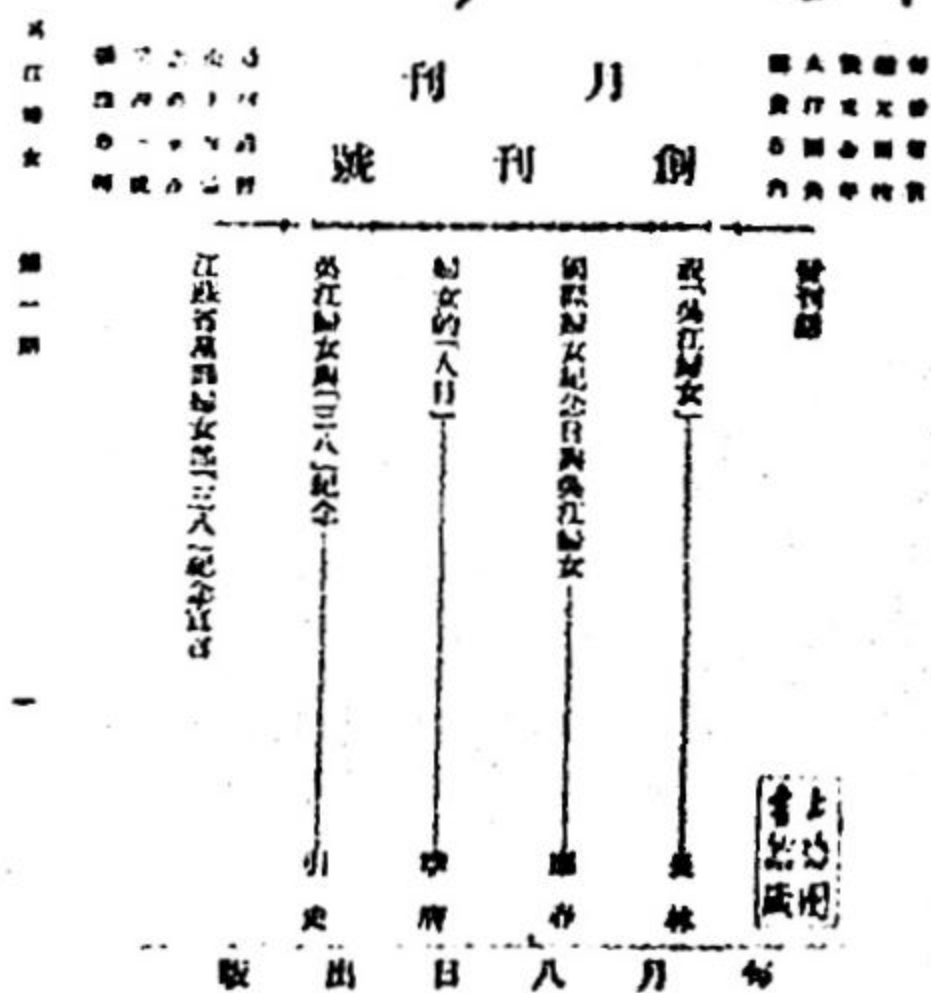
发刊词里这样写道：“吴江妇女是不是全世界妇女社会的一部分？倘然是的，为什么吴江社会不应该和世界革命妇女联合战线共同努力呢？那就是我们要把《吴江妇女》在三月八日发刊的意义了。”

张应春在《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中写道：“革命先进国的领袖——列宁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人们有两个

阶级’——‘压迫和被压迫’，我们妇女要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求种种的平等，而在这国际纪念日来联合全世界的战线奋斗，向压迫阶级进攻！进！进！努力！努力！”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南京紫金山麓举行中山陵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宋庆龄、孙科和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泽如、吴玉章和各地方党部代表。张应春和柳

女 婦 江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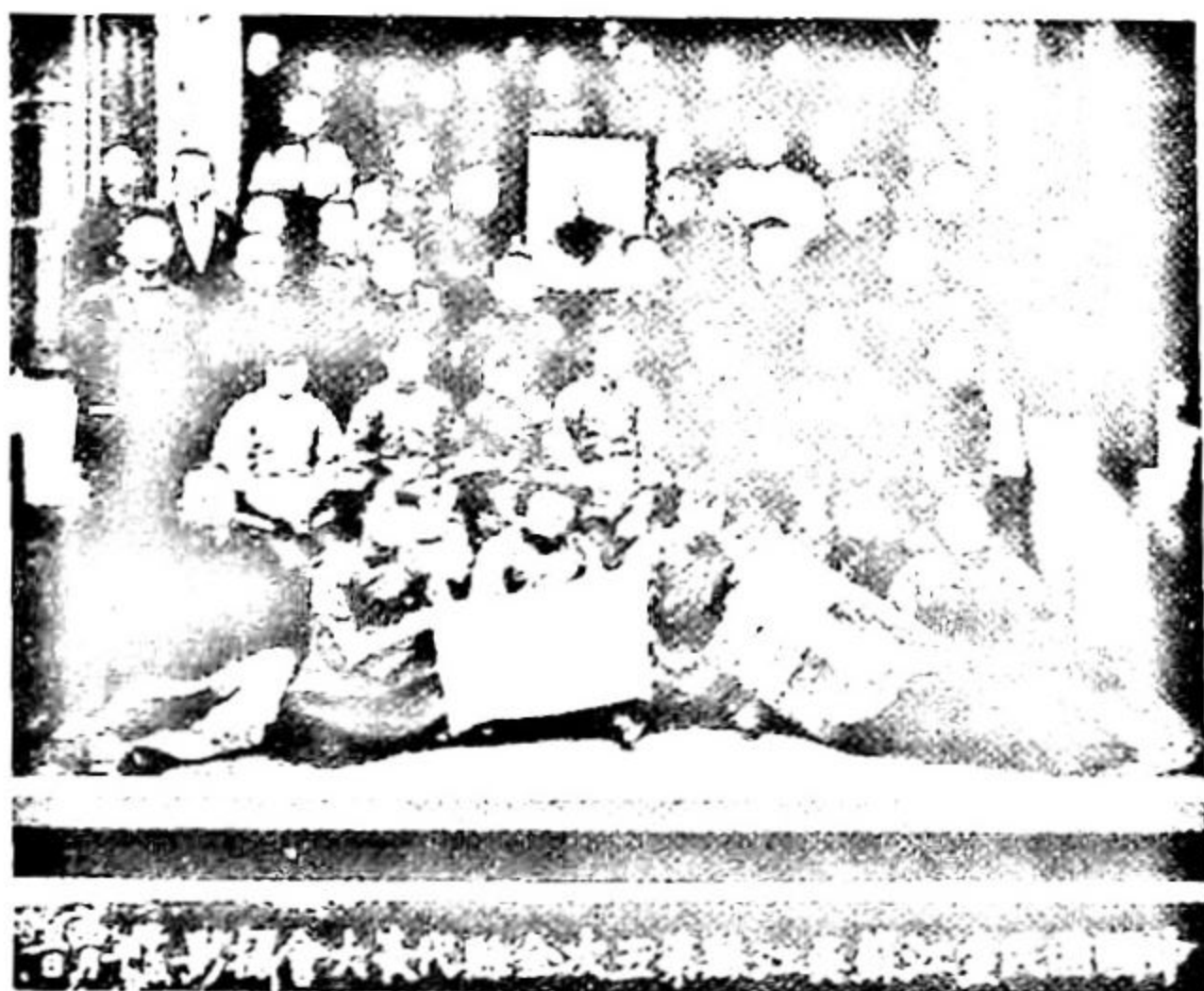


张应春创办的《吴江妇女》

亚子、侯绍裘等江苏省党部代表到了南京。奠基典礼开始，右派队伍中突然响起“推倒左派”的口号，那群早有准备的打手，抡着棍棒、旗杆蜂拥着打将上来，群众队伍顿时大乱。危急之中，张应春挺身而出，护卫着柳亚子。她与唐蕴玉、庄元勇等女同志一起，匆匆保驾着柳亚子下山……

张应春积极用《吴江妇女》作为武器，宣传妇女革命。《吴江妇女》第二期是1926年4月8日出版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反动政府枪杀爱国请愿同胞，造成“三一八惨案”，《吴江妇女》第二期立即发表了悼念文章，张应春起草的《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指出：“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我亲爱的女同胞，大家起来斗争吧！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寻找光明的道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

《吴江妇女》第三期于5月8日出版，文章有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吴江县国民党代表大会演讲词和感想等等。《吴江妇女》第四期于6月8日出版，主要内容是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和发起全国妇女团体代表大会。还发表了《广东妇女协会宣言》、《发起南京妇女联



1926年4月5日，张应春（前排右二）参加国民党吴江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合会宣言》、《南通妇女运动社宣言》等，对促进妇女运动和妇女团体的组织与巩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6年7月8日，《吴江妇女》第五期出版了，这一期的内容有：《江苏省党部妇女部反对军阀摧残女权宣言》、高尔松的《妇女与政治》、YT的《革命和妇女》、王世燕的《普遍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议案》等。《吴江妇女》虽然只办了五期，但它是一份富有革命朝气和战斗性的妇女刊物，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影响。

1927年4月，张应春在黎里家中接连收到侯绍裘三封急电，要她速往南京复职，原来，上级任命侯绍裘为中共江苏省书记，张应春为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她正身患足疾在家休养。她知道，蒋介石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立即打点行装。母亲哭得十分悲伤，要她避过风头再去，父亲也劝她养好病再走，但她义无反顾。4月7日赶到南京时，侯绍裘已被敌人秘密逮捕。张应春并不知情，去找到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的陈君起，陈君起亦不知道情况突变，她们一起前往大纱帽港10号联络，被潜伏在那里的值缉队特务当场逮捕。他们十人被关押在南京公安局看守所，在狱中，张应春等人坚贞不屈。4月中旬，敌人下了毒手，将张应春等人捆入装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戮死，偷偷用汽车运至南京通济门外抛入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

张应春被杀害后，柳亚子大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伤痛。1927年7月，柳亚子先生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来南京出席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期间，他不惧“鬼火青磷带血飞”的白色恐怖，到处寻访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的张应春烈士的遗骨，但是终无结果。

张应春的形象时刻浮现在柳亚子眼前，他的心愿始终未了。悲愤之余，他就请南海陈树人和山阴诸贞壮绘制了两幅纪念张应春的图，取名《秣陵悲秋图》。秣陵是南京古称，张应春牺牲在南京；悲秋，柳亚子曾为张应春取字“秋石”，秋含肃杀之气，与鉴湖秋侠同调。

图画成后，柳亚子请于右任写了“秣陵悲秋图”五字作首，他自己作了《秣陵悲秋图叙》，并题了一首诗。

序写道：“呜呼！此亡友秋石女士成仁纪念也。吊青溪之碧血，高颖无情；殉白练以红颜，杨环同命。故人慷慨，吴祭酒所由兴悲；宾客漂零，龚祠部能无致慨。何况伯仁由我，恸哭新亭；魏阉横行，株连东厂。锦裙罗袜，难寻碎玉之墟；青冢黄昏，绝少埋魂之窟。嗟夫！嗟夫！尚忍言哉！戊辰八月，余来斯地，河山犹是，人物已非。爰驱车林薄间，携樽酒奠之，更乞陈子树人绘图以纪。呜呼！返生无术，何来不死之香；文字有灵，庶慰沉冤之魄。凡我朋旧，幸题咏焉。是为序。”

柳亚子的诗云：“血花红染好胭脂，英绝眉痕入梦时。挥手人天成永诀，可怜南八是男儿。”



《秣陵悲秋图》

秣陵悲秋图叙
 呜呼！此亡友秋石女士成仁纪念也。吊青溪之碧血，高颖无情；殉白练以红颜，杨环同命。故人慷慨，吴祭酒所由兴悲；宾客漂零，龚祠部能无致慨。何况伯仁由我，恸哭新亭；魏阉横行，株连东厂。锦裙罗袜，难寻碎玉之墟；青冢黄昏，绝少埋魂之窟。嗟夫！嗟夫！尚忍言哉！戊辰八月，余来斯地，河山犹是，人物已非。爰驱车林薄间，携樽酒奠之，更乞陈子树人绘图以纪。呜呼！返生无术，何来不死之香；文字有灵，庶慰沉冤之魄。凡我朋旧，幸题咏焉。是为序。

柳亚子《秣陵悲秋图序》手迹

他写完序和诗后，就利用自己在南社中的影响，征集诗词题咏。当时，是在那个“谈共色变”的环境下，悼念共产党人有生命危险。但在柳亚子的带领下，南社旧友不顾个人安危，痛悼纷纷，用了五年时间，计有陈树人、诸贞壮、沈长公、林庚白等十七人，写了诗八十四首，词十九阕，曲四首。沈长公的四子沈晒之，不仅题了诗而且画了一幅画，取名《悲秋》，内绘芙蓉和桂花，还有一只杜鹃不停悲鸣。芙蓉，“十月芙蓉应小春”，暗指“应春”；桂花，张应春牺牲时化名“金桂花”，从画面到题名处处点明题旨，为哀悼张应春烈士而作。

柳亚子把这些题咏与画幅汇编成册，妥为珍藏，以寄托对张应春绵绵哀思。1943年，柳亚子又通过他的义妹林北丽请画家成竹描画《礼蓉招桂图》，礼蓉之蓉，张应春字蓉城；招桂之桂，即金桂花。上述两图，道尽了柳亚子以及新老南社社友对张应春为革命捐躯的无比悲愤与无尽怀念。

《秣陵悲秋图》、《礼蓉招桂图》现存苏州博物馆，成为了珍贵的文物；图背后的故事，也给予人们精神激励。

1955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应春为烈士。

电影明星殷明珠

殷明珠（1904～1989）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界风流潇洒的明星。殷家世居吴江黎里镇北长田村，她的曾祖父是清道光年间的翰林，祖父殷梦琴也在乌镇当官，父亲是位画家，曾买“发财票”一条，正好在他病故之日幸得头奖，画家虽听不到喜讯，却留下一笔小小财产。她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在这所洋人办的学堂中她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学会了跳舞、唱歌、游泳、骑马、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又生得聪明伶俐美丽动人，成绩优良，中西文化都楚楚可观，尤善交际，有首席校花之称。平时西装革履，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宝莲的装束，风流潇洒。因而人们呼之F·F（Foyeign Fashion）女士，意为“洋派人物”，中文名字反而不传了。



1950年殷明珠留影

20年代初，上海租界有三位洋气闻名全市的中国时髦小姐，一曰

AA，AA是Ace Ace的缩写，意为王牌。二曰SS，SS是Shanghai Style的缩写，意为上海派。三曰FF，FF就是殷明珠。AA叫傅文豪，能驾汽车，领有上海公共租界第一张女子驾驶执照。SS叫袁滢如，也一洗封建尘埃，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当时上海旧俗尚存，大姑娘待家字中，谁敢抛头露面？而这三位中国洋小姐，竟敢跳舞、游泳、开汽车招摇过市，这在当时简直是奇迹，是创举，一传十，十传百，全上海都知道了。AA、SS均曾从影，但昙花一现，很快便在银幕上消失了，唯有FF即殷明珠，献身影坛，终身不渝。

殷明珠的丈夫但杜宇，世居江西，是曾经批点过《聊斋志异》的但明伦的曾孙，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无以为生，遂扶老母到上海，以卖画为生。电影东来以后迷上了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从画家当摄影师，但杜宇是第一人。当他在物色一位与影片角色相称的美人时，在一场喜事上遇到了殷明珠，殷明珠也为自己能上银幕而兴奋。两人志趣相投，殷明珠很羡慕西方影星生活，但杜宇想尝试拍电影，于是他们齐心协力，经办了上海影戏公司。

于是由但杜宇导演，殷明珠为女主角，于1922年拍成中国第一部爱情片《海誓》。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二部长故事片，也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爱情故事片。内容写一女子福珠，初与画师周选青恋爱，私订婚约，并海誓山盟，将来如负婚约，当跳海而死。后来福珠被富有的表兄诱惑，毁弃前约，答应与表兄成婚。当她与表兄在教堂举行婚礼时，良心忽然发现，念及前誓，不顾婚礼，逃奔画师。画师怒而拒之，她便如誓投海自杀，幸而画师追到，将她救出，二人终于结成佳偶。

这是一部地道的洋化影片，是从外国模仿来的，开了中国新式恋爱故事片的先河。在中国银幕上，这种新式情节、新式人物、新式服装、新式布景、新式思想感情、新式结婚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是有史

以来第一遭，促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所谓的新式时装戏。

影片是在闸北天通庵路露天塔景靠自然光拍摄，福珠由殷明珠扮演。她天生丽质，加上美化的摄影，分外漂亮。洋化的演出虽嫌不伦不类，但在欣赏水平普遍低下的时代，颇能使人耳目一新。社会人士久慕FF大名，都想一睹为快，所以1922年1月23日该片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后，大为轰动，票房收入超过了舶来片，殷明珠因此而成了中国第一个担任电影主角的女明星。

《海誓》在上海轰动了整个影坛，黎里的家乡父老闻讯振奋不已。蒯厅主人当即赶赴上海，找到明珠，说明来意，希望《海誓》能够到黎里蒯厅去放映，让家乡父老一饱眼福。明珠一口答应。哪知《海誓》到蒯厅放映的消息一传开，四乡八村、周边市镇的观众接连不断地拥来，盛况空前。原定放映三场，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本来只能晚上放映，为增加场次，蒯厅四周围上厚厚的黑色窗帘，白天加映；原打算下午加映两场，后来干脆从早晨开始，一场映完再接一场，周而复始。就这样整整连放了一个星期，才勉强结束。家乡父老好评如潮，大家都为黎里出了电影明星而高兴。从此以后，黎里古镇开了放映电影之风。

电影事业把殷明珠和但杜宇的情感牢牢地维系在了一起。尽管明珠的母亲认为女



殷明珠故居南花园

儿拍电影似乎以色相示人，有伤殷氏门风，一度持反对态度，甚至不准明珠与杜宇往来，但是，殷明珠已经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中国的电影事业，她与但杜宇之间的感情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最后母亲想通了，不再以诗礼传家的旧观念苛求女儿，承认了他们的结合。在拍了《重返故乡》和《传家宝》之后，1926年2月1日，两人在杭州结婚。证婚人叶楚伦在致辞时说道：“新郎为海上画家，为余旧友，新娘系黎里望族，与余有世谊。今日在杭结婚，而余为证婚人，其乐何如！”由恋爱到婚姻，由事业到家庭，故叶楚伦称赞他俩“一双璧人，天作之合”。新婚伊始，杜宇和明珠仍牵挂新片，西湖蜜月没有度完，就回到上海。友人们讨喜酒吃，夫妇两人就在摄影场地设下宴席，招待宾朋，热闹一番之后，又投入了新影片的拍摄工作。

殷明珠、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是中国电影史上成名较早的女影星，与她们同时或稍后成名的女明星还有许多，但杨耐梅的娇冶放荡、王汉伦的端庄贤慧、殷明珠的青春美丽，恰恰代表了20年代电影女影星的三种基本类型。

1989年，一代影星殷明珠在香港逝世的消息传到黎里，家乡亲人默默哀悼。黎里镇文学和书画沙龙的一批文化人聚在一起，缅怀这位为电影事业作出了不巧贡献的乡贤前辈，合作了如下一副挽联：“影坛肇基，往昔伉俪同奋力；桑梓受惠，至今里人感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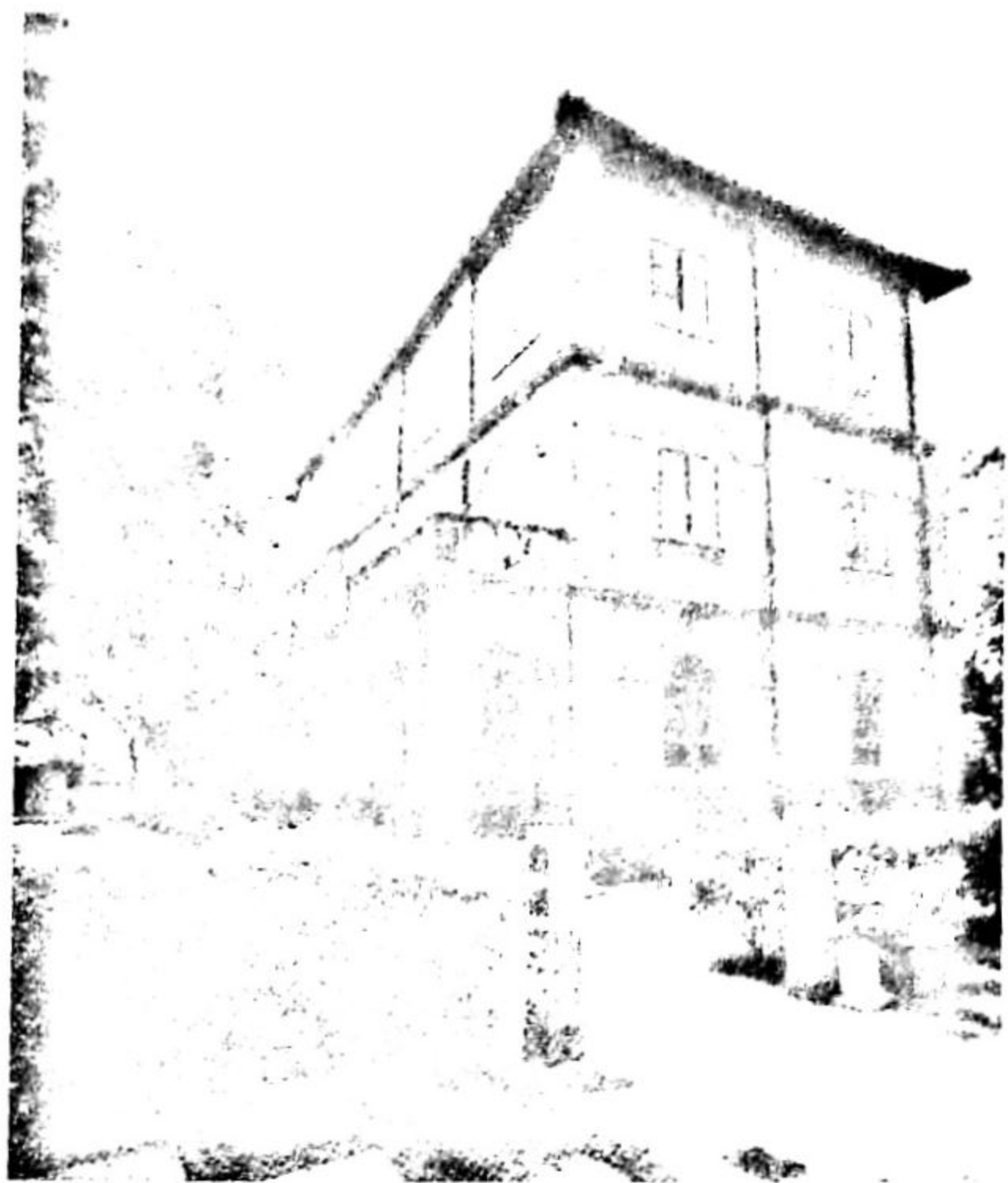
丽则女校

丽则女校在同里镇东溪街，南濠弄东端，与退思园仅一墙之隔，创办者是任传薪，是退思园主任兰生的小儿子。

1889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首创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随即近代教育的先驱蔡元培先生也在上海创立“爱国女校”，梁、蔡二人率先向封建传统伦理编织的罗网大胆冲锋，得知这一消息的任传薪先生既感动又兴奋。

任传薪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深感广兴学校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而女子教育尤为迫切。他认为，只有女子获得了近代知识和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参政权利，才能真正具有独立的人格并走向社会。因此，他于1906年2月在家乡创立了这所女子学校，开了古镇女子受教育的先河。

说到任传薪，应该提到他母亲。任传薪的父亲任兰生，曾经官至安徽兵备道，光绪十年（1884），遭人弹劾，革职回到同里，建了退思园。1889年任传薪出生时，他父亲任兰生已去世，留下了退思园等



丽则女校

家产。任夫人主持家政，担负起了培养儿子的责任。1900年，她在家里办了私塾，请当地名人陈去病担任了任传薪的老师，接受了新思想。任传薪办女学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他们没有把父亲的遗产作为自己享受的资本，而是让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学校创办不久，任传薪就与柳亚子等人一起到上海健行公学继续读书，校务工作主要依靠他的母亲管

理。后来，任传薪又就读上海震旦大学，此后又自费赴德、日等国考察女子教育，丽则女校的管理工作由他母亲承担。

退思园内的退草堂是一年级教室，桂花厅为五、六年级教室，二、三、四年级教室是新建的，琴房作音乐室，内宅南侧还建造了操场。师生的宿舍就设在“坐春望月楼”里，后来的师范班开在“岁寒居”，园林内办学校在我国也是不多见的，可以称得上学校风光之最。

丽则女校为古镇女子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学校有图书馆、实验室，有钢琴和电影放映机。国学大师钱基博、书法家钱祖翼、文学家范烟桥、任传鹤、顾乃复等名师在此任教，使女校声名大振，许多家长纷纷送女入学。任传薪考察回国后，又在丽则女学内设艺术专



丽则女校校训

修科，1909年，又创设师范本科班，三年毕业，相当于后来的简易师范，先后办了两届，为本地造就了一批女学师制。1915年他不吝私囊，耗银币八千三百元征地建楼，又办丽则女

子中学，成为一所集初小、高小、师范、中学于一校的独特的女子学校，为江南一带造就女子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09年，丽则女校开设师范本科班，为家乡培养第一代女教师。1911年，校区规模扩展，任传薪不吝其私囊，又得刘姓宅基，在退思园东侧，建坐北朝南七开间二层教育楼，占地二百三十一·五七平方米。1916年又在二层楼基础上，加层为三层教学大楼。11月15日，新教学大楼落成，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自到校参加庆典，并题训“诚勤朴爱”四字，此匾镶嵌于教学楼墙体正中。钱基博撰《校宇记》，蓝公武也应邀参加庆典。

丽则女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生。1915年，丽则女校学生的绣品在巴黎马塞会议上获银奖。1921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新时代国文大观——全国学校成绩》，收录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二百余篇，丽则女子中学就有薛元雁、倪代军、叶芳祚、殷侠英、柳均权等八人十四篇作文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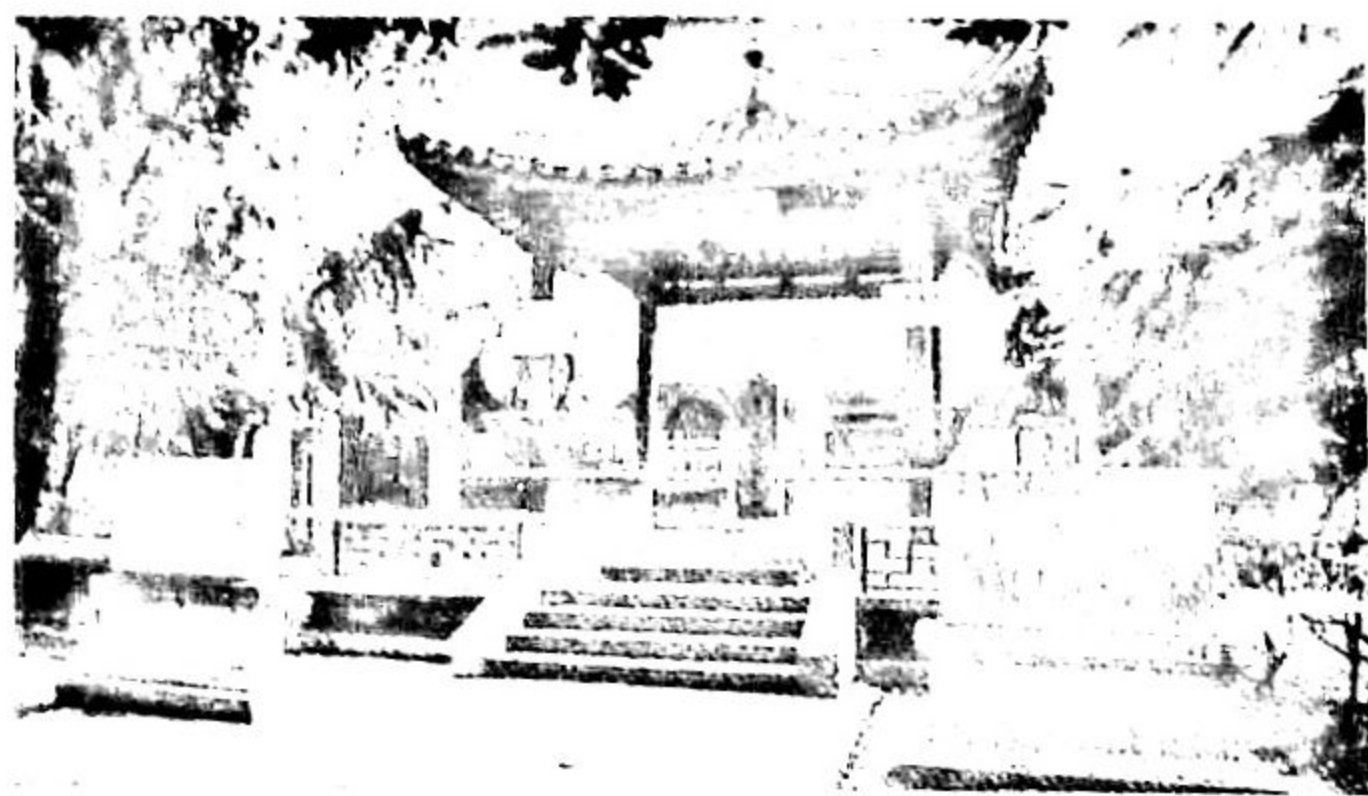
“五九”国耻纪念碑

丽则女学校里有一座利箭状的纪念碑，这座造型独特、寓意深刻的纪念碑，是丽则女校师生在1915年5月9日，为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卖国的“二十一条约”上签字，而建碑明耻。此碑顶端呈剑头状，似一把利剑直刺腐朽、末落的旧社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提出德国直接将山东权益交还被拒，于是决定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其远东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独占中国的权益。5月，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京的同里籍人士将这消息电告同里家乡人，消息传到同里，也激起了丽则女校师生们的义愤。

丽则女校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由钱基博作词的学校校歌，体现了这种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着学生的一种卧

薪尝胆的精神。5月9日，丽则女校全体师生一百四十八人在陈家牌楼的一座厅堂内集会。大会由师范班主席殷同薇主持，她慷慨陈词，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



丽则女校内的雪耻亭

华罪行和袁世凯卖国行径，当众咬破手指，展开白绢，书下了“誓雪国耻”四个大字，以示抗议。

百余名师生悲愤激昂，怒不可遏，纷纷拥向台前，咬破手指在白绢上留下“卧薪尝胆”、“洗雪国耻”等血书。会场内口号不断，声泪俱下，气氛壮烈，群情激昂，在古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后大会决议，除了上街游行、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外，“自筹款项，建碑明耻”，爱国之心可歌可泣。

为了表示持久的卧薪尝胆精神，师生决定在校内建国耻纪念碑，碑身正面刻有“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十个大字，碑身反面为碑文，真实生动地记载了丽则女校全体师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词碑由钱基博先生写碑文，著名书法家秋瑾烈士挚友吴芝瑛手书。

纪念碑成了丽则女校教育学生的生动教材，此后每逢5月9日这一天，学校都要组织师生在碑前进行思想教育，坚持了多年。1938年日寇占领校舍作军营，由无名爱国志士将此碑埋于地下，1982年在整理校园时重新出土。2000年，丽则女校原址被中共吴江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吴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女性沈华昇

1922年下半年的一天，吴江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长毛啸岑正要去上课，有人通知他说四四幼稚园的程主任叫他去。毛啸岑是四四幼稚园的董事，认为一定是教学上的什么问题，上完课就匆匆赶去。

见到了四四幼稚园的保姆主任程兰君。闲聊几句后，程兰君却问起了毛啸岑的婚姻问题。

毛啸岑在以前因父母之命曾有一次婚姻，三年前妻子不幸难产而死。父亲一直要他续弦，但他总是顶着。此刻他只想静心修养，参与社会服务，暂时不想与异性接触。程兰君向毛啸岑介绍了沈华昇（1896～1974），说她是上海爱国女子师范学校文科毕业生，思想很新，容貌也不错。

1923年元旦，盛泽幼稚园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应洪雄声相邀，



沈华昇

毛啸岑同陶省三一起到了盛泽，在幼稚园附设女校内见到了沈华昇。当时，沈华昇正在布置会场，很是忙碌。两人应酬几句，沈华昇又忙开了。第二天，盛泽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和女校表演新剧助兴。三高表演的是《酒迷》，女校表演的是《新旧家庭》。《新旧家庭》就是由沈华昇编排的，该剧讥讽社会上种种恶习，揭示了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沈华昇在剧中饰管翠玉，喜怒哀乐，声情并茂，这更使毛啸岑了解了沈华昇，深深为自己能交往这位很有艺术素养的新女子而感到幸运。

1923年初，柳亚子、毛啸岑会同黎里区教育会等九个团体共六十四人开会，商量创办《新黎里》报的事，在编辑时，毛啸岑将一首新诗交给了柳亚子，作者是一个“影”字，柳亚子一看题为《怨偶》，就读了起来：“新文化的潮流，/冲破了几千年的旧习，/婚姻问题，/受他的感应。/恋爱！自由！解放！/这种种名词，/都轰轰地出现，/沉沉女界梦初醒。……”遂决定把这首诗在创刊号上发表。

这“影”其实就是沈华昇的化名，毛啸岑当时没有明说。

辛亥革命促进了江南的近代化，突出地表现在对旧风俗的涤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是松弛了封建礼教，使旧婚制开始崩解。而西风东渐、欧美婚仪通过电影、文学的媒介也渗进新婚俗中，然而，这种新思潮的冲击仅限于城市，对乡镇触动甚少。沈华昇对女青年因封建婚姻而自杀的现象也谈了许多感想，毛啸岑就叫她写出来。

1923年5月，《新黎里》报出了婚姻问题特刊号，特刊号上发表了柳亚子的《婚嫁改良浅谈》，毛啸岑的《对于自由恋爱者下一忠告》，沈华昇的《我对女界自杀的感想》。沈华昇的文章，发出了对封建礼教迫害女青年的控诉和呐喊：“妇女的解放的声浪，居然一

天高似一天了，但是那耳中听到的，眼中看到的，那最可怜的女青年们，仍不免有自杀的事情……我们处在这万恶的社会制度、不良的家庭制度下，起初的时候，烦闷、忧郁……结果是失意，绝望……不走到自杀的路上，还到哪里去呢……。”

1923年10月，毛啸岑与沈华昇决定要举行婚礼了，他们已经接受了婚姻的真谛，向人们传播婚姻问题的新思想，如何再以自己行动为当时的青年人作出表率呢？二人都在思考着。

柳亚子很关心毛啸岑和沈华昇的婚礼，他也希望毛啸岑、沈华昇能在本邑婚姻史上再开个新纪元。在柳亚子住处，毛啸岑与柳亚子商定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式结婚仪式。

10月30日，毛啸岑、沈华昇结婚仪式假座苏州三新旅社举行，证婚人是前省议会议长钱强介。出席婚礼的有介绍人县督学邱纠生、三高校长洪雄声以及《新黎里》报主编柳亚子，《新周庄》报主编陈戡人，爱德女校校长王希禹，《盛泾报》主编沈复镜，东吴大学法科学员汝保彝，《新盛泽》报主编徐遽轩。婚礼分二段进行，前段由毛啸岑报告恋爱经历，及主婚人介绍人讲话，第二段是茶话会，来客都讲话，它成了一个向封建婚姻宣战的报告会。

柳亚子最后对毛啸岑、沈华昇提了三件要求：“第一件，华昇是在盛泽女校教授的，服务社会是最好的事情，愿她继续下去，不要因为结婚而废弃……希望她成为一个服务勤恳的女教育家，不愿她退化做不劳而食的少奶奶！第二件，我主张他们俩并造小家庭，不要做大家庭的寄生虫……最好华昇明年也到四高担任教务，可以住在四高里面，以学校为家庭，使生徒得着母性的保护……第三件，主张他们俩节制生育……”

沈华昇和毛啸岑听着前辈们的谆谆教诲，心里也非常激动，对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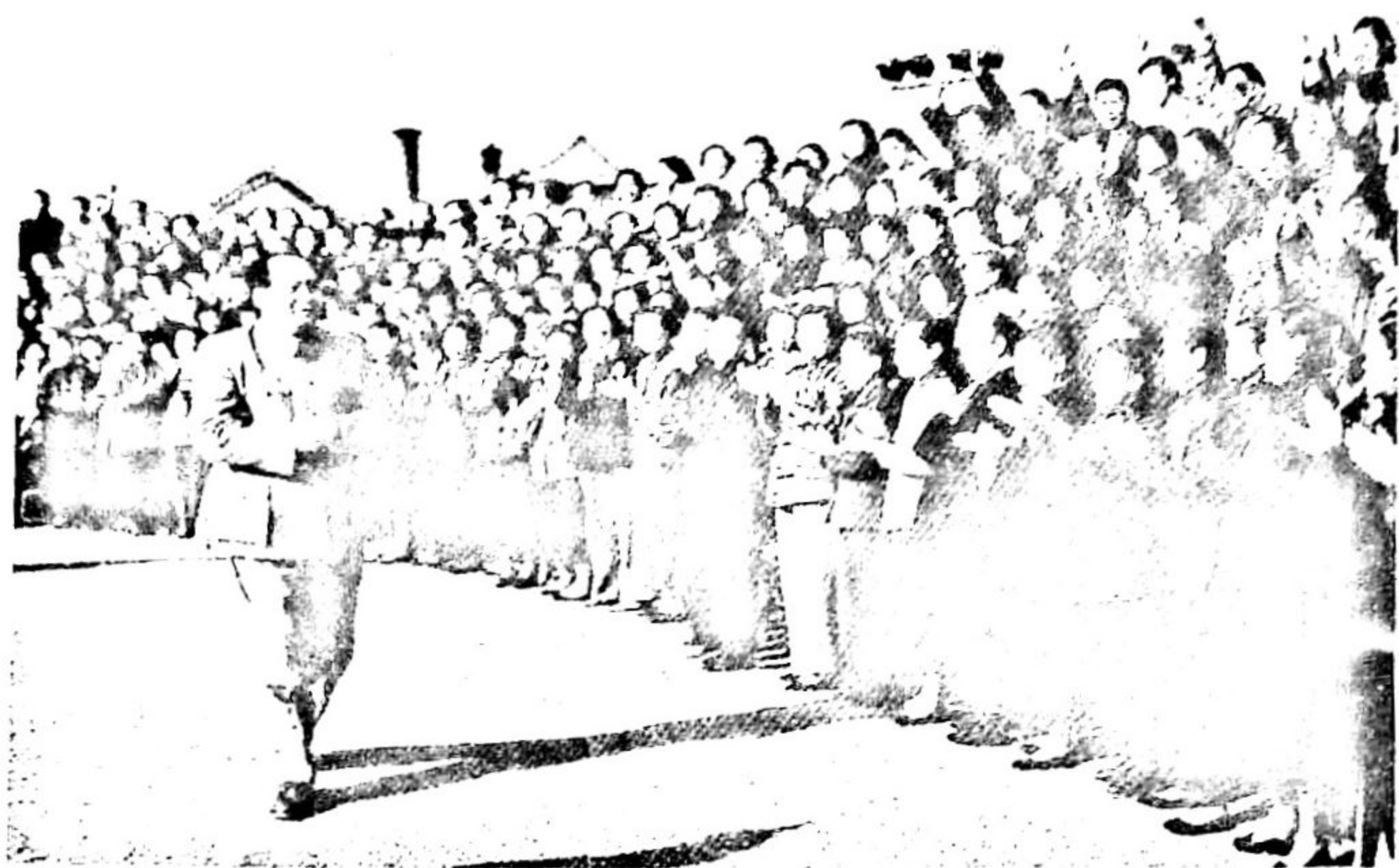
位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婚礼后，毛啸岑与沈华昇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婚后，毛啸岑和沈华昇情投意合，琴瑟相谐，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解放前她支持毛啸岑为党工作，跟着毛啸岑转辗南北。解放前夕，毛啸岑在上海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情报工作，参与创办了中共投资的上海中级信用信托公司，任总经理，公司后改名中信实业银行，为共产党收集情报和提供经费，沈华昇积极配合。新中国成立后，她如获新生，取毛泽东主席诗词《咏梅》中的报春寒梅之意，改名沈梅英。她在上海走出家门，参加了里弄工作和社会活动。有一天，有位记者采访她，她没说什么，向记者递上了一首《自誓》：“虽然头发年年白，自喜良心日日红，一心一意跟党走，誓将老妇作黄忠”，表示了要效仿三国时的老黄忠，为国出力。她与毛啸岑一起动员独生儿子毛安澜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当时上海《新民晚报》曾刊登新闻



毛啸岑沈华昇全家合影



1956年4月2日，沈华昇（前排右四）参加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沈梅英大姐支持独子毛安澜参加东北建设》。1950年，毛啸岑从北京参加全国金融会议回到上海后，根据上级指示在工商界宣传中央调整城市工商业的政策，沈华昇就做工商业家属的工作。为支援抗美援朝，毛啸岑带头捐资，沈华昇也为捐献活动到处奔波动员，一次坐三轮车去开会，从车上跌下来受了伤，还带伤赶往会场，参加会议的人被她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解囊认购公债。

1956年1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了步伐，沈华昇和毛啸岑一起参加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3月份，沈华昇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业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4月2日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一起照了相。

1957年，毛啸岑被打成“右派”，职务从副总经理一下子成了回

收钱币整理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啸岑家被抄了，还不时地被拖出家门示众，被批斗和陪批斗，1968年底被送到奉贤县湍桥“五七干校”，直到1971年回到上海，沈华昇与毛啸岑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身心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1974年，沈华昇与毛啸岑住到了儿子毛安澜家里，12月份，沈华昇因病去世。

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

1926年4月5日，国民党吴江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同里侍御坊，也就是陈家牌楼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吴江的柳亚子、张应春等人，还有一些当时有名望的共产党人侯绍裘、杨之华、瞿双成，其中的杨之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

杨之华（1901~1973），又名杏花、文君、杜宁，出生在浙江萧山坎山镇一个绅士门第，自小聪颖，五四运动前，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1920年初，去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6月，《星期评论》停刊，到上海基督教教会学校任教。期间，结识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人。1921年春回乡，与宣中华等回萧山衙前农村小学任教，并参加领导衙前农民运



杨之华

1922年，在萧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冬，杨之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1924年，由瞿秋白、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与瞿秋白结婚。1925年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妇女部委员。1926年3月，在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部主任时，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环境恶劣，工作繁忙，杨之华经常来协助工作。杨之华来参加国民党吴江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张应春等人特别兴奋，她与十二位女同志集会，欢迎杨之华，一起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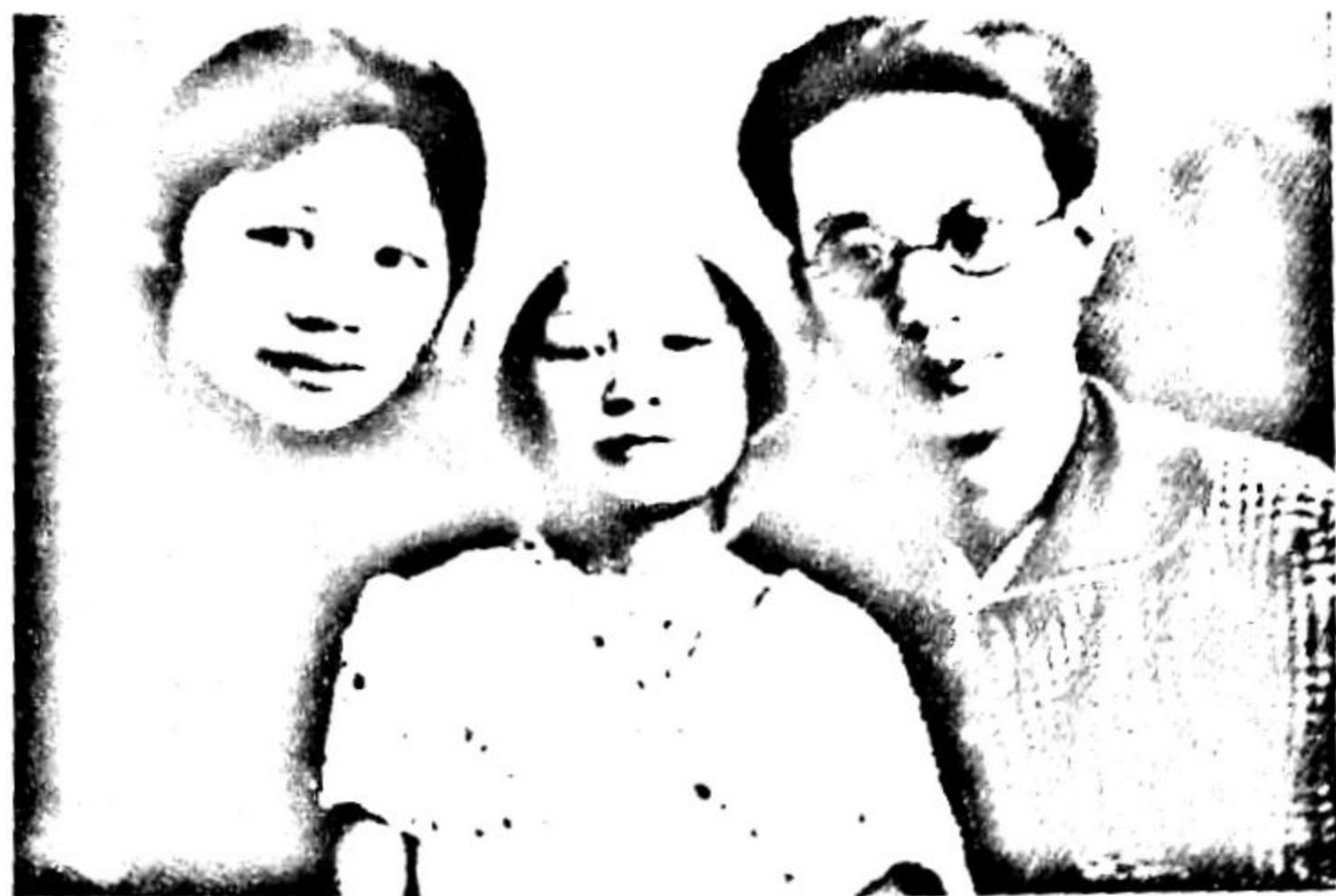


杨之华和丈夫瞿秋白

会议开了整天，上午是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柳亚子作了坚持国共合作的演说。下午为第五次代表大会，柳亚子为主席，侯绍裘和杨之华作了演讲。杨之华的《妇女与政治》的演讲，讲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劳动妇女所受的痛苦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情况，指出劳动妇女要组织起来，引导她们向革命路上走，使她们知道要参加革命来改造自己的命运。这篇演讲，在当时北伐前夕是非常重要的，对当时的妇女运动起了鼓动作用。

杨之华演讲后，瞿双成演讲了《中国妇女与国民党》，直到夜里十点才散会。

杨之华留寓同里，开展妇女工作，与张应春关系密切。此后，杨之华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



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与女儿瞿独伊

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同年12月创办《中国妇女》旬刊。1949年全国解放后，历任全国妇

联党组成员、国际部部长、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常委。

吴江花木兰沈月箴

沈月箴（1920~1981）是平望镇人，从小跟随吴江中学王怒安学旧文学，对旧体诗有一定修养，人聪明，长得很漂亮。抗战爆发后，曾参加学生救护队。后来她得知表哥毛啸岑在上海参加了革命，就给他信中说：“我决心跟你走你十年前的路。”

毛啸岑读了沈月箴的信后，就把她介绍给了王绍鳌。沈月箴向王绍鳌介绍了家乡的动向，说吴江东部抗日条件比较好，不少青年希望来上海找共产党。

王绍鳌听了沈月箴的介绍，感到吴江发展抗日力量的条件很好，就决定派共产党员、“华东地区武装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成员李愈秋，化名丁秉成带二十多个同志奔赴吴江活动，他介绍沈月箴参加了“武抗”组织，随丁秉成回吴江协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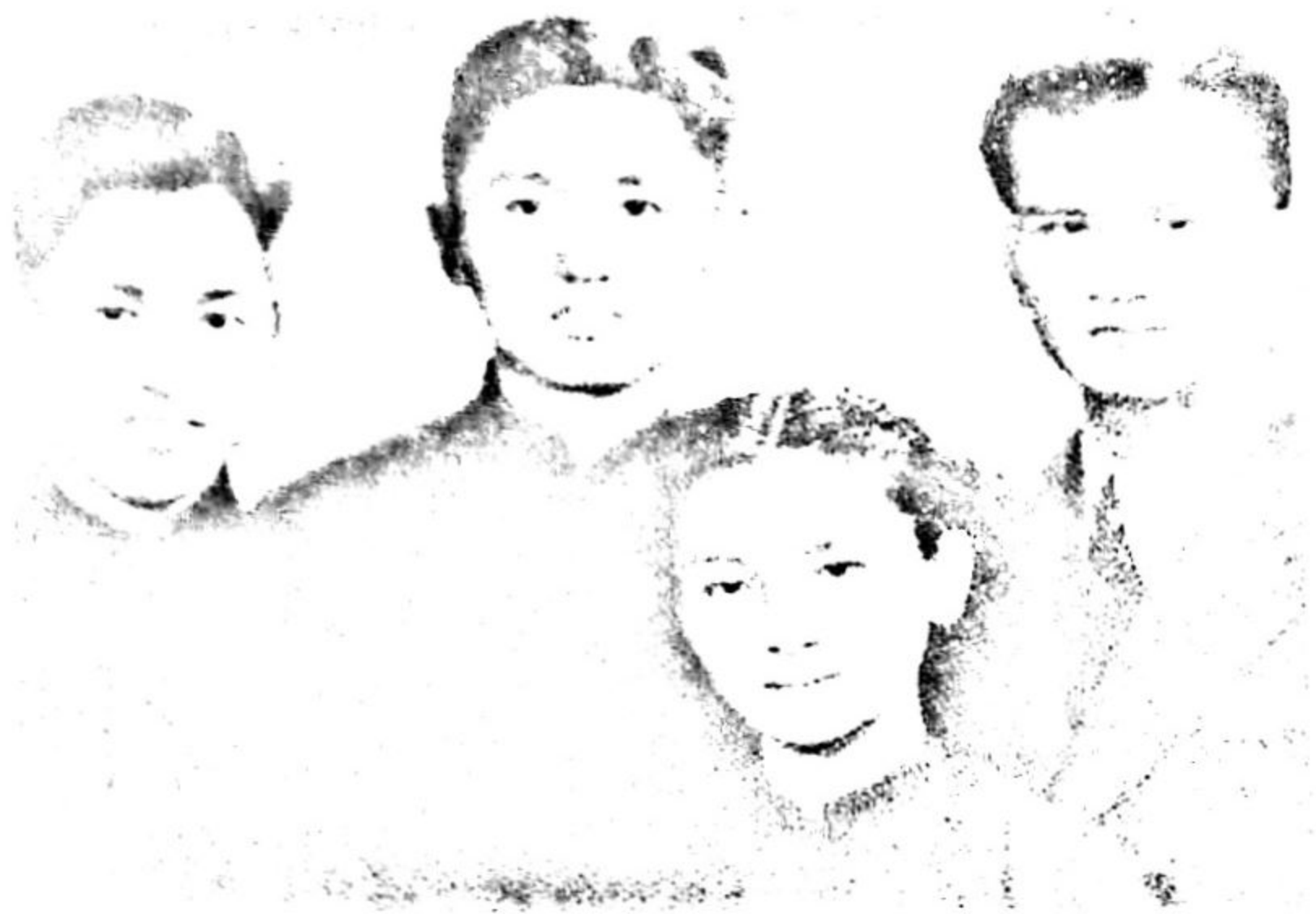
1938年秋，丁秉成奉命带刘子荣、章燕、华大闲、俞哲、叶初晓、林风等“武抗”成员到了吴江，沈月箴当向导。任务是争取改造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沈月箴带着毛啸岑的介绍信找到了国民党地下县政府县长沈立群，沈立群热情地接待了她。她的举止谈吐深深地吸引了沈立群，沈立群就把她留在了身边，担任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办事员。这给她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条件。她与丁秉成单线联系，往来于上海、苏州、吴江、严墓及其他太湖地区，从事情报工作。丁秉成等人以政训处下属“青年服务团”为活动基点，发展“武抗”成员。他们从上海秘密运来一批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文艺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进步青年中组织阅读讨论，出刊墙报，吴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一时期，沈月箴负责把县政府的有关密件送往宜兴张渚的国民党江苏省第二专署，再把上级的指示、文件带回吴江。她就利用这机会，从张渚回吴江时，先到自己的住处将重要的情报资料抄录下来交给在吴江工作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丁秉成，使我党及时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争取抗日的主动权。

沈月箴往来吴江张渚途中，要经过多条日伪封锁线，她乔装打扮，应付自如。有一次从张渚取回一个密件，她将密件藏在了一个点心盒子里，拎着盒子向无锡城门走去。这时，无锡日本兵正在抓人，望着日本警车她思考着如何过城门。她放慢脚步，仔细观察，看到了城门口站着一位女警察，沈月箴就果断地朝她走去。女警察打量着沈月箴，眼睛盯住了点心盒。沈月箴神情自若，女警察要打开盒子检查，沈月箴眼睛火辣辣地盯住了女警察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人在看”，女警察一愣，不由自主放下了手，说：“快走！”把沈月箴让了过去。

中共的同志从上海市到吴江地区，大部分都由她带路护送。有



沈月箴（前排女子）与“武抗”成员金大鹏、肖心正、潘培能

一次“武抗”成员施光华就由沈月箴带路，拿着假良民证，从上海来到严墓车家坝。沈月箴特意买了七八盒日本野猪牌蚊香，把秘密文件藏在了底层的蚊香盒子里，坦然地拎着，与施光华一起经过上海外滩白渡桥的日寇岗哨，日本哨兵指着她手中的东西问“蚊香？”她毫无惧色，笑了笑，打着手势说：“你们大日本帝国的野猪牌蚊香顶刮刮。”日本兵眉开眼笑地把他们放了过去。

1939年12月，沈月箴在上海霞飞路伟光医院任职员，后转入慈联中学，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抗日活动。后去新加坡，供职于商务印书馆。1941年9月，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新加坡政府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再赴香港。翌年初，被派到桂林。11月又被派往淮南根据地，在中共华中局情报部做秘书工作，当时的部长是潘汉年。1941年7月，沈月箴因病经组织批准回沪治疗。抗战胜利后，因身体差，脱离了原工作岗位，但仍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潘汉年当时来往于上海和解放区的通行证就是她弄来的。

解放后，沈月箴居上海，曾与弹词名家杨振雄合作编写了《长生殿》、《武松》等长中篇评弹。1955年7月因潘汉年冤案牵连被捕，1956年12月释放。1982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为她平反，但她已于1981年2月因患癌症去世。

柳亚子曾称她为“吴江花木兰”，并赠诗一首：“虎口能深入，蛾眉迥轶伦，如何一蹉跌，失意走南冥。聂隐堪前辈，杨娥倘后身，焚香告秋石，衣钵有传人。”历史学家李亚农也有《赠沈月箴》诗：“绰约风姿锦绣才，当年秋瑾似重来。征人何幸沙场里，得见奇葩烂漫开。”

倪淑英血染神仙山

倪淑英（1916~1943）又名宋维，八路军女战士，革命烈士，松陵镇人。1928年考入苏州女子师范，毕业后在吴县新闻小学和上海中振小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倪淑英回家乡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编印抗日刊物，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日军侵占吴江前夕，她到严墓纽汇小学任校长，在农民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她和家人一道离开吴江向浙西撤退，



倪淑英

年底到达湖南长沙，再赴汉口。1938年春，经教师罗琼介绍，倪淑英取道西安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北枸邑县织田镇工作。翌年底，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中公安局秘书副主任、机要秘书、晋察公安局秘书主任等职。1943年秋，日军对晋察边区发动扫荡。倪淑英正怀孕，不能随大



倪淑英在《放下你的鞭子》中的演出剧照

部队行动，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参加战斗小组，在山区活动。

1943年9月，倪淑英与战斗小组的九位同志，在华北的阜平、涞源两县交界的山区开始面对日军反扫荡的战斗生活。倪淑英拖着已经怀孕的身子，紧跟着队伍，登上了三千多米高的神仙山最高峰。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穿过山野，“不好！敌人摸上山了。”只见战友杨志毅一个箭步冲出树林，看到一群鬼子正舞动枪支，四处搜查。“快！卧倒——”淑英大喊一声，可敌人的一颗子弹已从小杨的腿边穿过。刹那间，两位战士扑上去架起他返回树林，淑英从骡子背上取下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幸好破了点皮肉，没伤着骨头，疼吗？忍着点。”“哒哒哒——”敌人的机枪向树林密集地扫射着，看来目标已经暴露，淑英心想：敌人在坡上，小组在山顶，居高临下，便于伏击。她攥紧拳头喊了一声“准备战斗！”

一会儿功夫，敌人上来了。这时大树后，山石旁的战士们瞄准敌人射击，一下子把前面的敌人消灭了。后面的敌人又龇牙咧嘴地冲上来，战士们拿着手榴弹，拉断导火索，同时扔进敌群。“轰隆——”、“轰隆——”一阵爆炸过后，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哇哇惨叫，乱成

一捆，丢下了一具具尸体，逃下山去。

山顶伏击战出奇不意地取得了胜利，淑英高兴之余，一丝阴影涌上心头：山下是日军的据点，丧心病狂的鬼子一会儿还会卷土重来。不能耽搁了，她高喊一声：“同志们，马上转移。”

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九人小组艰难地行进着。神仙山的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风起云涌，一会儿晴，一会儿豆大的雨点随着山风倾盆而泻。雨水打湿了战士们的衣衫，个个像落汤鸡一样。秋后的天气已有寒意，倪淑英吃力地喘着气，嘴唇冻得发紫，不禁打了个寒颤。同志们把小组唯一的大衣给她披上了。此时小杨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淑英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不好！冻坏了。”她赶紧将大衣披在小杨身上。一连十几天，又要行军，又要照顾高烧不退的小杨，累得淑英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但她坚持为小杨打完了最后一支退热针。

“1943年10月11日，涞源县桦木沟村路北大院里，小组活动坚持了三十四天，与敌人有过九次交锋，小杨已脱离危险。但形势十分严酷，连日行军作战，身体非常虚弱，小生命在她腹中躁动不安。”她停下笔，拿出爱人的照片端详了一会儿，继续写日记，“国坚，此刻你在哪里？是否在歼敌作战？亲爱的孩子，假如我能够顺利生下你，请你记住，你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晋察冀八路军战士。假如我在以后的战斗中牺牲了，你不必埋怨，未出世的你和母亲一起是抗击日寇的英勇战士。”写到这里，淑英热泪盈眶。

10月12日凌晨三四点钟，一阵紧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震醒了寂静的山谷。敌人来了！淑英迅速翻身坐起，一边拉起身旁的战友，一边把文件包背在身上。“快！从后山突围！”淑英果断地说。小组人员摸黑翻过院墙，冲到后山，借着天边淡淡的微光，同志们相

互挽扶着又往高处爬了一段，伏在一个山坡下。突然，一大群头戴钢盔的鬼子，从后面包围上来，还一股劲地喊着：“八路的，快快的投降！”“抓活的！”形势万分危急，后山已无路可跑。淑英毫不犹豫取下文件包点火烧了，敌人向火光处猛烈扫射。淑英奋不顾身向敌人扔手榴弹，敌人退了下去。小组改向西突围，他们来到一条干河边。

“砰——”的一声，敌人的子弹击中淑英的右手，鲜血直流，小杨赶紧为大姐包扎。此时已是凌晨五六点钟，目标越来越暴露。淑英就大声说：“小杨，先撤！留个人好报信。”“不！”小杨急得快要哭了。淑英忍住痛，用力将小杨推了出去，杨志毅病刚好，没有力气，站立不稳，滚下了山坡。

淑英与前来支援的三位同志隐藏在一块巨石后面。她的右手不断地渗出血来，就用左手把一个个手榴弹扔向敌人，受伤的敌人哇哇惨叫，后面冲上来的鬼子狂呼着“活捉女八路！”“女八路，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淑英咬着牙继续将一个个充满仇恨的手榴弹掷向敌群，边扔边喊：“这就是我的回答！”敌人架起了重机枪，对着她和三位战友密集地扫射，淑英和战友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鬼子们趁机冲了上来，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战友们先后饮弹牺牲了，倪淑英挺身回击，身中数枪，一个只有二十七岁的年轻女战士倒下了，一个怀着小生命的年轻母亲倒下了，她把殷红的热血洒在了黄土高原上。

反扫荡结束后，部队在河北阜平县石家寨为倪淑英等烈士召开了追悼大会。

南麻革命三姐妹

1937年的时候，南麻汤村有一农户，户主寿冬来，夫妻俩有三个女儿，本来生活也过得去。然而，国家发生了动乱，日寇入侵南麻，当地人纷纷逃难。

当时的寿冬来已不是普通的农民，他的表弟是活动于嘉兴、吴江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员周洪财。寿冬来受表弟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的家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场所。寿冬来还变卖家产资助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

日本鬼子来了，寿冬来也带着子女到处逃难，在逃难的过程中，他想起了表弟讲的革命道理，他感到这样逃来逃去是逃不掉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的，只有参加革命，打败日本强盗才是唯一的出路。寿冬来慷慨激昂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子女，他的话深深打动了子女们的心。



大女儿寿鸿

大女儿寿鸿，毕业于平望镇小学和镇江蚕桑学校。1937年，寿鸿在青云天亮浜蚕桑办事处担任蚕桑指导员，结识了吴江县地政局来天亮浜搞土地登记的胡志坚，后来胡志坚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做政治工作，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在胡志坚的教育鼓励下，寿鸿逐步地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主救国的思想。1940年9月，想去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父母满口答应，但考虑到寿鸿是二十岁的女孩子，孤身一人穿过敌占区，实在太危险。寿冬来想来想去毅然决定让十七岁的二女儿寿志勤同姐姐一起去苏北，路上有事好商量，好照应。寿冬来还卖掉二十石大米给两个女儿作盘缠。1940年10月，姊妹双双历尽艰辛终于到达苏北，参加了新四军。

当时根据地建立不久，战斗频繁，生活条件艰苦。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又向根据地进攻，寿鸿和同志们一起，紧密联系群众，经受了考验，1941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先后在泗阳县任工作队队长、乡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朱岗区委宣传部长、泗阳县委秘书、育庙区宣传部长、淮北交通总局副局长等。

1944年，寿冬来的三女儿寿志民在苏州读书。寿冬来对三女儿说：“你已经十七岁了，你的两个姐姐也是这个年龄参加革命的，你可以写信给你姐姐，也去解放区。”寿志民就给大姐写信，不久收到回信。1945年6月，寿志民也来到淮北解放区，她后来在华野战军卫生部工作。

1946年春夏，寿鸿随部队转移去了苏北、鲁南的渤海地区，任华东野战军九纵留守处妇女干部队队长，在艰苦的环境中，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全力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后来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48年9月8日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平县段家店病故，年仅三十岁。1954年，山东省民政厅为寿鸿墓立碑志文。

寿冬来先后把三个女儿送上革命征途，在当地传为佳话。

地下党员杨秀云

杨秀云，1928年8月出生于吴江。1948年10月在吴江县师范学校就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秋冬，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派陷入穷途末路，一方面变本加厉地疯狂镇压革命力量，一方面大造共产党的谣言，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澄锡虞工委决定：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尽快把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我党的政策告诉老百姓，稳定民心，为迎接吴江解放作好准备。正巧政治交通员王阿土从苏北带来了一批《新华日报》和毛主席分析战争形势的许多文章，以及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传单，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先在吴江城内散发这些传单，任务交给吴江师范院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杨秀云去完成。

这一天，正好赶上吴江城里的一个头面人物死了，要出大殡。棺材停放在城区中心的公园内。前往吊唁的人来来往往，甚为嘈杂。杨秀云看到这个情形，马上就有了主意。她事先将传单藏在衣服里，来

到公园门口，混入吊唁的队伍。随着人流，她一边慢慢地走，一边不慌不忙地把传单散在地上。身上的传单散发完后，她赶紧离开现场。当天晚上零时左右，杨秀云趁同学们熟睡之际，再次身藏传单走出校门，来到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大门口。此时，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杨秀云就在大门口及周围的路段散下传单，然后很快离开。

吴江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队疯狂破坏公共设施，炸毁桥梁，向地方索钱索物，逼缴枪支。特务、土匪、散兵游勇四处枪劫。社会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为了顺利迎接解放，中共澄锡虞工委给当时吴江城内的商会会长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多做善事、少做恶事，给自己留条后路。考虑到女学生杨秀云所在的学校离商会会长的家非常近，党组织把送信的任务又交给了她。那天晚上十时左右，杨秀云悄悄地来到校门外，街上寂静无声，杨秀云径直来到商会会长杨某的家门口。她观察左右没有动静，就将信插入他家的门缝之中。事后她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责令商会会长保护好城区的粮食等物资不遭抢、不遭破坏；部队接管时，要维持交通的顺畅，确保解放军部队顺利通过；保护好吴江的档案、资料等不被毁坏。

吴江解放当日，在杨秀云的带领下，吴江中学简师班的学生用红被面做了一面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去迎接武工队，经三里桥到了庞山湖。在那里，杨秀云和同学们看到了十多位农民装束的武工队员，前面一位也扛了一面红旗，他们的红旗上还有“CCCP”的字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号。只见武工队员有的扛着长枪，有的挂着匣子枪，精神抖擞，领头的是吴明。接上了头，武工队员与学生们同坐一条木船向吴江进发。一路上，吴明教学生们唱起了歌曲：“你是灯塔，是黑暗里的光明。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到

了城门口，城门上已经扯起了白旗，国民党军队投降了，杨秀云他们兴奋地进了吴江城。

杨秀英解放后曾任第一任城厢区团委书记，1986年离休。

与潘玉良相伯仲的唐蕴玉

2006年12月，上海嘉泰拍卖公司在油画拍卖专场设置了“流金岁月——早期油画先驱篇”专题，其中就有湮没已久的女画家唐蕴玉的三十八幅作品。这三十八幅作品中有二十九幅被拍走，获得了成交率76%的好成绩，也唤起了人们对早期优秀画家唐蕴玉的记忆。上海大学研究中国早期油画的李超老师表示，发现唐蕴玉的旧作对学术界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发掘唐蕴玉就是发掘一个时代，这是唐蕴玉的魅力所在。



唐蕴玉在作画

唐蕴玉（1906~1992年），江苏吴江人。她早年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学美术科，1927年应王济远之邀赴日深造，随同乡柳亚子夫妇前往日本攻读油画专业，师从石井柏亭学西洋画，1930年又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正统油画。后又游历欧洲诸国，其作品多次入选巴黎法国国家春季沙龙、秋季沙龙和杜而利沙龙参展。1937年回国，之后在上海新华艺专、上海美专等校任教，并与张晨伯、朱屺瞻、潘玉良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美术团体“艺苑”。在“艺苑”这个艺术精英团体中，唐蕴玉进一步吸取了“艺苑”所特有的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风格。唐蕴玉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作品苍劲有力，色彩鲜明纯朴。《上海市大观》（1948年出版）记载：特设二楼一隅为书画部，自1936年至40年代末，大新公司画廊展事活动频繁，其中就有唐蕴玉的油画展。唐蕴玉晚年旅居美国，虽年逾八旬，仍坚持作画。1992年，由南加州华人美术学会、美国加州中华艺术研究会、洛杉矶华人艺术家、美国中国书画学会主办的唐蕴玉遗作展在美国展出。

20世纪20、30年代，唐蕴玉与方君璧、潘玉良、蔡威廉、关紫兰、丘堤等几位杰出的女性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



唐蕴玉的作品《静物》



唐蕴玉1992年的“绝笔”画

献。唐蕴玉曾旅日、旅法游学，长于静物风景的描绘，在肖像绘画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唐蕴玉回国之时，正值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趋于繁盛之时。她的艺术活动的代表之举，是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并参加了重要社团“艺苑绘画研究所”。“艺苑”是1927年以后出现于上海的重要西画团体。唐蕴玉、金启静等画家加入其中，从欧洲归国返沪的潘玉良不久也加

盟“艺苑”，成为重要的中坚骨干。醇厚的学术空气与和睦的自由探讨，使“艺苑”在上海西画界产生了良好的声誉和影响。

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唐蕴玉的艺术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位活跃于中国西画界的女画家，唐蕴玉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画展，比如第一届全国美展中，她的《静物》入选，成为一幅引人注目之作，同时刊登于当时《美展》期刊中。在当时的诸多的艺术期刊中，时常会见到唐蕴玉作品的出现。

1929年，《妇女》杂志“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评价其“与潘玉良女士相伯仲”。1930年唐蕴玉赴法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专攻油画，后游历荷、比、意、英、德、瑞士诸国，参观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欧洲各画派。归国后在上海多所美术学校执教西画，同时致力创作。1946年5月，唐蕴玉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厅举行第二次个人

油画展，展出的百十幅作品中，构图多变新颖，色彩淡泊而宁静，尤以善绘人物肖像和风景为其创作特色，成为民国时期活跃一时的女画家之一。

唐蕴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直到1992年去世。她与家人从上海移居美国时，随身带了许多早年的佳作。在洛杉矶她参加艾林顿画室的写生活活动，留下了不少晚年作品，包括不少历史的照片和手稿实物等，记录着她上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和30年代留学法国以及40年代活跃于上海画坛的非凡经历。作品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多以风景、人物和静物为题材，优雅而淡泊的清新色调和笔触，展现了这位早年与潘玉良“不相伯仲”的优秀女画家的思想和才情。

南社诗人陈绵祥

陈绵祥（1900～1985）是陈去病的长女，字亨利，一字馨丽，号希虑、秋梦斋主，能诗能文能篆刻，多才多艺。陈去病妻子去世后，身边无人，陈绵祥年纪还小，陈去病的好友、秋瑾的结拜姐妹徐自华此时因自己的女儿梅蓉不幸患白喉病夭折，就代为抚养陈绵祥，如同亲生女儿一样。



陈绵祥

作为长女的陈绵祥跟随父亲陈去病，追随孙中山先生，走南闯北，鼓吹革命，拥护共和。在南社成立后不久，1922年6月11日，陈绵祥参加了南社在上海半淞园举行的第十八次雅集，正式加入了南社。新南社成立，陈绵祥加入新南社，积极参与新南社的活动。1924年9月30日，陈去病在上海发起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陈绵祥任秘书。1928年，南社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苏州虎丘举

行，陈绵祥与父亲陈去病一起积极筹备，并参加了纪念活动。

陈绵祥与柳亚子结有深厚的友谊。柳亚子认她为义妹，来往密切。1927年，陈绵祥赴日学习蚕桑，柳亚子等以诗送别，陈去病感激柳亚子的情意，写了《馨儿东渡，亚子有诗送别，赋此致谢》：“奚为远行役，憔悴自堪伤。四海兵戈满，三山药草香。神仙倘可遇，病体好扶将。多谢临歧意，归来话旧长”。抗日战争后期，柳亚子预言中国即将胜利，请尹瘦石描绘《东都谒庙图》，图上一共七人，除柳亚子与郑佩宜夫妇外，还有陈绵祥、廖梦醒等五位女郎，待等抗日战争胜利。柳亚子先生说，他将与夫人郑佩宜带领陈绵祥等人前往拜谒郑成功庙。

陈绵祥至日本，先住鹿儿岛习日语。后学蚕桑。曾有蚕桑之论一书。结识了在日本攻读昆虫学的蔡邦华，蔡邦华是江苏省溧阳县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现称鹿儿岛大学）动植物科。后来陈绵祥与蔡邦华结为秦晋之好。她成全蔡邦华的教育与科学事业，自己管柴米油盐家务事，她持家十分细致，每日的开销记得清清楚楚。蔡邦华后来作为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在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陈绵祥幼小失母唯以书、诗为伴，父亲百尺楼满屋的诗书是她的精神寄托和食粮。澹泊宁静的书屋是她的情之所托，而她父亲著作更是她的所爱。她幼时就读的丽则女校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重教育质量，重女生心灵的塑造，尤其重女性独立之培养。她天资聪明，过目不忘，能背能记，背诵如流。童年时，有一年暑假，她手里拿着书，嘴里念着，边走边念，走进了老屋，一脚踢在一条蛇身上，可见她的专注。

陈绵祥童年就与诗结缘。当年的诗书之家，学校的诗书环境，父亲周围众多的文人雅士，这种耳濡目染为她的诗词创作提供了独特



陈绵祥（左一）与徐自华（右一）等合影

优越的环境。秋瑾被清廷所杀，陈去病为秋瑾料理后事，成立秋社。1980年，陈绵祥从北京返回杭州时还写下《过秋社有感》一诗：“重来旧地此徘徊，谁向西湖问劫灰。辛苦半生无遗迹，不堪兴庆有馀哀。翠柳长堤拂水滨，无边风景正媚春。秋心楼阁今何在？芳草凄迷不觉新。”

陈绵祥对诗歌酷爱如同她的生命，在她的枕边总是放着小本，写满了她的诗，诗句记录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她一生写有无数的诗词，只可惜沧海桑田，世事多变，许多诗文已散佚，只留下一本早年诗集《秋梦馆诗》，是用百尺楼丛书的纸本抄写的。这本苍老的诗集用娟秀工整的毛笔字抄写的，字里行间散发出她当年的浩气，诗中记载了她参加南社时的一些社会的交往；也记录了与柳亚子、叶楚伦等人的诗文交往；诗中记录了苏曼殊的吊唁等，还记录了自己学蚕桑去日本考察的种种情况……

陈去病有《拜汲楼诗稿》，是以前的作品集，一直没有付梓出

版，而且没有很好收藏。陈炯明叛变，他离开广州时将诗稿遗失。后来他整理诗稿，仅存《浩歌堂诗钞》卷一。为保存诗稿，陈绵祥陆续收集旧稿，终于集成《浩歌堂诗钞》十卷。

八年抗战期间，陈绵祥一家从杭州随浙大南迁往都匀、宜山，最后西迁到贵州湄潭，条件再艰苦，她始终带着她父亲的诗集，把它们放在一个旧的竹篮子里，上面用很细的绳子扎起来。当时浙大的文学系，还经常出现她的身影，常常出去听课，回来写诗，她的诗亦常常受到教授们的赞扬。她与浙大许多老教授也有诗词交往，苏步青就是其中之一。

夜深人静，一日工作忙完，陈绵祥与丈夫忍着饥肠辘辘，以吟诵中国古诗词来排遣。一首接着一首的唱，她好听的吴依软语与丈夫低沉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声调随着诗韵时高时低。他们吟唱着日寇入侵、国破家亡的伤感与惆怅，随着诗歌的抑扬顿挫，唱出了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愁苦心情。

陈绵祥临终前嘱咐儿子，在她的坟上刻上：“女诗人陈绵祥”。

新南社社员柳无非

柳无非（1911～2004），字小佩，吴江黎里人，柳亚子长女。1917年，进黎里女子小学读书，1923年随父母加入新南社，进上海圣玛利女校读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作为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学生，她因参加示威游行被校方所阻，毅然退学转入神州女学。在反对军阀段祺瑞大会后参加示威游行，因队伍被反动军警马队冲散，跌倒在地，头部受伤。1927



1930年的柳无非

年“四·一二”政变后，她跟随被通缉的父亲东渡日本，在异乡亡命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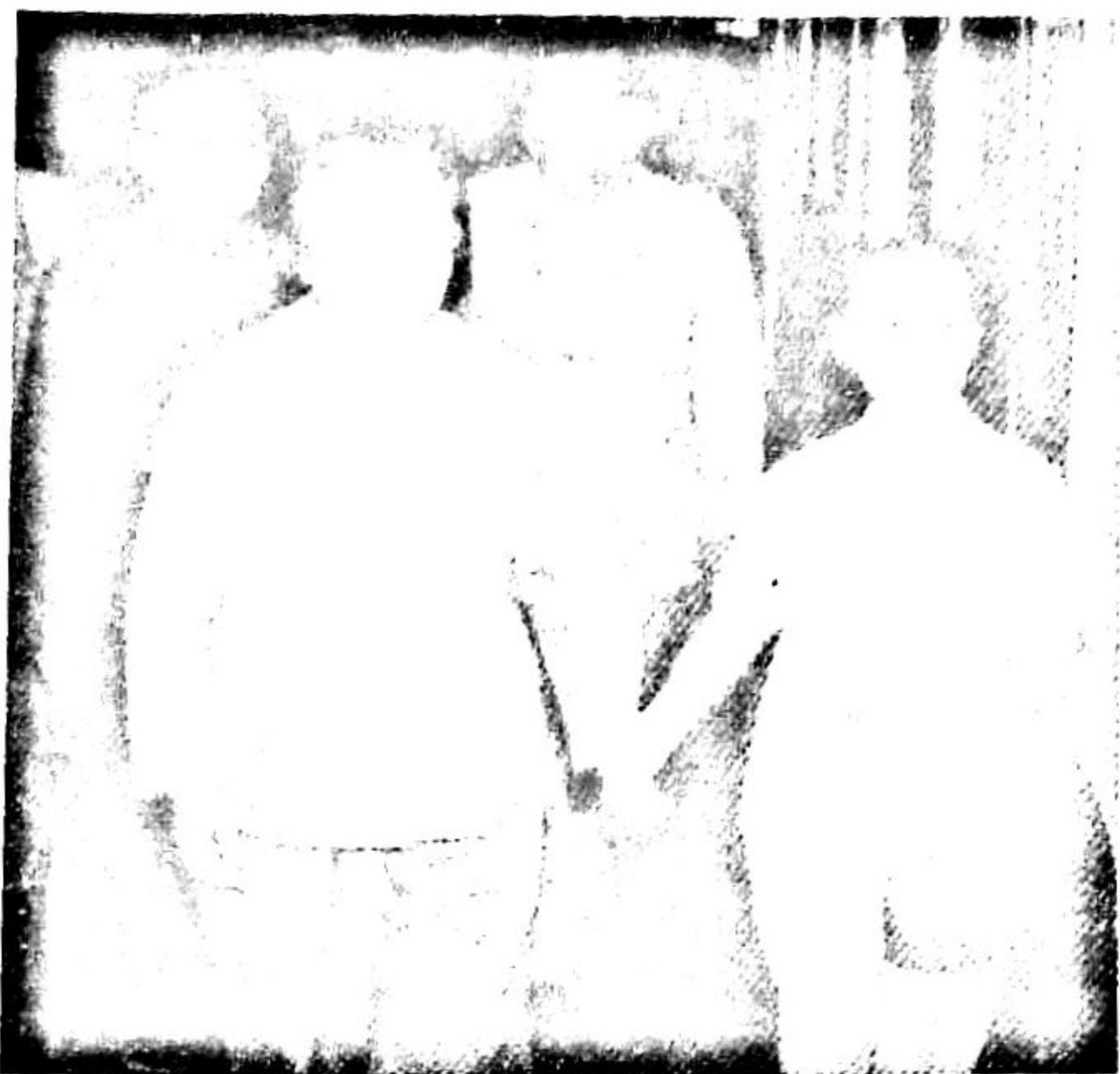
1928年4月，柳无非返回上海，重返大同大学文学预科，1930年毕业。同年夏，赴美留学，入佛罗里达州冬园罗林斯大学英文系，次年转入马萨诸塞州史密司女子大学。1933年回国，一年后与陈麟瑞结婚。

陈麟瑞（1905～1969），号瑞成，新昌县城关人，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1922年回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外文系主任、联合国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主任秘书，长期从事翻译和戏剧创作。

抗战期间，父母亲辗转香港、桂林、重庆，她全家一直留居日寇铁蹄下的上海，冒着风险守护家园。1943年至1945年任上海美新小学英语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麟瑞任新华社上海英文部主任，《中国建设》副总编，柳无非参加上海妇联工作，1953年迁居北京。

1978年，柳无非当选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当选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任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继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柳无非深得家传，喜爱读书，1931年，与哥哥柳无忌、妹妹柳无垢合撰《菩提珠》，页首题“献给我们最亲爱的父母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柳无非晚年，在满腔热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同时，努力工作，推动南社与柳亚子研究。父亲逝世后，与胞妹柳无垢选辑的《柳亚子诗词选》于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何香凝题签、郭沫若撰序，这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柳亚子诗词选集》。1987年5月28日，在吴江黎里镇赐福堂原址成立柳亚子纪念馆，柳无非专程赶赴黎里，根据她的回忆，对第四第五两进居室进行复原陈列。1989年，她与柳无忌、柳无垢合著的回忆录《我们的父亲柳亚子》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无非撰文十三篇。《复壁一幕，宛在目前》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了“四·一二”政变中，国民党反动军警去黎里周赐福堂搜捕柳亚子的详实情景。《廖、柳的通家友谊》一文，则回忆了柳氏一家与廖仲恺、何香凝及廖承志、廖梦醒一



1983年，邓颖超接见柳无非（右）

家，在各个历史时期及建国后持续数代的深厚革命友谊。1990年，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柳无非任副会长。1994年，篇幅浩繁的《柳亚子文集》七集九册全部出齐，作为编委之一的柳无非，在历经十余春秋的操劳之后，给读者和研究者奉献出了这部必将名垂中

国文学史册的煌煌巨著。

柳无非2004年4月14日病逝于北京。柳无非去世后，儿子陈君石，把一车遗物赠予柳亚子纪念馆，其中有诸多国际南社学会出版的书籍，国内各级南社学会研究会出版的刊物，以及整套二十四史等珍贵版本。还有柳无非一生所作的诗词，检点一下共计382首，大半与她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颇有她父亲“留当他年诗史看”之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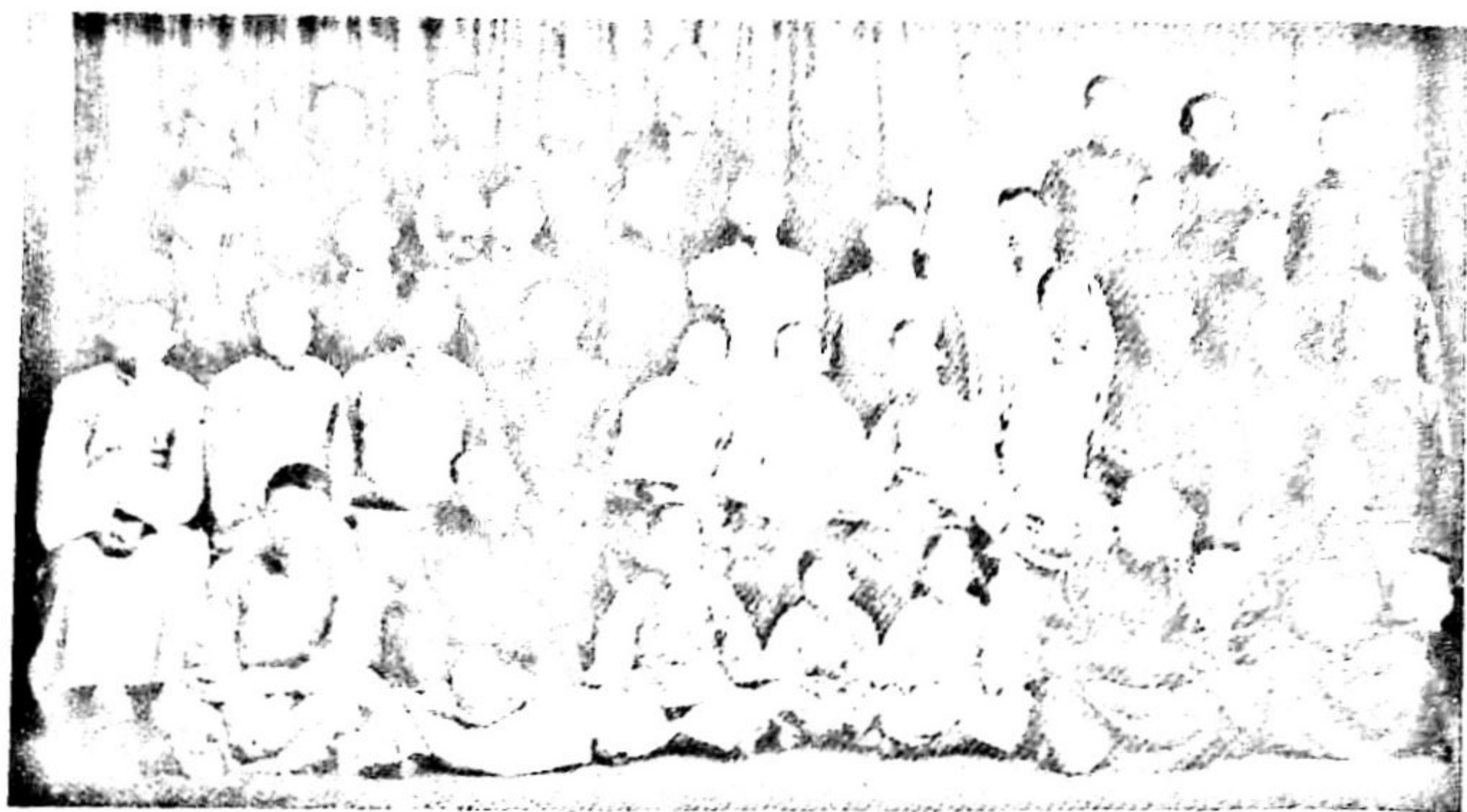
柳无非的儿子陈君石，1935年6月15日出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获研究生学位，为我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女儿陈君华是心血管病专家。

翻译家柳无垢

柳无垢（1914～1963），字小宜，柳亚子次女，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诚实、勤学、节俭，六岁入黎里女子小学读书，每年得到印有“勤”和“优”字的银质奖章。

1926年到上海，考入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7年“四一二”政变，父亲柳亚子受到反动派追捕，在黎里赐福堂复壁脱险后亡命日本。同年7月，无垢与哥哥无忌同赴日本，次年4月返回上海，继续进大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得全校第一名，有才女之称。1931年，与哥哥姐姐合撰了《菩提珠》。“九一八”事变发生，惊破了柳无垢的读书梦，促使她立下献身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她与几个好友自封五虎将，走出校门，游行、演讲、贴标语、办壁报、宣传抗日，参加上海中学生赴南京的请愿团，与上海火车站交涉车皮，到南京从下关步行到中央军校，向蒋介石提出抗日要求，最后被蒋介石派出的爪牙遣送回沪。

1932年9月，为了探求改造社会之路，柳无垢考入清华大学社会



新南社第三次社聚餐合影（前排中为柳无垢）

学系。可是，上课用的是美国教本，与中国的现实社会风马牛不相及，宁静的校园生活和沸腾的社会矛盾形成强烈反差。1934年夏，她应谢冰莹的邀请，去了福建。在那里她看到了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已经和红军停火，准备联合抗日；在那里，她看到了农民举行大会的宏大场面，深受感动，增强了走入社会参加变革的劲头。回校后，她加入了校内“现代座谈会”，课余研究文艺、哲学和时政，进行抗日宣传。

1935年3月11日，柳无垢等十名学生，突然被北平公安局与国民党市党部以涉嫌共党而逮捕，后经父亲与舅父多方营救，才释放南归上海。短短四天的监狱生活，使柳无垢确定了一生的政治立场，决心追随共产党，争取民主抗日。1935年9月，柳无垢赴美国留学，在佛罗里达罗林斯大学取得奖学金，读社会学四年级课程，次年得到毕业文凭。1936年，为进一步了解美国社会，她在美国友人的协助下，开始整个夏天的长期旅行，参加青年学生夏令营，进半工半读劳工大

学暑期班，到阿肯州、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路易斯安娜、田纳西等州旅行，接触到美国各地黑人运动，调查了解了工会和农会的组织状况。每到一地，她总要向美国友人介绍中国学生运动，宣传抗日主张。其间，应中国人民美国友人社的邀请，赴纽约参加九一八纪念会，会上发表演讲，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执行不抵抗主义的残酷现实，演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35年秋，瞿秋白在上杭被捕，陷汀洲狱中时，暗中托军医陈炎冰把自己的书信、诗词和照片等物带给郭沫若。秋白就义后，军医将秋白遗物转交给了原十九路军军医王廷俊。王廷俊挂号寄给正在美国留学的柳无垢。柳无垢接到遗物，选择部分在中文《先锋论坛》上发表，然后送回国内，由父亲柳亚子转交给了郭沫若。

1939年8月，由廖梦醒推荐，柳无垢到香港参加孙夫人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在那里，她参加文艺座谈会和时事讨论会，结识了夏衍、胡绳、乔冠华和萧红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开始从事笔头翻译。

1942年9月，柳无垢到桂林，在桂林中学高中部任英语教师。为了教好英语，她为学生编写了《现代英语会话》，深受学生欢迎，销路很广。逐渐地，在她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这些青年后来陆续参加革命，成为运动骨干。1944年5月，桂林高中毕业会考时，出现了种种舞弊现象。柳无垢激于义愤，以真名实姓在《大公报·大公园》发表了一篇揭露买卖试题、公开贿赂的黑幕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广西省教育厅表面上严令追查，扬言澄清事实，恢复省厅名誉，其实是想把真相压制下去。柳无垢得到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支持，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可是，因为战局发生剧变，日寇逼近桂林，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人類的喜劇



柳无垢翻译的作品

桂林任教期间，柳无垢翻译了大量著作，从1942年到1943年底短短一年半时间里，陆续出版了沃尔夫的《裘儿》、萨洛扬的《人类的喜剧》、阿莱罕姆的短篇小说集等八本书。

1944年，柳无垢调到重庆的美国战时情报总局工作。在此期间，她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了英文，稍后又到新成立的昆明美国心理作战处工作。1945年10月，战时情报局更名为美国新闻处东迁上海，柳无垢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沪上之家。在上海，她不时为《世界知识》杂志翻译文章。1948年春，开始以“小宜”为笔名在《世界知识》上编辑每周一期“外论选辑”，借用外国报纸对蒋政权反动政策予以抨击，此外还在《现代妇女》上以“淑之”为笔名撰写文稿。1949年春，受一位“王先生”之托，把一封毛泽东和周恩来写的信函面交居家就医的宋庆龄，并将宋庆龄的回信转回给王先生。

1949年11月，柳无垢再次来到北京，进入外交部，在政策委员会工作，以后转入新闻司。1954年后，得了神经官能症，不时要半休或全休。她仍旧坚持参与宋庆龄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的翻译，参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进行美帝侵华史的专题研究，以郑培芳的笔名写了《美帝对台湾的侵略》等书。1963年初，母亲郑佩宜去世，心情孤寂，生活缺乏正常节奏，精神系统疾病加剧，1963年11月9日去世，终年仅四十九岁。

山歌女王陆阿妹

陆阿妹（1902~1986）原名孙阿妹，婚后从夫家姓陆。1902年出生于汾湖之滨的杨家浜（今浙江嘉善县陶莊镇汾湖村）。抗战前夕她到吴江芦墟镇落户定居，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歌手，有“山歌女王”、“江南刘三姐”之美称。

陆阿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孙华棠，在地主家做了一世长工，是当地有名的唱山歌师傅，是“歌王”杨其昌的徒弟。陆阿妹自幼跟着父亲给地主家当小长工，做牛做马，吃尽苦头。在插秧耕苗的水田里，或在罱泥撑船的湖荡上，长工们在一起你唱我和地对起了山歌，诉说东家的凶狠，人间的不平。那些或高亢粗犷、或凄惋悲愤的山歌声，濡染了阿妹幼小的心灵。

陆阿妹六七岁就开始跟父亲哼哼唱唱，到八岁时就能成段地唱



陆阿妹

了。陆阿妹没读过一天书，不识一个字，她学山歌是由她父亲口授心传的，但她自幼聪慧过人，有惊人的记忆，当时向她父亲一起学山歌的有她的表姐妹和邻居五、六个女孩，数她最聪明伶俐，一学就会。孙华棠教她们的第一只山歌是《三十六只栲栳》：“一只栲栳七十二根柳条绳，七十二根柳条绳有三块竹片来相亲……”这只山歌是记数山歌，要边算边唱。几个一起学的小姑娘全算勿出，唱不来，只有陆阿妹能一边算、一边唱出来，深得父亲喜爱，从此更悉心培养她，并把《五姑娘》等长山歌传授给她。阿妹天生有一副“刮辣爽脆”的清亮嗓子，人家说她“隔开三五片田，山青水绿也听得见”。据与她同辈的人回忆说，当年只要陆阿妹唱山歌，哪怕村上有宣卷、堂名，他们也不想听，都要来听阿妹唱山歌。当时汾湖流域盛行对山歌，阿妹和她哥哥孙启龙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对山歌，年轻的她已初露锋芒。

1923年夏秋之交，由芦墟镇商会与当地南社诗人发起，并请柳亚子先生主持，在芦墟剑王场举行了一次山歌盛会，四乡八邻的歌手都赶来赛歌。正值妙龄的陆阿妹以她清脆的嗓音、优美的唱腔以及生动的歌词，使全场震惊，被誉为“山歌女王”。这时，邻村徐河浜有个年轻长工陆介荣（小名叫阿七），是个孤儿，早被陆阿妹的山歌牵动了心。他俩同在一户地主家做长工，一边做工，一边唱山歌，共同的命运和山歌的唱和，使他俩结成了夫妻。婚后的生活是极其艰辛的，一间破草棚就成了他们的家，屋里除了一对寿碗、一双寿筷以外，什么也没有。为了还债，婚后的五年中天天吃薄粥汤，生下六个孩子，不是饿死，就是病亡，一个也没有留下。

抗日战争一爆发，这对山歌夫妻蒙受了更大的灾难。日本鬼子进行大扫荡，把他们仅有的一间破草棚也烧了，他俩只好流浪，最后就在芦墟镇落户定居。阿妹做佣人，阿七做苦工。解放后，当地政府

安排他们夫妻俩分别到中学和小学当校工，他们还领养了一个女孩，陆阿妹心里比蜜还甜，新生活的喜悦再次唤起阿妹的新歌兴。1950年芦墟镇举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对山歌，陆阿妹不但唱了她拿手好戏“急急歌”和乡山歌，还唱了长山歌《五姑娘》的片段，最后唱了她自编的《翻身山歌》，施展了她“立地编”、“立地变”的独特才情。在场的她父亲的师弟、人称“檀木头”的山歌前辈许庆福对阿妹佩服不已，自愧不如。

陆阿妹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歌手，她能唱的长、中、短山歌达五百多首。单长篇叙事山歌就有《五姑娘》、《赵圣关》、《卖盐商》、《鲍六姐》、《载阿姨》、《打窗栏》等。陆阿妹最大的贡献就是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五姑娘》。《五姑娘》最早出于19世纪中叶、清咸丰年间的“歌王”杨其昌之口，通过歌手代代传唱，才得以延续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杨其昌传给徒弟孙华棠，孙华棠传给女儿陆阿妹和儿子孙启龙。陆阿妹富有才华，她在山歌的歌咏活动中博采众长，不断加工完善，并包含了她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五姑娘》这部长歌，越



1956年5月陆阿妹（前排右五）参加江浙沪吴歌研讨会

发丰满、越发完美、越发感人。

《五姑娘》记录稿共有四千多行。1981年12月16日至20日，在苏州召开的江、浙、沪首次吴歌学术讨论会上，搜集整理者献出了二千九百多行的《五姑娘》第一次整理稿。陆阿妹到场演唱了《五姑娘》中的《阿天上工》、《绣汗衫》、《望四方》等精彩段子。其中《望四方》一段调子立即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新华社及时发消息，国内外三十多家报纸竞相报道，否定了长期以来认为“汉族无长篇叙事民歌”的传统说法。1982年5月初，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朝闻到南京参加省作协一次会议，高度评价《五姑娘》，还当场为《五姑娘》题词：“卓越的发现，伟大的诗篇”，并于5月8日专程到芦墟看望陆阿妹，听陆阿妹唱《五姑娘》，同时进行了实地调查，再次留下了“在吴歌故乡听民歌老人陆大姐唱《五姑娘》，是吴江之行一大快事”的题词。接着又在《钟山》上发表一篇《〈五姑娘〉赞》的长文。著名文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看到《五姑娘》后亦欣然题诗“莫道汉家无巨著，悠悠一曲《五姑娘》”。这是陆阿妹为民间文学所作出的不朽贡献，将永载史册。

陆阿妹是一位有创作天才的歌手，解放后她自编自唱的新山歌《翻身山歌》、《幸福山歌》、《毛主席指示到农村》、《罾泥新歌》、《十二月花名唱雷锋》、《兄妹对唱》、《新十想郎》等，热情讴歌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同时她又善讲民间传说故事，经搜集整理的有《弥陀为哈笑口常开》、《吴刚与月中桂》、《刘阿大的故事》、《大富翁沈万三》、《小头朱将军的故事》等。

陆阿妹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歌谣学会理事、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吴歌学会会员。

全国文教群英会代表姚梅凤

姚梅凤，1922年1月生，江苏武进县人，原吴江锡剧团团长，她本姓张，十岁丧父，随母辗转至吴江震丰丝厂做童工，十六岁拜“戏剧艺人”姚象兰为师，即从师姓，随师边学艺边演戏，后自建戏班。旧社会唱戏艺人被贬为“戏化子”，女人唱戏更是低人一等，地痞、流氓、恶霸经常骚扰，倍受欺凌。在常熟王墅、屯墅演出时，为抵制去伪区长鸦片馆唱小调，被勒令停演，戏班被迫解散。

解放前夕，姚梅凤与王呆初等人组建“联谊锡剧团”，经常在苏州阊门外“小荒场”演出，直至解放。



姚梅凤为青年演员凌云定妆

1950年，改名为“苏州市联谊锡剧团”，被推举为团长。她带领剧团积极排演《解放前后》、《刘胡兰》等现代戏，热情为工人、部队官兵演出。第一部新婚姻法颁布后，立即排演《姐妹翻身》、《新事新办》等新戏下乡巡回演出，社会效果显著，得到了观众和领导的肯定。

1952年10月，剧团划归吴江县领导，改名为“吴江县锡剧团”，开始送戏下乡。从城市到农村演出，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剧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不小的考验，姚梅凤以身作则，带好剧团一班人，带动全体演职员，以坚持“立足本县、上山下乡”勤俭办团。1952年到1965年，大多为露天舞台，寒冬腊月，戏台搭成面向北面，让农民兄弟朝南看戏；演出中途遇上下雨下雪不停演，花鞋湿了换上套鞋继续演，保护剧装撑起雨伞演……至1965年，剧团跑遍全县二十三个公社、七个大镇，并深入大队，建立一百三十多个演出点。送戏下乡还做到送好戏，不断丰富剧目。为此，发动老艺人一起整理传统戏，鼓励青年编剧创编现代戏。1964年，由严仁荣、许龙生根据《年夜饭》改剧《大年夜》参加地、省、华东区观摩演出获得好评，剧本还在上海、江苏发表和出版。

姚梅凤排戏刻苦认真，演戏一丝不苟。1937年夏季，她在无锡看武村班演出，对其“大陆调”有浓厚兴趣，平时就学着哼唱，后在演出中模仿应用，逐渐定型，成为锡剧“大陆调”的引进者之一。为了提高剧目质量与表演技巧，1956年至1978年，两次对演过的《三请樊梨花》进行整理加工，突出“三请”，由十本幕戏浓缩为本三本幕戏，转而汇编成一本幕戏，唱腔借鉴淮剧“连环局”等衍变为长句或长短句不一、流利自由的“大陆连环局”，设计了七十二个“为你冤家薛丁山”的唱段，使之面目一新，再现光彩，成为保留剧目。“七十二个”唱腔自成一格，被收入《中国音乐集成》。1961年参加省锡剧著

名演员流派会演，六个孟丽君同台演出，所演《君臣游园》一折，列入《锡剧名剧名家集锦》。

对青年演员的艺术成长，姚梅凤也格外关注，处处示范，事事指点。还采取现身说法，将自己主演的“三请”先后传授三代，观众戏称“四代樊梨花”。

姚美凤成为了江苏省第五、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评为全国和省先进工作者、省劳动模范、省三八红旗手，其简历被列入《中华劳模大典》、《艺术通讯》、《江苏戏剧》、《群众文化》等刊物，以《水乡一枝梅》等为题分别介绍姚梅凤的先进事迹。她在办团期间，长期坚持送戏下乡，坚持演好戏。1960年6月，吴江锡剧团受文化部嘉奖，为当时全国八个“红旗剧团”之一。同年姚梅凤出席江苏省和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教群英会）。全国群英会6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开幕时，正值周恩来总理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归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了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陈毅，向代表们作了国际形势报告，这在姚美凤的人生中书写了永远难忘的一章。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巍
峰接见姚梅凤

画家王雪蕉

1929年4月，王雪蕉出身在古镇盛泽的一家书香人家，祖父王彦人、伯祖父王镜斋都是当地的书画名人。王镜斋与汪仰真、张泰然、张貽谷、吴野洲等人在盛泽发起建立“红梨书画会”，影响至今。

当时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艺术流派即上海画派，比较著名的大家有赵之谦、任熊、任薰、任伯年、钱慧安、倪田、张熊、吴友如、吴昌硕等，王雪蕉的父亲是倪田的入室弟子，伯父则是王礼的再传弟子。

王雪蕉自幼喜爱画画，有时照茶叶筒上的西湖风景，纸匣上的花呀、蝴蝶呀，都是她涂鸦的对象。1943年，王雪蕉从苏州求学归来，那时日寇侵略中国，盛泽已是沦陷区，她父亲对她说，不受这奴化教育，还是学点自立的本领！她选择了学画。画画既继承家业，而且家



王雪蕉

中有先人的手笔，画谱、文房四宝、画碟等等样样俱全。父亲就请了她的姑丈朱乐馀教她，从此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还把楼上厢房整理作画室，养了菖蒲，说画画时经常看看绿色的菖蒲，可保护眼睛。在长辈的鼓励下，王雪蕉立下壮志写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贴在画室，作为座右铭鞭策自己。她原名王贻鼎，想改名，有人建议叫雪蕉吧！雪蕉的名字起源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所绘的《雪中芭蕉图》，用意是要在绘画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不管如何艰难，要像凌寒未凋的青青芭蕉树那样昂然挺立。

在学画的同时，她刻苦练字，柳体、欧体、赵体，大楷、中楷、小楷，认认真真地临摹，一丝不苟。不光临帖还读帖，后又临王羲之的行书，在学书法的过程中，临得最多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及赵孟頫《灵飞经》和《洛神赋》。在大雪纷飞的严冬，朔风凛冽，砚中的水用墨磨出来成为灰色的小冰片，手冻得发紫，她却毫不懈怠。夏天晚上在天井乘凉还拿字帖读，用手比划默记，这样刻苦练习，终于使画与书法相得益彰了。

三年后，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王雪蕉到上海跟随吴青霞学画。吴青霞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国画家，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均能挥洒自如，尤精于鲤鱼及芦雁，集各家之长形成工、写相兼的独特风格。每星期六下午王雪蕉到她处学画，第一次学画，吴青霞在她的册页本上画了一张紫藤八哥，她给其他同学也每人画一张，这样一个星期画一张，画完一本花鸟册页，又每人画一本仕女。1947年，吴青霞还介绍她去参加上海画人协会举办的“美术茶会”，观摩名画。后来出版的《美术年鉴》，她的仕女画《葬花图》被收入其中。她的画还参加了展览，一次在静安寺中国画苑就展出过她的《梧桐吹笛》仕女横幅，还有《桃花鳊鱼》等。

学了三年满师了，那时刚解放，王雪蕉考入了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学校在上海，在学习财会的同时还可以向吴青霞请教。1951年，吴青霞介绍她加入上海新国画研究会。195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一九五三年国画展览”，展出她的一张仕女画《采菱图》。

1954年1月，王雪蕉随爱人到了北京工作，从上海的地方单位新亚药厂调入中央单位设计总局。在北京，她尽量争取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如1956年参加北京市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画眉海棠》；1957年加入北京业余美术创作研究组，有时还到北京画院听课。

1958年，王雪蕉的工作单位设计总局撤销了，调入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做院领导的秘书。经人介绍她认识了著名女画家王叔晖。王叔晖画的《西厢记》，笔下人物把内心都画出来了，尤其是崔莺莺，画活了，王雪蕉对她慕名已久。她将作品给王叔晖看，王叔晖说画人物必须学点人体解剖及透视，让她买两本书，是中央美术学院文金扬编的《绘画应用透视学》和《艺用人体解剖学》，还送了一本王叔晖自己画的获全国连环画一等奖的连环画《西厢记》，题了“雪蕉小友惠存”，这对王雪蕉鼓励很大。她过去画仕女都是在生宣纸上画小写意画法，如今向王叔晖学工笔画，用熟宣纸画，层层渲染。1959年北京市“三八”妇女节美术展览，展出她的一张《花篮舞》，就是在王叔晖指导下画的。王雪蕉每隔一段时间去王叔晖家请教，她每天晚上画得很晚，星期日半天是绘画时间或到老师家。为了练好线条的基本功，她出差外地还带着绘画工具，晚上练习。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艺界犹如乌云压顶，王雪蕉也不敢画仕女了。下放农村，但在家时还动动笔，画点花卉。直到1979年，她从报纸上看到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美展征求作品的通知，心情万分激

动，她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她将《瑶姬献寿图》送到中国美术馆。画入选了，她又重新开始了绘画生涯。

这期间，王雪蕉认识了鼎鼎大名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家、美术理论家潘絮兹，得知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已经成立，即将举办画展，如这次的画能选上展出，就可以加入画会。王雪蕉感到很兴奋，用了二十多天时间，精心画了一张《史湘云醉眠芍药》，除醉卧的史湘云外，后面还站立两个丫环作陪衬，芍药花盛开，背景是墨色的太湖石，白色的玉栏杆，自己觉得还满意。这张画参加了北海公园画舫斋北京工笔重彩画展。1980年6月，她加入了工笔重彩画会。以后，她经常创作一些画稿，求教于潘先生。1980年11月，由潘絮兹先生介绍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后来她开始在画鱼上下功夫。1981年工笔重彩画展出了她的《鱼乐图》，以后每有机会参展，大多送鲤鱼，连送往美国东方

画廊画展，日本日中友好书画展，都送鲤鱼作品，还有几家报纸如《中国书画报》、《中国人才报》等也登了她的鲤鱼作品，天安门城楼也收藏她的鲤鱼作品《鱼水情深》。

此后，她又认识了擅画山水及古鉴定，曾任京华美专教授的周怀民，王雪蕉每年总要到周怀民家看望。1982年，周怀民介绍她参加了民革中央成立的“中山书画社”，中山书画社活动较多，每年举办书画



鸟语声中春意浓
王雪蕉画

《鸟语声中春意浓》 王雪蕉绘

展，还举办十位女画家联展及中外女画家联展等，给她带来了另一番天地。

1984年10月，王雪蕉被列入了《中国妇女名人录》，该书于1988年3月出版，由康克清同志题字。1987年9月王雪蕉退休后，曾在机电工业部老年书画研究会教离退休干部画画，还举办了个人画展，她的艺术生命又焕发了青春。

“女相如”杨德

杨德是吴江同里人杨千里的女儿，她的前半生在动荡中度过。1938年，日寇入侵中国，她经上海到了香港。日本人占领香港，她先后辗转 to 奕荫街、山村道、山光道等处居住。1942年夏天，她冒充成当地的百姓逃出香港，此后又风雨兼程，半个多月后来到了桂林。两年后，云贵战事又起，一家人便离开桂林逃往重庆。她曾在桂林中山中学和重庆沙坪



杨德拿出父亲在桂林“留芳园”制作的扇子

坝的南开中学读书。在这期间她得到了名师的教导，在桂林，她的语文老师是秦牧；到了重庆，丰子恺女儿丰陈宝教她英语，要求严格，这使她在以后的岁月中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还喜欢上了丰子恺的画。

1946年，杨德转学回到上海，进入上海第一市立女中读书；1948年，杨德参加高考。她说，那时有“东吴”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她，燕京大学当时是美国资助的，校长是司徒雷登。1948年8月，杨德到北京燕京上学。到了“燕京”后不久，她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解放前后，她在“燕京”学了四年英语，一年俄语，毕业后被分到中宣部创办的《学习》杂志工作。

杨德喜欢英文，到了中宣部，翻译“联共党史”，翻译《斯大林全集》中的有关篇章。1958年，反右派斗争开始，随后，《学习》杂志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杨德被调往《红旗》杂志编辑部文教组。就在那一年，父亲杨千里去世，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远在苏州的母亲没有告诉她。当时，《学习》杂志的大部分人都去了《红旗》，而这次的任务是批“苏修”，从学习“苏共”到批判“苏修”，这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场大变革，中央以《红旗》为载体，九评“苏共”。那时杨德主要做一些文字的编辑及引文的核对等。1967年，在“自报公议”中，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陈伯达对杨德大肆批斗、迫害。二年后，她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偏远农村。

当时她住在一个贫农家，是土坯子搭的房子，用水靠轱辘从井里拉上来，因为力气小拉不动，她把儿子也带了去，母子俩一起拉水。冬天的时候没有炭火，竹篱笆围的墙出奇的冷，4月份下田插秧，腿冰冷冰冷的，她带去的高统鞋不能穿，“军宣队”不让穿，要她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从那时起，杨德生孩子时落下的风湿性心脏病加剧，一米五八的她只有四十公斤了。

1970年，陈伯达垮台，“军宣队”却将消息封锁了，直到1975年夏天，杨德才得以回到北京。那年，中央政治研究室要一些外文材料，在北京图书馆设立了“文献研究室”。于光远是她的老上级，她回北京的第三天，便到“北图”上班了，和她共事的有很多都是著名人物，像汪衡、巴人等。

1978年，国家出版局（即现在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需要一些著作权研究者，杨德又被调去那里工作。在国家出版局工作时，她在汪衡的带领下，与大家一起研究英、法等多个国家的版权法规，翻译世界知识产权资料，这为后来国家《版权法》的制定打下基础。1983年，杨德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她参与翻译出版了施拉姆的《毛泽东传》。

毛主席逝世后，文献室接受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一项目，负责人就是著名党史专家、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后来中央又派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来当组长，还给杨德派了两名研究生，她到图书馆查书目，请人从香港购回书来，在搜集的大量资料中，施拉姆的《毛泽东传》成为当初研究毛泽东的最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



杨德与父母合影

书全文作了翻译，不删一字，其中的第七、八章的一部分，第九、十章和结束语是杨德翻译的。历时三年、倾注了她和同事们的巨大心血的译著观点客观、史料丰富，受到了好评。

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原因，1988年，杨德申请了提前离休。她把这以后的自己称为“最后的译者”。离休以后，只要身体允许，她就想翻译些东西，而这个阶段所翻译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东西。她翻译了《尼克松回忆录》、《难以捉摸的中国人》、《拿破仑传》等，她也翻译《美国性史》、《美国黑人斗争史》甚至是谭恩美的小说《灶君娘娘》等，这些译著有二十多本。

杨德是个才女，早年曾得到柳亚子的赞赏。1949年，她在“燕京”上学时住在表哥费孝通家，天天来回于学校与表哥家之间。那时，柳亚子住在颐和园边，有一天，柳亚子去探望郑桐荪，两人在路上偶遇。她问候说：“柳老伯，您好”，柳老则问：“你是千老的女儿吧？”两人就此聊了片刻，柳老回去后写了这首诗赠给杨德：“扶容岛上簪花子，八桂村前快雪书，何意相逢隗市好，亭亭玉立女相如。”把她比作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的司马相如。这位被柳亚子称为“女相如”的杨德，后来果然不负重望，在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

出版家黄宝珣

1928年，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编辑部来了一位年轻女子，成为韬奋处理读者来信的一名助手。她叫黄宝珣（1906~1996），吴江松陵镇人，当时二十二岁。

在生活书店孕育时期，《生活》周刊只有两个半人，后来韬奋说起当年的情形道：“自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注：指《生活》周刊），自十七年十月，黄宝珣女士是加入的一个人。”

生活书店在《生活》周刊时期，就是以“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种子”。抗战爆发，生活书店从上海撤到武汉，再到重庆，黄宝珣一直在韬奋身边做秘书工作，任经理室秘书，兼文书科科长。直至皖南事变，各地的生活书店被国



黄宝珣



《生活》周刊

国民党反动派一一封闭，邹韬奋愤而出走香港，书店同仁大量疏散，黄宝珣亦不得不另谋生路，到了香港。

1941年底香港沦陷，经东江抗日人民游击队营救，黄宝珣和韬奋夫人沈粹缜一起到了东江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风闻大批文化人进入东江，派两个师的兵力包围游击区，切断通向曲江、桂林的道路。黄宝珣在东江

等待两个多月，才有机会与旅港剧人团一起离开东江。她向韬奋告别时，韬奋叮咛道：“在桂林有不少书店的同事，他们有的合作办出版社，有的摆书摊，你可以和他们合作，继续宣传进步文化。”

黄宝珣牢记韬奋的叮咛，到桂林后赤手空拳办起一个耕耘出版社，请郭沫若题写了耕耘出版社的社名。耕耘出版社可不一般，黄宝珣决心继承生活书店的传统，在稿件取舍方面得到茅盾、沈志远、胡绳的帮助，所以耕耘出版社出版的书到全国解放以后，还有重印价值。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代史》，第二本书是《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黄宝珣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在桂林出版了十多本书，耕耘出版社初具规模。日本帝国主义向湘桂发动疯狂的进攻时，黄宝珣把存书抢运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等待五日五夜，最后只身逃往重庆，又是一贫如洗。后来在黄炎培、杨卫玉的相助下，使她获得贷款，重振旗鼓，在闹哄哄的重庆出版界，以坚持出版进步书籍为特色而占有一席之地。

柳亚子对于这位独立奋斗的同乡女性，一直给予关注和爱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毛泽东主席在与蒋介石谈判的间隙约见柳亚子。柳亚子于8月30日带着黄宝珣到曾家岩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在得知耕耘出版社的情形后，鼓励黄宝珣要“坚持下去”。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在1950年再次约见柳亚子，柳亚子再次想到他的小同乡。这一次，他接受黄宝珣的委托，带着黄宝珣参加“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得到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册》，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主席题了“又工作，又学习”；总理题的是“为努力于人民出版事业，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重庆的接见，北京的题词，成为黄宝珣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荣耀和光辉的一页。

黄宝珣从重庆甫到上海，就把她三个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女儿委托生活书店同事黄慧珠带去山东解放区，她决心无牵无挂地投身进步出版业。她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张晓梅手里接过一本福尔曼著《中国解放区见闻》的译稿。她抢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到上海就忙于掠夺“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尚未顾及文化统制的时候，抢印了几千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宝珣并不满足于有啥出啥。她在谢冰莹帮助下，从桂林开始策划组稿，到重庆才有成果的《女作家自传选集》，就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例子。其中收有子冈的《自愧与自勉》、安娥的《我怎样离开的母亲》、白薇的《跳关记》、林北丽（林庚白夫人）的《二十七年的旅程》、彭慧的《简单的自传》、赵清阁的《也算自传》、谢冰莹的《平凡的半生》等等。何香凝也接到她的约稿邀请，以诗一首回报。耕耘出版社把她的手迹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

耕耘出版社函命余追述奋斗成功经过，迄今追昔，不愿多述，忍痛奉题拙诗以报命：历史再虚谈，愧看先烈血，国破又民饥，羞在人间列。

何香凝题于桂林（印）

三十三年六月

黄宝珣对书的装帧和文学作品的插图，也没有忽略。艾明之的《饥饿的时候》，收入几个短篇，有丁聪的五幅和朱今的四幅插图。耕耘出版社注重出书质量，它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多数能一印再印。

全国解放，黄宝珣想起1941年在香港韬奋对她说的话，她到北京找徐伯昕，说了她想把耕耘出版社归并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回三联书店工作的想法，得到徐伯昕的支持。出版总署很快批准黄宝珣的申请。黄宝珣与三联书店总经理，也是她在生活书店的



黄宝珣（前坐者）和三联书店的人在一起

同事部公文商定：全部存货交给三联，销售所得归还耕耘向银行的贷款；全部纸型、版权无偿交给三联书店。当时有结余人民币二千元，黄宝珣把它捐献给国家用于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黄宝珣本人到三联书店和商务、中华等五家联合建立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任供应科科长。1953年中图公司奉命并入新华书店，黄宝珣改任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业务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期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被污蔑为“黑店”。黄宝珣以个体劳动支撑起一个小小的出版社，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扫地出门，遣返原籍。“四人帮”覆灭，黄宝珣得到平反，重新获得北京市的户口，被安排在版本图书馆工作。1989年，经过多年追求，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

“丝绸之母” 费达生

在苏州城西浒墅关镇一个幽静的小院里，住着一位鬓发皆白、身材瘦小的百岁老人。她总是默默地坐在竹榻上，剥茧、捻丝，这样的动作仿佛已是她生活的全部。她的名字叫费达生，被亲切地称为“丝绸之母”。



费达生

费达生是费孝通的姐姐，1903年10月1日出生于同里镇。十四岁入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学习，受到蚕丝教育家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郑辟疆的熏陶，立志献身祖国蚕丝事业。1920年夏，从女蚕校毕业，学校选派她去日本留学，次年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东京农工大学前身）。留学期间，她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以蚕丝兴国，成为我国的强劲对手，又因经常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歧视，更激起了她发愤图强，挽回利权，重振祖国蚕丝事业的决心。

1923年夏，费达生从日本回到母校。郑辟疆拟把培育的改良蚕种及科学养蚕技术向农村推广，女蚕校成立了蚕业推广部，请她参加推广部工作。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由校长带领推广人员，携带桑苗、蚕种、蚕具、蚕茧、丝车等实物、模型、图表，到吴江县各乡镇巡回宣传科学养蚕。1924年春，费达生与推广部的胡咏絮、张兆珍、许杲等人一起，到濒临太湖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建立了第一个蚕业指导所。当地农民生活贫困，养蚕使用土种、土办法，蚕病不断发生，她们看到有的农户因蚕茧欠收而上吊、投河、家破人亡等悲惨情景，激起了她们做好农村养蚕指导工作的决心。但是由于农民受数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对接受科学技术存在种种阻力。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组织起二十一户人家参加的蚕业合作社，使用女蚕校培育的改良蚕种，用科学方法饲养。当年，社里的春茧丰收，各户收入成倍增加，从此得到农民的信任 and 欢迎，推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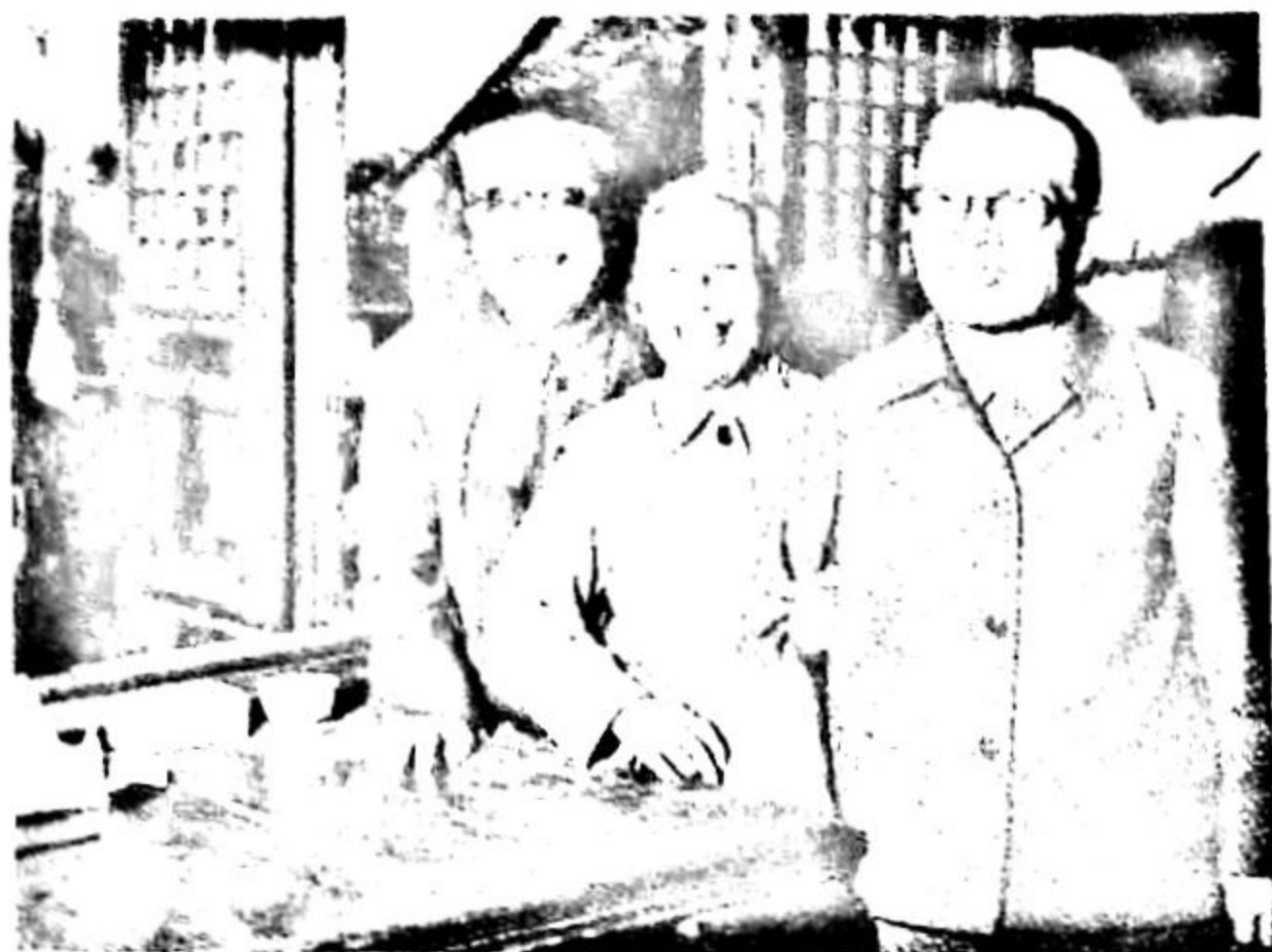
1925年费达生接任女蚕校推广部主任，继续带领人员到开弦弓村指导养蚕，合作社扩大到一百二十户，组成五个小组，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合作社蚕茧的产量和质量，大大优于普通农户，群众纷纷要求入社。有些贫苦农民，蚕本不足，推广部为他们作保，向银行贷款，售茧后偿还本利，农民都恪守信用。

开弦弓村蚕业合作社科学养蚕的信息，迅速传遍了太湖周围的乡镇。几年时间女蚕校推广部在吴江县的七都、八都、严墓，吴县的光福、西山，无锡县的洛社、玉祁，武进县的横林、戚墅堰等地设立了蚕业指导所，帮助周围农民组织蚕业合作社，实行科学养蚕，人们赞美她们为“蚕花娘娘”。

费达生在日本学的是制丝技术，回国后看到国内的丝厂设备陈旧，管理落后，生丝品质低劣。她下定决心，要改革我国的制丝工

业。随着养蚕科学技术的推广，制丝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1926年女蚕校蚕业推广部改为蚕丝推广部，仍由费达生任主任。她先在吴江县震泽镇进行土丝的改良，举办制丝传习所，研制了木制足踏丝车，至1928年改良丝车达到九十二部，改良丝的售价可比土丝提高四分之一。1929年她又在开弦弓村，组织蚕农入股，争取银行贷款，创建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她自行设计，建造厂房，采用的设备是粤商欧谭惠然赠送给女蚕校的日本式小型复摇式机器。社内工人都是农家子女，经过一段技术培训，即上岗操作。他们平时作工，农忙时务农。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我国农民最早经营的制丝工业企业。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为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所吸引，1935年接受费达生的建议，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其名著《江村经济》就是此次调查后写成的。费孝通教授由此提出发展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0年女蚕校增设制丝科和制丝实习工厂，费达生任科主任和厂长。当时日本已对制丝技术作重大改进，所使用的立纡车禁止出口。费达生同制丝教师张复升（也曾在日本留学），研制成功“女蚕”式立纡车，属国内首创，在实习工厂安装了三十二部，提高了生丝的产量和品质。无锡瑞纶丝厂业主吴申伯同意将设在无锡玉祁镇的丝厂租给女蚕校推广部管理，进行技术改造。女蚕校将厂名改为玉祁制丝所，由费达生任经理，带领一批技术骨干进厂工作。此后，女蚕校推广部在吴江平望创办了平望制丝所，又租借吴江震丰丝厂改为震泽制丝所，费达生身兼三厂经理。这三个制丝所还与周围蚕业合作社建立了代烘、代纡业务联系，使绸厂获得优质的原料，也提高了蚕农的经济收入。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女蚕校和蚕丝专科学校校舍，以及校办制丝实验厂大部分被毁，开弦弓村生丝精制合作社及震泽、平



费达生与费孝通夫妇

望、玉祁制丝所都焚烧殆尽，令人万分痛心。

1938年，费达生与一部分技术人员辗转跋涉到四川重庆。她决心在此把散居各地的师生、校友集中起来，创造复校条件，并发展蚕丝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她的愿望受到四川丝业公司的支持，委任她为丝业公司制丝总技师，并拨出一幢房屋，专为接待入川师生和校友之用。第二年，郑辟疆率领逗留在江苏、上海等地的师生也到了四川，江苏女蚕校和蚕丝专科学校在四川乐山复课。1938年“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下设的生产事业组由女教育家俞庆棠担任组长。她计划在四川展开蚕丝技术改造，聘请费达生主持这一工作。费达生受聘后即去川南乐山一带调查，看到川南的自然条件很好，开发蚕桑的潜力很大，这里的桑叶比苏南的湖桑叶大得多，且气候宜人，她认为只要有好蚕种和技术指导，蚕丝业一定可以发展。从乐山回到重庆，向俞庆棠汇报了视察情况，经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洽商决定以乐山、青神、眉山、峨嵋、井研、犍为、夹江等七县为川南蚕丝实验区，任费达生为实验区主任。

抗战胜利，费达生等回到江苏，受中国蚕丝公司委托，协助接收

日商苏州瑞纶丝厂。她进厂后，把该厂改名为苏州第一丝厂，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工作，即恢复生产。接着又进行了技术和管理上的改革。此后，她又到处奔走，历尽辛苦，使女蚕校制丝实验厂重新建立，恢复生产，资助了复校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费达生以更高的爱国热忱和事业心，为全面提高蚕丝业、重振祖国丝绸雄风而努力工作。建国初期，她在中国蚕丝公司任技术室副主任。1956年她在江苏省丝绸工业局任副局长，1958年她任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1961年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在任副院长其间，主持把日本定粒式缫丝机改为定纤式缫丝机，提高了工效。在此基础上，又组织联合攻关，于1962年试制成功D101型定纤式自动缫丝机。这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自动缫丝机，经纺织工业部定型鉴定，推广到全国十多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中，费达生经受冲击，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她被任为苏州丝绸工学院顾问。1981年江苏省科委在吴江庙港乡，进行提高蚕茧出丝率的课题研究，聘请费达生为顾问，创出全国较大面积蚕茧出丝率的先进水平。与此同时，费达生又协助庙港乡缫丝厂改造和更新设备，改进制丝工艺，提高生丝品质。该厂生丝连续数年被评为江苏省优质产品。几十年来，费达生与吴江等地农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乡亲们还尊敬地称她为“费老太”。

“中国板栗之母” 柳 窰

1997年秋天，澳大利亚栗树专家乔·里纳多专程前往南京，拜访一位两次在国际栗树会议上作过学术报告的女士，这位女士叫柳窰。那次会面，乔·里纳多怀着深深的敬意对一生从事板栗研究的柳窰说：“You are the mother of Chinese chestnut!（你是中国板栗之母！）”

柳窰的父母都是吴江人，小时候她常常住在平望外公家，二年级



柳窰在工作中

到周庄念小学，退休前在中科院中山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副所长、党委副书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柳鏊的祖上都是习文的，曾祖父柳无涯曾任吴江县议会议员，1898年将全家人从北岸大胜村移居周庄，与陶惟坻等创办起了周庄小学，一生从教。祖父柳抟霄也是以教书为业，加入新南社后，积极宣传新思潮、新文化。而父亲柳惠初更是选择了中学教员的职业，抗战时学校内迁，从上海到重庆、贵州，一路教书育人，期间曾受从伯父柳亚子的嘱咐，协助尹瘦石组织书画展，为抗日募捐，宣传革命真理。也许是对自然有一种天生的钟爱，柳鏊没有继以文道，而是在野生植物的广阔世界里探索研究，并在板栗研究领域里找到了另一个世界。

1956年，柳鏊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科院中山植物园后，就一直工作、生活在这里，这是个她呆了大半辈子还没呆够的地方。

柳鏊在前期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认为要改变我国板栗生产面貌，提高产量的技术关键是选育良种，改革传统的栽培技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省农林厅和省科委的支持下，她一面对植物所试验园内引进的六十六个板栗品种进行比较鉴定，一面主持在全省开展群众性的板栗选优活动，选出了一批优良品种。1975年，柳鏊与新沂、邳县多管局合作，在新沂炮车果园和邳县陈楼果园建立了全省首个板栗良种密植丰产示范园和低产栗园高接换种示范园。柳鏊和当地群众工作生活在一起，时而蹲在地上尝试幼树嫁接，时而爬上数米高的大树进行大树改造，这一项研究使板栗幼树三年投产，五至六年开始高产，与当地传统栗园比，提早结果七年以上，产量提高二十倍左右。研究成果在全省产生了影响，各地板栗主管部门纷纷组织前来参观。在烈日炎炎下，柳鏊与果农一起修枝、防病治虫；秋风乍起时，她站在栗

树下观察、记录；冬天，她又在寒风中剪下可作嫁接的枝条，晚上在灯下将它们封蜡、捆扎好；到了春天，她又常常趴在田头地间，一点点地教果农们嫁接。

1977年，柳逵和她的同事合作编写出版了《板栗》一书，这本书是科学出版社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全国农村青年组织编写百本科普读物之一。该书备受广大果农的欢迎，到1988年又再版，共三次印刷，并获首届全国农村图书“兴农杯”二等奖。

“七·五”计划开始，板栗研究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在此后的十五年中，柳逵承担了国家和省的攻关课题及基础、应用、推广课题十余个。柳逵边研究、边实践、边推广，在良种选育方面，她选出了九家种等六个丰产优质、食用多样化、成熟期不同的优良品种，形成一组配套良种；在栽培技术方面，又探索出一套促进早期丰产的技术，在国内同行中率先提出一条以计划密植、良种配套、就地嫁接、低冠矮干和集约管理为关键措施的现代技术栽培路线，她同时又提出了板栗遗传变异沿生态地理梯度变化的理论。1990年，盱眙县把发展板栗作为开发全县山区的重要途径，聘请柳逵为总顾问，新建栗园七万亩。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全省板栗面积由1985年以前的五万亩增加到了五十万亩，这些新开发的栗园主要分布在省内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这让当地果农走出了一条依靠现代科技种植板栗的脱贫致富新路。

1990年，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同志邀请柳逵等专家一起去闽西老区考察。历史上长汀板栗素负盛名，但当时栗树已寥寥无几。

中国果树志

板栗 榛子卷

科学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柳逵主编的书籍

项南建议中山植物研究所与连城、长汀建立技术协作关系，柳鏊与她的板栗组协助重建“汀江板栗带”。

为完成这一扶贫项目，柳鏊与课题组同志全力以赴，在当地建立良种母本园和试验示范园，并把优质栗苗运往闽西，每年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和技术培训，1997年长汀县三千四百亩新建栗园发生栗疫病，柳鏊立即组织课题组人员从南京送去特效农药，并随员前往指导防治技术，及时扑灭了病害。1999年，六十五岁的她又亲自将绿肥苗送到连城，并与当地群众一起栽种，建成了十万亩的“汀江板栗带”。

同年，四川巫山县县委书记为了寻找当地脱贫路子，找到南京，请柳鏊提供技术协作。柳鏊去巫山山区考察时看到了满山遍野的野栗树，她顿时萌发了利用野生栗树就地嫁接的想法。她当即让两位同志送来良种接穗，就地改造野板栗树。嫁接获得成功，原先的野板栗经改良第三年就结果了。这一经验很快在巫溪、奉节等县推广，后来又进一步在陕西汉中秦岭山区的佛坪、城固县推广。

1992年，世界第一届栗业大会在美国召开，柳鏊是中国唯一应邀参加的专家，她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板栗发展与现代栽培技术”的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会后大会主席写信感谢她“鼓舞人心”



柳鏊在意大利访问

的报告将大会推向高潮。”1993年，柳逵又在意大利作了题为“中国栗树种质资源”的报告，会议期间意大利自然科学院森林遗传所所长找到柳逵，意欲和她一起合作开展“板栗多样性等位酶变异”研究项目，意方负责一切费用。1998年，第二届国际栗树学术研讨会在法国举行，柳逵被邀请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后，大会主席举行家宴感谢柳逵并祝贺她的成功主持。

在国际舞台上，柳逵把中国的板栗研究带进了国际协作网，国外同行称她为“国际栗树专家”、“中国板栗女士”。

吴江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徐彩珍

徐彩珍，吴江莘塔人，是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吴江历史上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那时候的徐彩珍才二十八岁，在屯村担任乡里的妇联主任。

1973年的一天，正在村上开展工作的徐彩珍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通知她到乡里开一个重要会议。乡党委书记找她谈话，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告诉她，她已经成为了整个吴江唯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徐彩珍

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个人都战战兢兢过日子，怕出什么纰漏，特别在政治上更是谨慎。当县委书记告诉她已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她很是惊讶，但也不敢询问具体细节，谈完话就回屯村继续工作了。

徐彩珍是66届吴江中学高中毕业生，在学校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到毕业那年，正好全国取消高考，徐彩珍便无学可上了。后来她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回到莘塔参加农业生产，1971年调至屯村任妇联主任。那时候吴江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有三个要求：回乡知青、女性、非党人士。当时组织上推荐了三个符合条件的同志，徐彩珍是其中一个。考察期间组织上去吴江中学调查，徐彩珍的口碑相当好。就这样，她幸运地成了吴江历史上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徐彩珍又回到屯村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期间没有人跟她提起过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当时又处在“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时期，徐彩珍只想着一心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差点忘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回事了。

1975年1月5日下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徐彩珍平静的生活。那天下午，徐彩珍正在屯村乡下工作，突然有人跑来告诉她，乡党委书记来电话，要求她放下手中的活，马上返回乡里开会。当她气喘吁吁跑到乡里，乡党委书记只说，赶紧回家带上几件换洗衣服，火速赶往吴江县城开会，至于具体开什么会却只字不提，而当时的政治氛围也不适合追问。当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徐彩珍回家匆忙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后，就出发了。

那时候从屯村到吴江县城还没有通公路，除了坐船，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而从屯村到吴江县城只有上午十点有一班轮船，错过了这一班，意味着只能等第二天才能到县城去了。面对这个情况，乡党委

书记立即叫下面的生产大队安排一艘挂机船，大队书记派一名同志送徐彩珍到吴江县城开会。

晚上八点钟左右，大队挂机船在松陵垂虹桥东的一个码头靠了岸。等到了县委大院，吴江县委政工组的领导已经在等候她了。徐彩珍到了，就被安排坐上一辆吉普车，快速往苏州驶去。一路上，领导只是关照徐彩珍要多带几本笔记本，出去参观多记一点回来学习。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晚上九点多钟，吉普车到了当时的苏州地区招待所。

6日早晨起来，一辆大客车直接把招待所的九个人送往南京。到了南京的一个宾馆，省委秘书长来给大家开会，一行人才知道这次神秘之行的目的是去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委秘书长在会上宣布代表纪律，明确“三不”要求：不通讯，不会客，不外出。

在南京逗留数日开预备会议后，10日早晨，省委安排专车将代表们送到南京火车站站台，汽车直接停在人大代表专列门口。而车站除了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外，没有其他乘客。就这样，两天一夜后，大家从南京到了北京。

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那届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身体已经不太好，没有出现在大会上。而周恩来总理依然抱病出席了大会。会议审议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那时候大会要在每个省代表团中选出两名代表去参加监票工作。幸运的是，徐彩珍被大家推选为其中的一员。当时监票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在前一天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演练，所以后来徐彩珍经常开心地说：“那次的全国人大会议，我比别人多去了一次人民大会堂。”

那时候的选票足有一米多长，和现在的不一样，当时采取等额选

举的方式。如果自己选这个人，就要在这个人的位置上做记号，不做记号的视为同意。

短短几天的代表大会结束了。在徐彩珍印象中，那一届大会主要是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宪法的修正案，很少有代表提议案讨论。四天后，代表们陆续离京，返回各自的岗位。

1975年之后，徐彩珍很长一段时间还担任屯村乡的妇联主任，直到1983年被调至屯村宣传委员的岗位。后又担任过屯村镇副镇长、常务副镇长等职，2001年年底退休。徐彩珍常说：“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尽全力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吴江第一个全国劳模沈宜宝

沈宜宝，吴江松陵镇湖滨公社胜建大队人，1918年6月出生。九岁替人看牛，十一岁以二石五斗米卖给地主作丫头，十四岁赎回做女长工，十五岁做了童养媳。

共产党来了，沈宜宝的苦日子过去了，她就一心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积极学习养蚕新技术。1952年虽然家人反对，她还是坚持不用人体“窝”蚕法，采嫩叶给稚蚕吃，采取加强桑树培肥管理，实行药剂消毒等措施，提高桑叶产量，使蚕体健壮。当时，沈宜宝是六户养蚕家庭的共育组长，为推广养蚕新技术，她自己出钱买了糊器纸，一家家糊器换叶。共育组员周金生的老婆迷信生人进蚕室要晦气的说法，就把一碗水浇在上门的沈宜宝身上扫晦气。组员的不理解，曾经让沈宜宝产生过畏难情绪，领导的及时开导、鼓劲，坚定了沈宜宝克服困难不动摇的信心。1952年，全县春蚕平均张产四十八点一斤，沈宜宝获得了张产八十一斤九斤的高产量，比周金生张产多产了二十五斤，周金生老婆懊悔地说：“早点听宜宝话就好了”。沈宜宝

增产的事实使周金生信服了她，他上门要求沈宜宝去替他蚕室消毒，并表示要积极参加共育活动。1954年，全县平均张产四十八点一斤，沈宜宝获得了张产八十九斤的高产量，成为全省蚕茧高产的典型。

在养蚕路上，沈宜宝有坎坷也有艰难。1956年大蚕时，社里闹叶荒，群众到处埋怨，有的说：“听沈宜宝话只能一根绳二头勒（吊死）”。沈宜宝急得哭了二天二夜，三天不吃饭，结果县长、区长、乡指导员都给予了支持，发动群众动用几十只船到外地采购，动员全乡人出力，终于解决了缺叶问题，产量仍有七十八点六七斤。

沈宜宝深情地说：我历年高额丰产是怎样得来的呢？主要是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1954年8月沈宜宝入党后，她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养蚕中，沈宜宝做到不怕吃苦，在饲养蚕儿时很当心，忙碌时往往几个夜晚不睡觉。一年夏天，社里养四十五张秋蚕，天热不少蚕儿得了病，沈宜宝二天二夜没睡觉，在十二个小队来来去去检查指导，脚上走出泡来也不叫苦。群众更相信沈宜宝了，有个老太太说：“靠了宜宝才享了丰产的福”。

“要丰产再丰产”是沈宜宝的自我要求，在江苏省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上沈宜宝是这样说的，她更是这样做的。她孜孜以求的学习、敢于实践的收获，育蚕方法上她主要采取：重视精选桑叶，合理储藏；根据气候环境灵活掌握温湿度的高低与蚕座稀密，达到蚕儿充分饱食；适时收蚁，细致操作，使损伤遗失少，结茧率高；注意清洁卫生，保持蚕室蚕具干燥及空气新鲜。沈宜宝多次在大会上交流和推广养蚕先进技术，从而推动了周围社、乡和全区的养蚕生产。当时，全区春期张产七十三点五斤，秋期张产五十二点一斤，成为全县最高产量区。沈宜宝通过自身努力不但摘掉文盲帽子，还把自己成长经历撰写成《从

童养媳到养蚕模范》一本，1958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于沈宜宝在养蚕生产上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给了她很高的荣誉。1952年出席华东劳模会议并授奖，1953年获华东金牌奖一块，1955年出席省蚕桑高额丰产会，1956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纺织工业生产先进者会议获金牌奖一块，1957年出席全国劳模代表会获金牌奖二块，1958年、1959年出席省劳模会议获金牌奖，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吴江第一批），1955年至1964年出席省一至三届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出席省妇代会，当选为省妇代会执委，1961年特邀为中央蚕桑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沈宜宝曾二次幸福地与毛主席亲切握手、拍照。

沈宜宝六十多岁时，还干劲不减当年，除做好妇女工作外，每年她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到公社蚕站工作，还经常帮助长板片四个重点养蚕大队作技术辅导，勤勤恳恳工作，全年出勤二百多天。

1985年6月28日，沈宜宝因患肝癌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吴江第一批全国三八红旗手

白衣天使杨雪琴

杨雪琴，1918年7月出生，高中文化，平望地区医院副院长、妇产科负责人。1952年开始搞妇保工作，二十七年中从一名普通的妇产科助产士成长为具有比较丰富的妇产科临床经验的医师，1979年被推选为吴江第一批全国三八红旗手。

杨雪琴自1952年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请过事假，即使父亲病危，儿媳生孩子，她都没请过一天事假，一心扑在工作上。1975年至1979年连续三年出满勤，年年有超勤。1974年，杨雪琴肝炎反复发作，她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工作，放弃病假三次，共六十天左右。1977年她放弃公休假十二天，超勤十余天。逢年过节，她总是主动在科室值班。

当时六十二岁的杨雪琴在科室里年纪最大，但干劲最足，她样样工作走在前，干在先，连拖地板、擦窗子、打扫卫生等都抢着干。1977年夏天，她从坛丘公社巡回医疗三个月回来，而遇上了院里要派

人到南麻公社巡回医疗，她不顾年纪大，天气热，又主动请战继续奔赴农村第一线，为农村妇女群众查治妇女病和做节育手术。在坛坵巡回过程中，她和其他成员随访女扎病人一千零四十七人，发现其中有六人手术失败复孕，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手术方法，提高了手术质量。

杨雪琴原为妇产科助产士，1957年去无锡进修一年，对妇产科的许多手术只看到过，但没有做过，有些甚至连看也没有看到过。为掌握过硬的技术本领，她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虚心请教，查阅资料，大胆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一般妇产科手术她都能胜任。她亲自做过各种妇产科手术三百到四百例，从无责任事故发生。从参加工作到1979年的二十七年中，她亲手接产约五千到六千例，从无事故发生。接横位近百例，上产钳近百例，以及其它各种难产数百例，从无发生过子宫破裂和其他手术事故。盛泽新民厂女工徐向军产后大出血，晚上十二点多转到平望地区医院，当时，人处于昏迷状态，血压、脉搏已无。值班医生急忙赶到杨雪琴家请她，她立即赶往医院进行抢救，经过认真检查发现产妇是子宫内翻，不应用宫缩剂，马上采用其他抢救措施。杨雪琴快速、正确、果断的诊断，使产妇避免了开刀痛苦。经过大半夜的抢救，第二天早上，产妇就脱离了危险。这样的例子，对于杨雪琴来说举不胜举，为此，科室里的同志对她都十分敬佩。

杨雪琴不但自己熟悉各种妇产科手术，还热情耐心地教青年医生，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们。她的行为带动着全科室一班人，当时该科室多次被镇、县、地区、省评为先进集体。1976年，杨雪琴代表科室出席省计划生育、妇幼卫生、幼托工作的先进代表会，并在会上交流了先进经验，成了当时卫生系统的典型。

妇女带头人孙玉英

孙玉英，1944年9月出生，1979年，她与沈宜宝、杨雪琴三人被评为吴江第一批全国三八红旗手。

当时，孙玉英在桃源镇广福大队十三队妇女队长的岗位上干了十六年，生产队的工作以务农为主，她总是出工走在前，收工在后头，重活、脏活她抢着干。生产队妇女的派工都由她负责，她关心全队妇女，耐心细致做妇女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她们的贴心人。在她的带领和教育帮助下，全队恋爱婚姻、敬老爱幼、投工投肥、节钱节粮、节制生育工作都搞得比较好。

在生产队处理三扩大中，她家也有两棵树种在集体田的边缘上，她丈夫认为，种在集体田上的树是应该砍掉的，但等大家动手了再砍也不迟。孙玉英说：“我是生产队的干部，是妇女主任，怎么能与群众一样等呢？领导不带头，群众没劲头，集体被私人侵占的土地就无法收回。”由于当时夫妻两人思想不统一发生争吵，一不小心，孙玉英被丈夫推倒在河里。为了坚持原则，维护集体利益，孙玉英从河里爬上来后，换掉了湿衣服，不顾丈夫阻拦，立刻亲自动手砍掉了种在集体田边的两棵树。在她的模范行动影响下，全队被私人侵占的八分多集体的土地，全部收了回来。

当时，公社提出实现农村沼气化的要求，群众对沼气认识不足，怕搞不成浪费时间和钞票，



孙玉英近照

都不愿意先动手搞。面对此情况，孙玉英认为，沼气是通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群众一时不能接受，干部不能等着瞧。当时，孙玉英丈夫正好外出不在家，但困难难不到她，她拼凑了家里的钱，买好了搞沼气需用的材料，晚上，她一个人就先动手开沼气潭，在亲邻们的帮助下，等她的丈夫外出回来，沼气池已经砌好了。在孙玉英的带动下，全队十五户人家三天之内都开好了沼气池，全队实现了沼气化。

养蚕是生产队的主要副业生产，也是一项技术性、责任性较强的工作。孙玉英任了生产队养蚕组长，为夺取蚕茧高产，她认真刻苦钻研养蚕技术，每逢养蚕季节，她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甚至一二个小时，吃饭要人催，一心扑在养蚕工作上。在她的指导下，加上全体养蚕组妇女的共同努力，1977年生产队春蚕张产九十一斤，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每次养蚕，孙玉英总是把自己的房子挤出三间来，让集体养蚕，宁愿自己住得紧一点，柴草放在露天霉烂掉。特别是每年养夏蚕，为了降温把蚕养好，她在自己房子的瓦面上厚厚地盖上几层稻草。她说：“只要能使集体的蚕养好，我家的瓦损坏一点不要紧。集体好了，我的损失也值得的。”

在生产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中，孙玉英带领全队妇女大干苦干，挑走高墩，填平洼地。1976年春节前，生产队领导下达每人完成十个土方的任务，孙玉英带领全队妇女起早摸黑，年三十下午还照常大干，仅两天多时间就完成了土方任务。1977年冬天挑土中，孙玉英一只脚底被划破了一寸多长，鲜血直流。但是这位妇女队长咬紧牙关，轻伤不下火线，在寒风刺骨、冰霜泥泞的工地上，她在受伤的脚上套上一只破袜子，继续和姐妹们并肩战斗，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完成任务后，才高高兴兴地和大家一起回家。三个冬春的改田造地，孙

玉英带领全队妇女共挑土方一万多个，造地六亩多，为改变生产队的面貌作出了贡献。1978年该队稻麦田产达到二千零二十八斤，社员分配水平平均每人一百三十元，干部群众都夸她是妇女的好带头人。

全国先进小组王瑞娟小组

王瑞娟小组是吴江红卫丝织厂力织车间甲班第四小组，小组由九名女挡车工和一名保全工组成，这个小组负责挡四十八台织机，织造413斜纹绸，131电力纺，五十八双绉等远销重洋的高档丝绸产品。

组长王瑞娟1970年进厂，她做事认真负责，是一个做不怕，累不倒的铁姑娘。她虚心向老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在操作上严格遵守规程，对质量一丝不苟，工作上敢于挑重担，困难的事抢着干。她不仅赢得了全组同志的信赖，也获得了全班，全车间和全厂同志们的好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她总是不声不响地顶着逆流，坚守岗位，埋头苦干。粉碎“四人帮”后，她更是挺着腰杆，以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倾注全部精力，一心扑在生产上。1977年被评为厂学大庆标兵，并出席了省工业学大庆大会。

在王瑞娟的带领下，全组十个同志组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这个小组中既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也有进厂不久的新工人。尽管年龄有大小，思想有差异，技术有高低，体质有强弱，但是她们

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共同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她们之间做到思想上互相帮助，技术上互相学习，生活上互相关怀，工作上互相支持。“决不能拖小组的后腿”是她们共同的语言。

县劳动模范张桂英是该组年龄最大、技术最好的老师傅，她总是把最大的精力、最好的技术用到生产上，是全厂优质高产的能手。她总结了自己的操作经验，给工人上技术课。工人碰到什么疑难问题，她总是耐心地指导，特别是她的严谨的工作作风，成了工人学习的榜样。她的一句精辟的话，叫做“废话少说，废品少出”，突出地体现了她那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张桂英严、细作用影响下，严守岗位，严肃纪律，严格执行操作，也就成了这个组的特点。

在这个小组里，组员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组里不管哪一个同志患了病，小组里就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走访，集体的温暖和同志们的关怀，使那些患病的员工得到了宽慰，从而使这些员工安心养病，早日恢复身体健康。一些患病的员工，也常常是人在家里，心在厂里，惦念着小组的生产，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上班干活。有一次，陈连珠同志胆囊炎复发病休在家，当组里工作转入夜班时，她考虑到夜班一般出勤率低，为了减轻其他员工的负担，就主动要求上班，组里的员工劝她休息，她说“我不能拖小组的后腿”。李玉珠胃病发的时候，痛得要死要活，医生给病假，也不肯休息。

“一人忙，众人帮”是该组保证产量、质量的主要环节。有的员工小病小痛坚持上班，组里的人知道了以后，就主动上前帮忙，减轻她的劳动强度。在平时的生产劳动中，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像徐万花、陈圆圆，邱珍福三个，经常你帮我装行，我帮你通改，使另一台纺机正常运转。一旦有人遇到特殊故障，一个人往往会显得手忙脚乱，这时，组里就互相帮助，使这个员工能定心地，顺利地处理绸面

的毛病。接近下班出了毛病，车间里挡车工都把它叫作“关夜学”，组内的同志就主动留下来，帮她一起处理好毛病后一起下班。一次，上午八时突然停电，有两个组员的几台纺机断边很多，“关夜学”了。组内就有一半同志留下来，一起帮忙，突击“抢险”紧张地战斗了三个多小时，才把活做好。一个小组十个人，平时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她们积极发挥小组的作用，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组里有一个青工，一度沾染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思想不求上进，劳动纪律松弛，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对这种事情，小组管还是不管？她们认识到，作为一个集体，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管好四十八台机子，更需要管好十个开机子的同志；不仅要消灭绸坯的疵点，更需要克服思想上的疵点。于是，正副组长就利用各种机会，对她进行耐心热情的帮助，终于使这个女青年转变了过来。纪律加强了，产品质量提高了，过去无病装病，现在有病也坚持上班。有一次，该女青年睡眠落枕，脖里也扭不过来，大家劝她休息，可是她坚持歪着脑袋脖子开机。

1979年，王瑞娟小组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成了吴江丝绸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吴江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真正得到了解放，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妇女组织。婚姻法宣传取得效果，在团结、生产、民主、和睦、夫妻共同进步、尊婆爱媳的家庭氛围逐步形成的同时，吴江妇女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各项工作。广大妇女参加供销、生产、信用等互助合作组织和农业劳动，在学习上推广各类先进耕作技术，在三百四十三个合作社中有女社员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名，占劳动力的45.55%，她们在插秧、治虫、积肥、选种等劳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各行各业有女职工一千三百六十四名，她们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给国家创造和节约了大批财富。涌现出了正副社长四十七人，社务委员二百三十二人，还有许多的养蚕模范、纺织先进工作者。有二千五百五十三名妇女积极分子，积极宣传动员并带头卖足粮食。如芦墟区莘西乡的妇女主任张阿珠、迮明珍用走村访户的方法，联系了二十多个村里的青年妇女，白天黑夜协商、分工负责完成了村里统购任务六万八千斤。黎里区藏

龙乡妇女代表张春宝带头在冬季破冰卖粮，以实际行动完成国家计划，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全县有三百八十八名母亲动员儿子入伍，三百一十三名妻子动员丈夫当兵，二百一十七名姐妹动员兄弟应征，使征兵任务圆满完成。在1953年的人代会上，女性在乡镇代表中占16%的比例，其中有正副乡长八人、委员一百二十二人。

1955年5月，吴江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二百三十七名，列席代表十名。从5月7日召开至9日结束，历时三天。吴江民主妇女联合会宣告成立。会前，吴江县民主妇联筹委会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会议主要内容：贯彻省妇联妇代大会精神；讨论和通过“吴江县两年来妇女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正式成立吴江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通过“民主妇女联合会组织章程”（草案）；选举产生县妇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二十五名，候补委员七名；选举出席省妇代会代表五名。王淑敏担任主任，张瑞秋担任副主任。还选出了王淑敏、沈爱宝、范雪娥、贾碧薇、陈二娜五位代表出席省妇代会。

大会还提出了对今后几年的规划：

一是继续发动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运动，开展农业生产运动，整顿巩固现有的农业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运动，巩固现有的农业社，发展互助组，团结单干户，妇女要克服狭隘、自私、保守思想，发挥积极性，学习掌握各项技能，同男子一起参与农业生产。要增积自然肥，争取二次肥料当做一次基肥一起施，推广密植，捕杀螟虫，以争取超额完成全县农业生产各项指标。西南部养蚕地区，要争取蚕茧丰收，支援国家建设。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在灾区，要克服悲观消极心理，开展有销路的副业，度过灾荒。

二是发动广大女工继续贯彻增产节约运动。发动工业女工做好本岗位工作，努力学习先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挖掘增产潜力，遵守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料、降低成本，做到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加工订货计划。手工业女工也要做好本岗位的工作，保证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并向合作化方向努力。与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工属，应努力搞好家务，提高职工的出勤率。

三是继续动员各方面的妇女，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商业和合作社机关中的女工工作者，应加强商业管理上的计划性，改善服务态度，为畅通城乡物质交流而努力；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女工作者，要积极钻研业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从事文化教育的女工作者，应继续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教育质量与教育效果，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要教育女学生更好地响应毛主席“三好”的号召，克服强调个人兴趣及怕吃苦等不正确的思想，根据国家的需要，服从分配；发动家长们，配合学校，做好对子女的教育；从事医务卫生的女工作者，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而努力；继续教育与发动工商界的妇女，遵守国家法令，服从国家计划，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是发动妇女继续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发动农村妇女把余粮和油料作物，继续卖给国家，发动市镇妇女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节约粮食，反对铺张浪费，服从国家计划，并随时揭发奸商对统购统销的破坏活动。

五是围绕中心工作，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发动妇女经常关心军烈属、复员建设军人的情况，帮助他们克服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同时，应发动军属充分发扬爱国热情，保证在后方搞好生产，搞好家务，鼓励亲人在前方安心卫国。配合各方力量、运用具体事例、结合生产和

各项工作，宣传贯彻婚姻法，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为了解决妇女在生产上的困难，可采取以农业社为单位或亲邻相帮的方法，发动组织农忙托儿所组。教育妇女关心儿童身心健康，对待子女不溺爱、不虐待、教育和培养他们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制止某些地区的溺婴恶习。

六是充分发挥基层妇代会的组织作用，逐步按生产单位，整顿、牢固妇代会的组织，切实贯彻阶级政策，使女工、工属和贫农妇女（包括新中农）以及其他劳动妇女成为基层妇代会的骨干，要加强妇代会的领导，使党的政策、主张，在妇女中得到正确贯彻。随时注意将各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进步、劳动积极、能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妇代会的组织中去。

钢琴演奏家唐可

唐可女士，祖籍吴江，美国“钢铁大王”唐仲英先生的妹妹。唐可五岁开始学习钢琴，十九岁赴美留学，早年师从齐尔品夫妇。1964年获美国卜钟士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在普林斯顿研读钢琴教学法。1968年，她在音乐家的摇篮——朱丽亚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曾先后在纽约纽约克大学、菲律宾西利曼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教授钢琴。在此期间，她又攻修音乐演奏，1978年取得美国南加州大学音



唐可

乐博士学位。1981年起，唐可女士在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的阿尔伯马尔学院任教，并以客座教师身份在多所大学举办讲座。1983年，她开始与美国著名的切姆比弦乐四重奏团合作演出室内乐。此外，她曾在美国十五个州演奏过钢琴，并在香港举行过两场独奏音乐会，所到之处，声誉鹊起，被评价为“功力深厚，修养全面”的艺术家。

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对唐可女士来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她每天练琴六小时，有时甚至达八至十小时。凡是音乐会要演奏的曲目，无论是独奏曲、奏鸣曲还是协奏曲，她全部都能背下来。那种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热爱，使她战胜了一切困难，终于成为饮誉国内外音乐界的著名钢琴家。唐可的演奏细腻而充满感情，对乐曲的诠释准确而深入。她认为，一部好作品并非就是一串音符的铺设，因此演奏者必须充分了解作品的背景和内涵，把整个身心融入作品中去。她不止一次地对学生们强调：“要用心灵去演奏”。齐尔品大师的夫人李献敏教授曾经这样评价过她：“唐可女士不仅是出色的演奏家，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教师，在她的学生中获硕士学位者已达四十多名，目前在美国一些著名的音乐学院，如朱丽亚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等院校中都有她的学生在攻读。”

唐可女士是一位纯艺术型的东方女子，为了推动中国的音乐事业，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唐可频频往返于美国和中国。1981年起，她已不下十几次在北京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进行讲学，并在南京、吴江、杭州、西宁、兰州、乌鲁木齐、成都、济南、昆明等地进行演出，她的演奏常常博得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唐可女士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在演出讲学之余，她就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她说，只有来到中国，她才能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她要把自己的艺术才华全部奉献给祖国人民，让悠扬的琴声飘荡



唐可在教孩子学琴

在大洋两岸。唐可女士那种对艺术不顾一切的执着追求和那种东方女子温柔善良、谦恭热情的性格，就这么刚柔结合恰到好处地揉进了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中。而遨游在音乐世界中的种种快乐和幸福，又冲淡了她在生活中的种种不快和艰辛。

唐可说她很喜欢吴江，这是个陌生又亲切的名字，这个在她童年少年时就无数次听母亲说起的家乡，对她来说永远是个香甜的梦。

我国第一位艺术教育学博士钱初熹

钱初熹，1953年3月生，吴江松陵人，是我国第一位艺术教育学博士。她的祖父钱崇威是著名书法家，父亲钱今昔是华师大教授。她自幼受到良好的学校与家庭教育，树立了勤奋好学、酷爱艺术的决心。

1969年3月，刚满十六岁的钱初熹下放插队至赣南山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可她仍坚持自学，使英语、数学和美术达到了大学水平。1974年回到上海，曾拜著名美术家郑鹄为师，学习中西绘画。又向其叔父，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钱景长教授学习美术理论，并有多幅作品在上海市的美术展上展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她先后考取了上海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专业和华东师大中文系，试图把美术创作和文学理论深入结合，探索艺术教育的新路子。为使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此时，她还任职



钱初熹

于上海普陀区少年宫，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获取了艺术教育学的第一手资料。她所指导的儿童画，题材新颖，技法独创，曾多次被选送到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展出，获得过一等奖。

1991年9月，钱初熹东渡日本，进入筑波大学艺术学院，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筑波大学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许多日本学生往往也无法进入，一般外国学生进校研读后，至少要经过二三年的时间才能正式考取博士研究生。可钱初熹勤奋苦学，少打工多读书，夜以继日地苦练日语和专业，只花了半年多时间，就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艺术教育学的博士研究生。这在日本高教界曾传为奇迹。

日本的博士生要读五年，分两个阶段，即二年度硕士学位，成绩优秀者，方可再攻读博士课程三年，最后通过严格的论文答辩，才可获得博士学位。所以即使是日本籍的学生，能五年顺利地得到博士学位的也极少，一般需要六七年才能如愿，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只能结业，得不到学位。可钱初熹女士却只用四年时间，即在1996年3月就经历以上考验，读完了博士生全部课程，通过论文答辩，再经文部省的审核，获得了艺术教育学的博士学位，这又是一个奇迹。她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艺术教育博士学位的人。

在日本求学的四年时间里，钱初熹以自己的勤奋和悟性创造了一个个奇迹。那时，她的年龄已经超过四十岁了，按照日本的有关规定，研究生的甲级奖学金只能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可是由于她的刻苦好学、成绩超群，竟破格授予她每月十万日元的甲级奖学金，这是非常罕见的。生活俭朴的她竟然花不了这笔普通的收入，却积累下来用于购买电脑，更多的是用作参加各种艺术研讨会的经费和购置图书。几年来，她在日本购置的图书已相当于国内一个中型图书馆了。她参加了国际美术教育学会、日本艺术教育学会、日本高校艺

术联合会、日本全国美术家协会等四个国际或全国性学会，这些都是我国留日学生中罕见的。在日本期间，钱初煮在日本最高级的艺术学报——《美育文化》、《艺术教育》、《日本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的论文达十篇之多，在香港美术教育专刊发表论文一篇，期间在国内的《中国美术教育》月刊上发表五篇论文和译文，她的论文被日本权威美术界人士评为富有独创性和开拓性的高质量美术论文，她的论文被陈列于日本国家图书馆内。

毕业后，许多日本学者都热情邀请她到日本的大学做研究员，并开出了丰厚的待遇，给予很高的地位，可她考虑到五年前离国时的诺言“东渡日本是学习先进的艺术教育学理论，回国后一定要贡献毕生，为国服务”。所以她毅然于1996年9月回到祖国，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为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前途，她愿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在这一片新开辟的艺术园地上，以有限的人生来换取一株一苗的成长！

著名作家范小青

范小青，苏州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吴江县插队务农，19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1985年调入江苏省作协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为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十七部，代表作有《城市表情》、《女同志》、

《赤脚医生万泉和》等，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代表作有《瑞云》、《城乡简史》等，电视剧代表作《费家有女》、《干部》等。《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2010年1月31日至2月3日，江苏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会上，范小青当选为新一届江苏省作协主席。她说：“江苏有那么多好作家，把我推到这个位置，是大家给我的信任。我唯恐辜负了



范小青

这种信任。所以把它当做一种鞭策，无论在写作还是工作上，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范小青的“就职感言”，犹如她的文字，朴实无华。听起来，给人的感觉甚至过于平淡。但恰如她自己所言，无论她的个性，还是她的小说，表面上看来很“温”，其实这平静之下却暗藏潜流，需要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深处的激烈矛盾。

对文学，她看得很重，“文学和创作永远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再忙再累，它也从来没从我的内心隐退。”

无论工作还是创作，对现在的她而言，恰如胡适所言：做了过河卒子，唯有拼命向前。“纵有再大的压力，我相信我能撑住，未来的路，我会走得更好。”她如是说。

如她自己所言，谈文学总是最开心和最轻松的。话题从广义的文学开始，之所以这么说，因了她自己对作协行政工作的理解。在她看来，作协的“这些事儿”尽管琐碎、繁杂，好在跟文学相关。而她总是习惯于把组织上的事物文学化，“比如，我们去年开的网络文学研讨会，让传统文学写作者和网络文学写作者聚在一起，切磋交流，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其中的快乐和收获，不是读什么书、写什么东西能得到的。”

两年前，范小青担任江苏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而后又成了党组书记。她坦言，刚开始时多少有些不适应，“在作协当主席、副主席未必要做很多实际的事情，是可以超脱的。进入党组工作，说白了就是进了机关，每天是雷打不动的上班时间和处理不完的行政事务。在小说中，你跟自己描写刻画的人物是有距离的，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到了真正生活里，碰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要解决实际的问题，的确有些难！”



范小青在接受采访

谈及江苏作家长篇小说创作。她说：江苏文学在全国实力还是很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中、短篇小说等创作上。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相比的确弱了一些，至今也未曾拿过茅盾文学奖。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其中自然有地理、人文环境方面的影响。江南独特的人文风貌，造就了江苏作家婉约、细腻的风格，似乎先天就缺少些厚重和沧桑感，缺少一种大气象。不过，我们要反过来问，《红楼梦》不也写的江南么，它的风格不也极尽婉约细腻么，为何它有大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作家更要从自身找原因。江苏作家好在心态稳，沉下心来写作，因此他们的作品水准都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线上。但有时心态太稳了，要寻求一种突破和超越，反而有些困难。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作为同样从生活底层奋斗出来的作家，范小青对基层作者的艰辛和不易深有感触。她说：大家习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业已成名的作家身上，忽略了那些长期默默无闻坚守在基层的作者。实际上，正是有

了他们的坚守，江苏文学才可能有百花盛开的今天。因此，江苏省作协一直注意拓展自己的职能，让文学的触须伸展得更广、更深。我们的目光要一直抵达市、县、乡、村，抵达每一个基层的写作者。尤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作协会员偏少地区，我们更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在发展会员的问题上，在各种读书班的名额数量上，在作代会代表的名额分配上，都适当给予照顾。

说到江苏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范小青在为江苏文坛“四世同堂”的盛景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表示担忧。她说，目前江苏的文学创作人才后续储备严重不足。如果十年二十年后再看江苏文坛，还能拥有今天的优势吗？因此，她更希望江苏有一大批“70后”、“80后”作家，包括年轻的网络作家能迅速涌现、成长起来，就像田径接力赛，希望每一棒都能跑出江苏文坛最好的状态。

范小青到底是清醒的，因为清醒，她没有“避重就轻”，在谈到江苏文学成绩的同时，更多的是自我检省，同时让这种检省转化成一种前行的动力。正因为此，她有着一种开放、达观的心态。“坦白地说，对网络文学我不排斥，但读了也没什么感觉。然而现在这个职位上，我就有责任对此表示密切关注，要看到网络文学是文化多样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作协的工作，未必要强行把它涵盖进来，但至少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在她看来，尽管她是作协主席，但个人的力量到底是有限的，作协的工作需要和班子成员一起齐心协力才能做好。“说实在，我并不要求我们的作家兄弟姐妹，帮我做多少实际的事情，但一想到他们在精神上给予我的强大支持，我心里就倍感温暖。”

两年来，在行政工作之余，她依然坚持文学创作。“虽然从时间、精力、情绪上讲，都有相当大的困难，但还是尽力克服，不断

写出新的作品。”2008年和2009年两年间，尽管没能照以前那样的进度，每隔两三年就推出一部长篇，但她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笔耕不辍，发表了二十来篇，还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手头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也已完成了大半的内容。

曾经插队落户在吴江农村，范小青早已把吴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每年总要来好几趟，对吴江的文学发展、对吴江的业余作者她总是关爱有加、鼓励不断，吴江有什么活动邀请她，基本是有求必到。范小青，正用自己的创作成绩和实际行动为吴江的文学事业提供一种前行的力量。

梅花奖得主王芳

王芳，国家一级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理事、苏州市文联副主席。“江南有幽兰，生长姑苏间”，说的就是她。她演出的《长生殿》轰动台湾、北京，她被称为苏州昆剧的品牌。



王芳

王芳的祖籍在吴江震泽，她的父母均是震泽人。虽然她出生在苏州，但每年的寒暑假，必定回震泽小住。王芳从小就被公认为嗓子好，被同学叫做“高音喇叭”。1976年，十三岁那年，她被南京越剧团、江苏省歌舞团、江苏省苏昆剧团纷纷看中，最终，当大学教授的父亲认为昆曲的文学底子厚，同意她进了苏昆剧团。那一次，上千人里只招了三十人。

王芳的开蒙戏，便是昆剧《扈家庄》。前上海京剧院院长、苏昆负责人吴石坚，请施雍容老师以昆剧武旦戏《扈家庄》教她，并

称“武戏开蒙，终生受用。”1980年，王芳以这出武戏获得苏州专业剧团汇演一等奖，从此拉开了在艺术之旅上不懈探索的序幕。十年之后，她又以唱做并重的《出塞》获得江苏省第二届青年戏曲演员大奖。此后，王芳文武兼备而以文戏为重，在1994年先后以《寻梦》获得全国首届昆曲青年演员交流演出兰花奖旦行第一名，又以《思凡》荣获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986年，苏昆剧团开设免费的昆曲星期专场，但即便这样也没能留住观众。看着剧团一年都没有几场演出，才二十多岁的王芳也陷入了迷惘之中。

为了生存，1992年，王芳到观前街上一家婚纱店兼职帮人化妆，她一边打工一边练功，期待能有复出的机会，而这一等就是三年。1994年，昆曲举办全国性的汇演，王芳听闻，欣喜若狂。汇演中，她不负众望，夺得了全国昆曲名旦角第一名，同年，三十一岁的王芳又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梅花奖”，这些都极大地坚定了她在昆曲舞台上发展的信心。

2000年，苏州举办了首届中国昆剧节；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目光一下子聚焦到这个几经波折、近乎濒危的剧种上来，昆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作为国家一级演员，多演戏、演好戏是其应尽的本分。王芳每年要在各种场合上演二百多场昆曲剧目。除了注重大戏的排练之外，她还致力于传统折子戏的整理、提高并推进其新生。其《白兔记·养子》一折，化用了话剧和舞蹈的表演手段，用磨盘后手指的舞动，象征临产的艰难和痛苦，将观众的关注之意与同情之心都悬在了半空。她与几位同事们一起，在2002年荣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促进昆剧艺术奖”。



王芳在昆剧《牡丹亭·寻梦》中剧照

2004年，苏州昆剧团推出百年难得一见的三场版《长生殿》，在台湾巡演数月，王芳扮演的杨贵妃轰动两岸观众，被评价为“气质纯正而高贵、动作简约而优美，表情丰富而含蓄，唱腔甜美而到位，舞姿轻盈而有节，显示出人物塑造和艺术创新的又一重高度。”很多人说，看王芳演的《长生殿》，能看出她四十年的生命体验，三十年的艺术积累。简约、本色却入木三分。即使是跳霓裳羽衣舞，也没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哨动作，“舞蹈有尽而娇态无尽”，专家评价她真正把握了人物的灵魂，在演出中每舞到此，剧场中总要掀起阵阵欢呼。

连续两届，王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也是昆曲界唯一的一名代表。王芳说，现在国家已经把京剧纳入到中小学教育中，自己也要呼吁加强对昆曲的保护，让昆曲这门古老艺术代代传承下去。

亚运会金牌得主梁懿

和许多著名运动员一样，在梁懿位于同里镇东新村的家中，父母珍藏着她从吴江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百米冠军荣誉证书到1998年亚运会金牌的一大摞奖牌和证书。从苏州市第一名到江苏省冠军，从全运会银牌到东亚运动会金牌、亚运会金牌，梁妈妈细数着一枚枚奖牌，仿佛带着我们重温了梁懿近二十年的田径生涯。



梁懿在比赛中

1976年出生的梁懿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就展示出她良好的短跑天赋，在本校及吴江市的运动会上频频夺冠，并且运动成绩遥遥领先于第二名。很快，她被吸收进了吴江市业余体校接受训练。在吴江训练的最初两年，由于梁懿年龄还小，父母三天两头往吴江跑，帮她料理生活。那时候搞体育训练没有现在待遇好，孩子训练的服装、鞋子，平时的伙

食费、外出比赛的费用等都需要家里补贴，再加上来回照顾孩子的车费，这对当时并不富裕的梁懿父母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从初一开始，梁懿到苏州市体校参加训练。初三起，梁懿被选送到南京参加训练，第二年便正式进入省体工队。由于她良好的潜质和刻苦的训练作风，省队重金聘请曾获奥运会奖牌的外籍教练带她训练，仅短短一年时间，梁懿的短跑成绩便突飞猛进，先后拿下了江苏省第十二届、十三



梁懿在传递奥运火炬

届运动会短跑金牌。她在全国田径锦标赛、第二届东亚运动会上获女子100米跑冠军，在曼谷亚运会参加女子4×100米接力与队友合作夺得金牌，在亚锦赛中又夺得百米铜牌。九运会拿了银牌后，梁懿萌生退意，但在主教练谭洪海的执意挽留下，梁懿又义无反顾，担当起了带领小队员全面备战十运会的重任。那时，梁懿不仅是队里的顶梁柱，更是教练的好帮手。教练如果有事外出的话，就会把带领队员训练的任务放心地交给梁懿。

十运会上，梁懿起到了稳定江苏代表队军心的作用。

梁懿在体育界脱颖而出，曾获得江苏省政府记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江苏省“三八”红旗手、省“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

梁懿退役后，在苏州大学担任体育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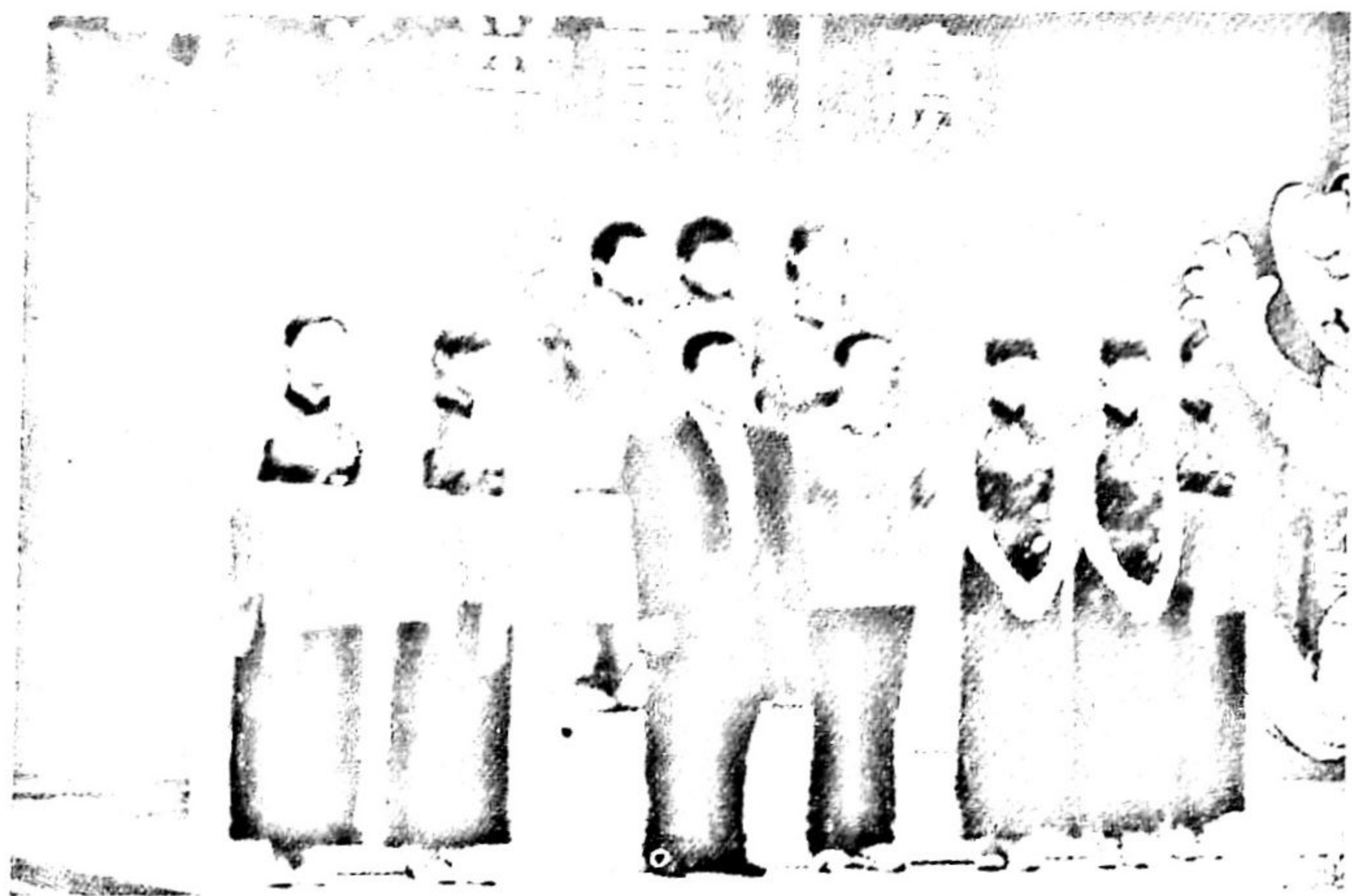
全国女子举重冠军王珠

在2005年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十运会上，吴江女子举重运动员王珠和陈艳青、顾薇、杜烨莹四人被授予“国家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从平望走出来的王珠，1988年出生，小学参加田径训练，因具有超强的爆发力，被苏州市女子举重队选中，三年后进入江苏省女子举重队，为陈燕青的队友，曾获得过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六十公斤级



王珠(右)在领奖台上



王珠获十运会63公斤级举重季军

冠军。

王珠从小学习努力，在吴江业余体校练田径的那段日子，学习成绩依然门门都是优秀。她是个非常乖巧的孩子，特点是爆发力特别强，正是由于这一点，她被苏州体校举重队教练一眼看中。

练习举重多少会影响到女孩子的身材，当时教练们认真征求了王珠父母的意见，王珠妈妈不舍得独生女儿去吃苦，而王珠爸爸却说，他自己虽然身材不高，但比起挑担来，左邻右舍没有一个是他对手，在遗传基因作用下，他深信女儿练这一行会有出息。懂事的王珠则宽慰妈妈说：“练举重天天在室内，比练田径轻松多了，你就让我去吧。”从此，十二岁的王珠便走上了举重的道路。

王珠在苏州举重教练的调教下进步很快，一年多后就被输送到省队，2005年6月19日她顺利进入国家队。由于成绩优异，被苏州大学体

育学院录取。

2005年，苏州市承办了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女子举重、男子手球、现代五项、水球、女子篮球、击剑、羽毛球七个项目七个大项九个场次的比赛，是全省除南京市外承担十运会办赛任务最重的城市。在苏州赛场上，夺得六十三公斤级女子抓举铜牌。全国第十届运动会女子六十三公斤级第三名，并超世界纪录，获全国运动员一级奖章。11月9日，十运会（苏州赛区）参赛办赛表彰大会在市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王珠受到了表彰。

2006年；王珠参加了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1日，是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下午的女子六十三公斤级比赛是中国的王珠、埃及的曼苏尔与俄罗斯两名选手科普伊洛娃、夏依洛娃的较量，然而王珠没有发挥应有的水平，得了第四名。但在这次锦标赛上，王珠得了挺举铜牌，也为国家争了光。

柔道冠军王娟

2001年的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上，十九岁的王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出人意料地为江苏女子柔道队赢得了一枚银牌。经过四年的磨砺，王娟的运动成绩日益突出：2003年由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的第三届青岛柔道公开赛上，获得七十公斤以下级冠军；2004年的全国女子柔道锦标赛上获七十公斤级季军；2005年十运会女子柔道七十公斤级冠军；2006年全国女子柔道冠军赛七十公斤级冠军；2007年全国女子柔道锦标赛七十公斤级冠军；2007年世界杯女子柔道团体赛冠军，成为吴江第一位世界冠军。



王娟

幼时的王娟就显得特别男孩子气。王娟在坛丘中心小学上学时，在钮小荣教练的带领下练习篮球，在五年级时代表吴江参加苏州市小学生篮球比赛中，她的勇猛和力量深深吸引了苏州体校柔道队的蒋云

教练。就在下一年，她就跟着蒋教练到苏州练起了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柔道。从最初的好奇到整天没完没了的摔打，让十三岁的王娟非常吃力 and 厌倦，刚到苏州不久后的一天，她竟偷偷地溜回家想不干了。父母虽然文化不高，但对她晓之以理：做事要有始有终，先苦才能后甜。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一早，王娟就重新归队，从此她再也没有对家人说过一个“累”字。“看我身穿白色的柔道服，国旗在身，我感到无比自豪……”这些是王娟寄给父母的出国比赛留影照片后面的文字。娟秀的字体下赫然展现出王娟开朗、热情、自信的个性。

王娟的个子不高，从身体条件上看，她并不占优势。之所以能从一批运动员中脱颖而出，主要是靠刻苦的训练。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全队训练结束后主动加练，别人练八次的动作她就练十次。无论在江苏队还是在国家队，王娟都属于完全不用教练操心的运动员，她不但自我要求很严格，训练中也很爱动脑子。国家女柔教练组组长、王娟的主带教练刘佳岭对弟子不吝溢美之词。对于教练的夸奖，王娟谦虚地说：“练柔道确实挺苦的，一般人可能忍受不了，但我没觉得有什么，大概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本身就比较能吃苦吧。”

她的母亲潘菊英说：“王娟小时候像个男孩子，爱与比她大的男孩子玩，冬天赤了脚卷起裤腿到塘里去抓鱼，也不怕冷。胆子比她哥哥要大，夜晚在田埂上走路时，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王娟就跑到哥哥的前面，还不停地吓哥哥。”“有时候，跟村里的男孩子打架，还常常取胜，气得父亲不行。”

2008年3月，全国女子柔道锦标赛暨2008年奥运会选拔赛在吴江市体育馆举行，29日中午11时，女子七十公斤级的比赛打响，王娟在前两轮比赛中以两个漂亮的“一本”拿下对手，但在第三场较量中，王娟遇到了实力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天津选手窦书梅。双方一开场就展开



王娟在比赛中

激烈争夺，主场作战的王娟有点心急，一次失误送了对方一分，结果就是这一分之差让王娟无缘决赛。

在晚上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实力明显高出对手一筹的王娟只用了三十六秒，就用一个漂亮的“一本”将上海选手姚玉婷击败，获得了七十公斤级的第三名。王娟在七十公斤级比赛中拿到一枚宝贵的铜牌。

2008年8月13日王娟参加了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柔道女子七十公斤级淘汰赛，遭遇到了日本名将上野雅惠。第一轮，上野雅惠战胜了韩国选手朴佳软。次轮面对王娟，上野雅惠表现不错，比赛开始不久就获得了一个效果。比分落后的王娟有些着急，又被上野雅惠得到了一个有效。随后王娟发动猛攻，终于得到了一个效果，但比分仍然落后。比赛进到4分02秒时，王娟防守露出破绽，被

上野雅惠偷袭成功，得到了一个一本。最终上野雅惠成功晋级八强，而王娟则与决赛无缘。随后在复活赛第一轮，王娟曾以一个有效战胜了韩国选手朴佳软，但是随后的第二轮复活赛王娟没能闯过匈牙利老将，2007年世锦赛第三名梅萨罗什·安妮特这一关，结束了自己的奥运之旅。

虽然王娟在奥运会上失利，但是，向同级别的世界高手们发起挑战，同时她也挑战了自己的人生高度，成为了吴江妇女的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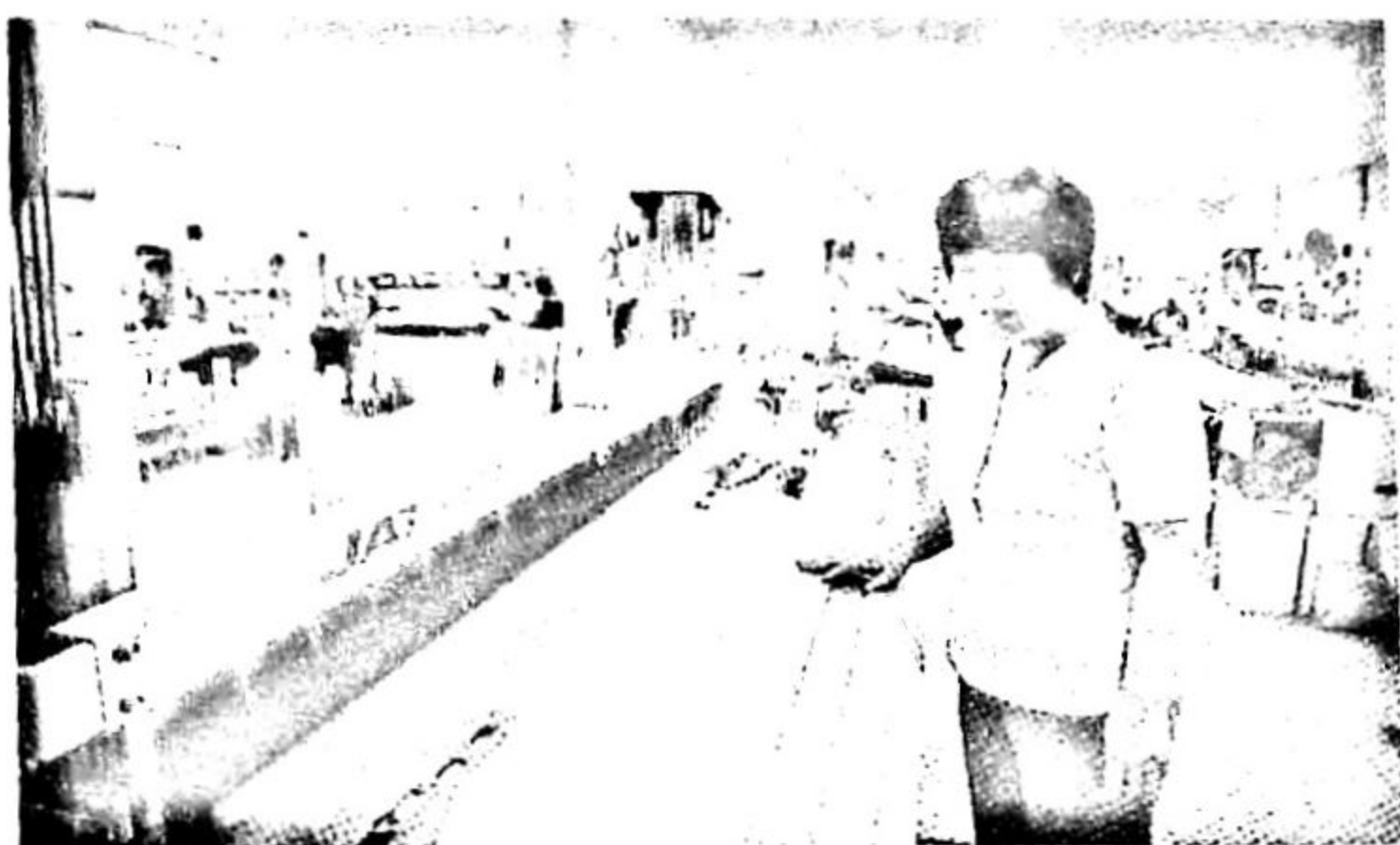
巾帼农贷：助推妇女创业

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近年随着经济发展而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而女子办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更是新鲜事。

2009年1月，在平望镇，吴江市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开业了，经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面向“三农”发放小额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经省主管部门审批的其他业务。营业面积八百五十平方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二亿，一下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以“巾帼”命名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在吴江是第一家，在全国也是第一家。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钱阿玲，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杰出创业女性”。她于1999年创办了“吴江市汉通丝绸喷织厂”，购买了二十台织布机，开始自己生产面料。作为曾经的下岗女工，钱阿玲从开厂招收第一个工人起，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优先招收下岗工人。时至今日，“汉通”招收的下岗工人已经超过二百人。

十年艰辛，十年拼搏，到2008年，钱阿玲已经成为一名拥有二



钱阿玲在车间

个厂区，日产高档流行面料十六万米的知名女企业家。其自主开发的“聪明玲珑”系列面料连续五年获得中国流行面料奖。

2008年，为了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全国开始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得知这个消息，钱阿玲顿时激动起来，自己创业时的一个辛酸经历浮现在眼前。那是1999年，钱阿玲刚开办工厂筹备设备时，为买一台高档的进口织机，她自己筹措大部分资金外，还向某家银行谈妥贷款一百二十万元，可等到机器运抵上海港，银行方面突然变了卦。“创业难，农村妇女创业更难，农村妇女创业想要融资难上加难！”钱阿玲想，如果能创办一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就能帮一把有志创业的姐妹们！帮她们，就像帮过去的自己。于是，她找来十二个企业家朋友，直接找到了娘家人——妇联，表明了自己想成立一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想法，以实现其帮助农民兄弟姐妹创业的心愿。江苏省妇联在了解情况后十分重视，极力推荐，最后，在黄莉新副省长的直接关心下，在江苏省金融办的全面帮助下，吴江市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月16日获得了工商注册。

开业以来，吴江市巾帼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各级妇联的鼎力帮助下走出一条富有自己特色的路，在金融界脱颖而出。

“巾帼”特色：“四个一半”，即公司的股东构成中，女性股东占一半；公司二亿元的注册资本中，女性出资占一半；公司员工构成中，女员工占一半；公司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中，力争做到女性一半。

“三农”特色：“三农”贷款占总贷款90%以上。

“小额分散”特色：二万五千三百四十六点五五万元贷款中，覆盖了近四百个农户及中小企业。

“便捷”特色：借款人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二天就能放款。

“低门槛”特色：二万五千三百四十六点五五万元贷款中，一般保证贷款达到了巾帼创业专项贷款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万元，占89.32%，保证人有村主任、村书记，有教师、医生，还有小业主等。

“低利率”特色：二万五千三百四十六点五五万元贷款余额，平均贷款月利率只有7.5‰，而江苏全省已开业小额贷款的平均贷款月利率12‰以上，公司只有全省平均月利率的62.5%。

为帮助更多的妇女就业创业，公司与吴江市妇联联合推出了“巾帼创业专项贷款”，公司拿出一千万元专项资金，以更加优惠的利率，来帮助有志创业的农村妇女。至2009年12月31日，累放巾帼创业



巾帼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外景

贷款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一万六千元，余额五千八百四十五万元，最低年利率为5.31%。

吴江市巾帼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秉承了钱阿玲董事长真诚回报社会的意愿，节俭办事，公司免去了开业仪式，将节省的费用设立了巾帼帮困助学基金，以长期资助多位贫困家庭孩子，直至其完成整个学业。同年5月30日，又向苏州慈善总会捐款十万元整，委托苏州妇联和成都妇联定向对四川灾区妇女进行创业培训。9月17日又向江苏省少儿福利基金会捐款十万元，捐助盐城伍佑中学高中春蕾班，资助六十五名寒门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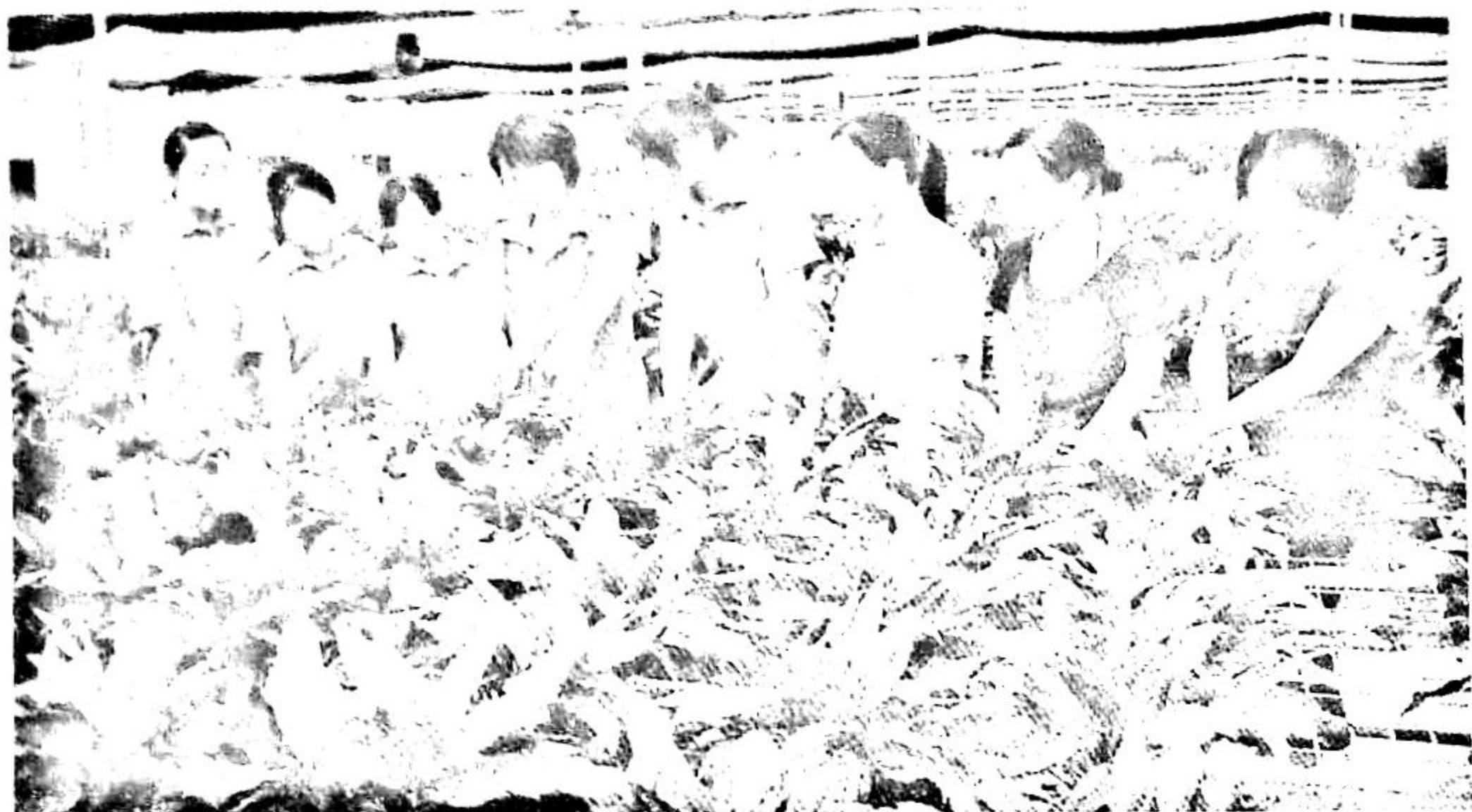
由钱可玲带头创办的巾帼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了吴江妇女工作的一张名片。

玫瑰园：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在平望，粉红色的玫瑰园，活跃着一批女大学生，在这里做着玫瑰色的梦。

苏州玫瑰园园艺有限公司由沈红英于2003年创办，其前身玫瑰园园艺场成立于1997年。现有合作户二百四十五户，一千亩的生产基地以及八万平方米的花卉市场，年交易额一点三亿元。公司下设苏州市玫瑰园花卉市场、苏州市花卉组织培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苏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平望玫瑰园花卉展示区、吴江市玫瑰园园艺场。

1992年，沈红英开出了第一家花店，开始了她与花为伴的事业。从卖花姑娘到农家养花女，从农家女成为“双富”女标兵，最终发展成一名成功的女企业家。在这期间，沈红英克服种种困难，朝着自己热爱的事业不断奋进。她走南闯北，收集各类花卉信息、到处拜师学艺；她不断学习，利用互联网承接绿化工程、宣传包装产品；她集思广益，不断拓宽生产营销思路、打开市场大门。她将“玫瑰园”做大做强，也造就了自己美丽的玫瑰人生。



沈红英（左四）在现场指导大学生

沈红英作为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和妇女姐妹致富。在玫瑰园产业扩大的过程中，公司在花卉市场内优先优惠把摊位承包给下岗、失业妇女，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主动招收残疾工人，为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在这基础上，玫瑰园又向高校和人才市场敞开大门，积极迎接有志女大学生的到来。几年来，玫瑰园共带动一百八十多名农村妇女从事花卉种植，已累计培训妇女五百多人，同时为农村妇女新增就业机会六百个。玫瑰园每年还邀请花艺师提供免费培训，将美和知识一起传授给妇女姐妹，将基地效应普及到广大农村。

苏州信息技术学院在玫瑰园挂牌成立女大学生实习基地后，通过召开沈红英的创业经验座谈会，开展“1+1”女大学生“同伴教育”牵手结对活动，分批总结女大学生的实践成效，玫瑰园成为了学院学生的第二课堂。

两年来，玫瑰园招收了三十多名女大学生就业，吸纳了一百六十



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泗（右三）为玫瑰园——全国女大学生实践基地揭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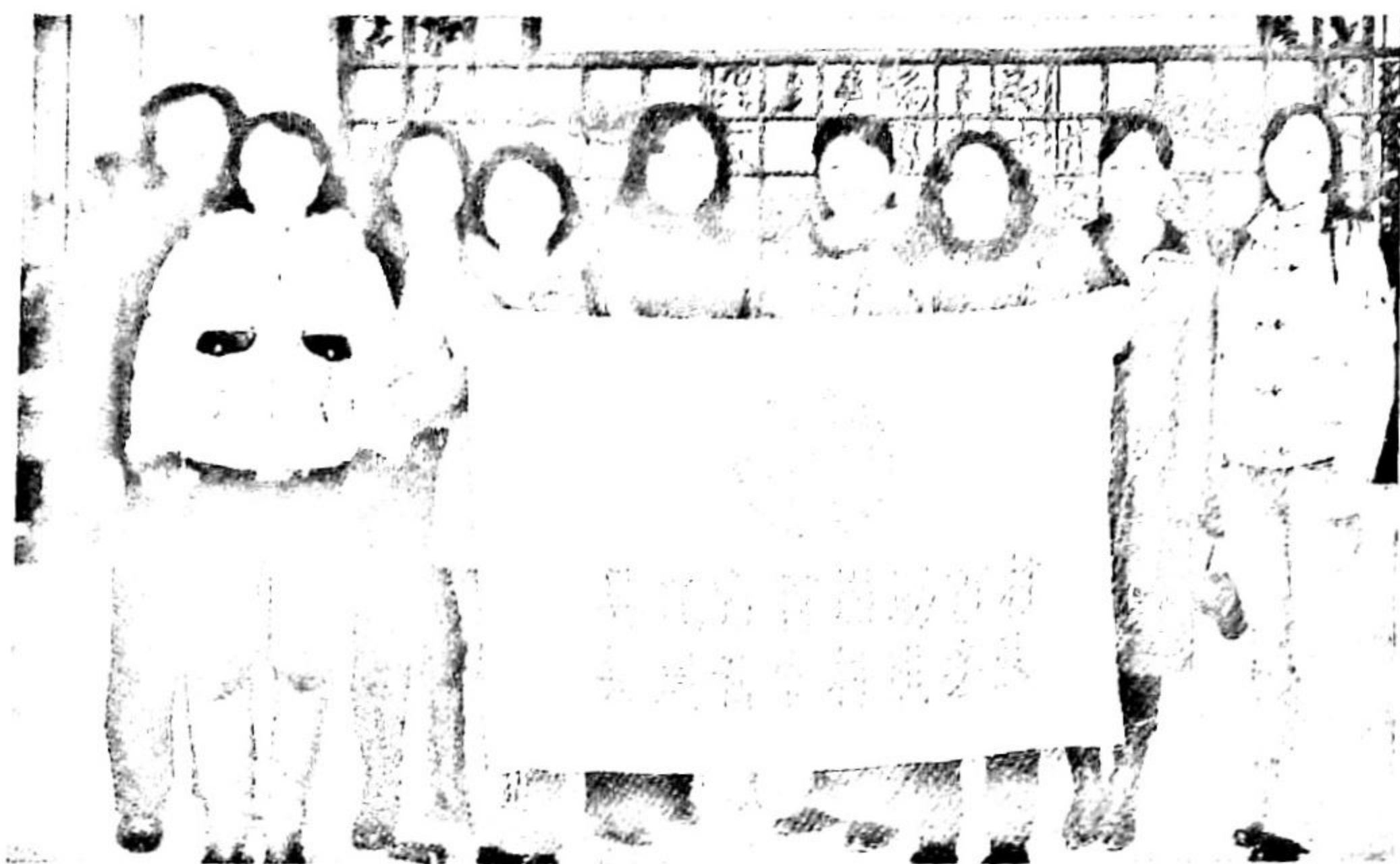
多名女大学生实习。在带教过程中，玫瑰园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将“玫瑰园园艺书店”作为书本学习教室，将种植基地和鲜花切区、插花区当做实践课堂，将种植、养护、花艺、销售、管理等知识经验，一一通过书本加实践的方式让女大学生领会，在实践中培养女大学生良好的择业观和职业责任感。有十多位大学生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

沈红英“赠人玫瑰”，将知识和经验带给女大学生、女农民和下岗女工，共同谱写创业致富之路。2009年，沈红英被评选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导师，玫瑰园成为吴江首个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并先后被授予苏州市巾帼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和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吴江市图书馆：首个全国“巾帼文明岗”

吴江市自1995年开始“巾帼文明岗”（原“巾帼文明示范岗”）的创建，吴江图书馆是全市首个全国级“巾帼文明岗”。

图书馆于2002年开始争创吴江市级“巾帼文明岗”，为此他们专门成立了创建领导小组，每年精心制定工作计划，并充分发挥广大岗员的积极性，让每一个人都亲身参与到创建活动中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吴江市图书馆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成功创建了苏州市级、江苏省级巾帼文明岗。2006年，吴江图书馆以新馆开放为契机，争创全国“巾帼文明岗”。创岗中，巾帼们时刻铭记自己的使命——图书馆工作人员是“知识的领航员”，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素质，真正担当起文明使者的角色。她们大力开展多种社会公益活动：精心组织策划每年一次的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承办“市民读书节”系列活动、大型读书知识竞赛；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教育活动，精心打造“垂虹讲坛”服务品牌；关爱弱势群体，开展盲人读者俱乐部活动；弘扬中华民族的敬老、爱老、尊老的传统美德，开展“重阳节，给老



全国“巾帼文明岗”岗员英姿

人送温暖、送欢笑”主题活动以及各种联欢活动；与吴江市司法局、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共同筹备组建“吴江市法律服务便民咨询站”等等。图书馆的巾帼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岗位奉献最大化。

图书馆全面推行以服务要效益、以效益促服务，对活动实行动态管理，做到服务有规范，行为有准则，考核有依据，奖励有标准，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妇女岗位建功的热情，在全市中帼建功各项竞赛活动中获得了荣誉。如“百岗助百村，建设新农村”主题实践活动“十佳服务队”、“争创巾帼文明岗，优质服务迎奥运”主题活动先进集体等，并于2007年2月成功获得了全国“巾帼文明岗”的荣誉称号。在吴江图书馆的示范带动下，2008年，吴江市318国道芦墟收费站、吴江地方税务局原涉外税务分局、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导游部一并成功创建了全国“巾帼文明岗”。

吴江市妇联“百”字系列寻访活动

如今，“家和万事兴”——“百”字系列寻访活动已成为吴江市妇联创建和谐家庭的品牌和抓手。

自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活动在全国开展以来，吴江市妇联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载体，开展了“百名孝儿女”、“百名好母亲”寻访活动，全市文明和谐家庭创建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

“百”字系列寻访活动，顾名思义，都是从“百”字上做文章，以“寻访”的方式，使更多的人知晓，让更多的家庭参与，促进家庭小和谐，共建和谐大社会。

百名孝儿女寻访活动，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拉开序幕的，旨在呼吁全社会特别是新农村家庭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孝道，寻访百名好母亲活动，则是在百名孝儿女寻访活动的基础上，对传统母爱、现代母爱和社会妈妈的内涵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索，进一步弘扬家庭美德，传承母爱文化。

寻访活动均以广议、寻访、颂扬为主线，通过“倡”、“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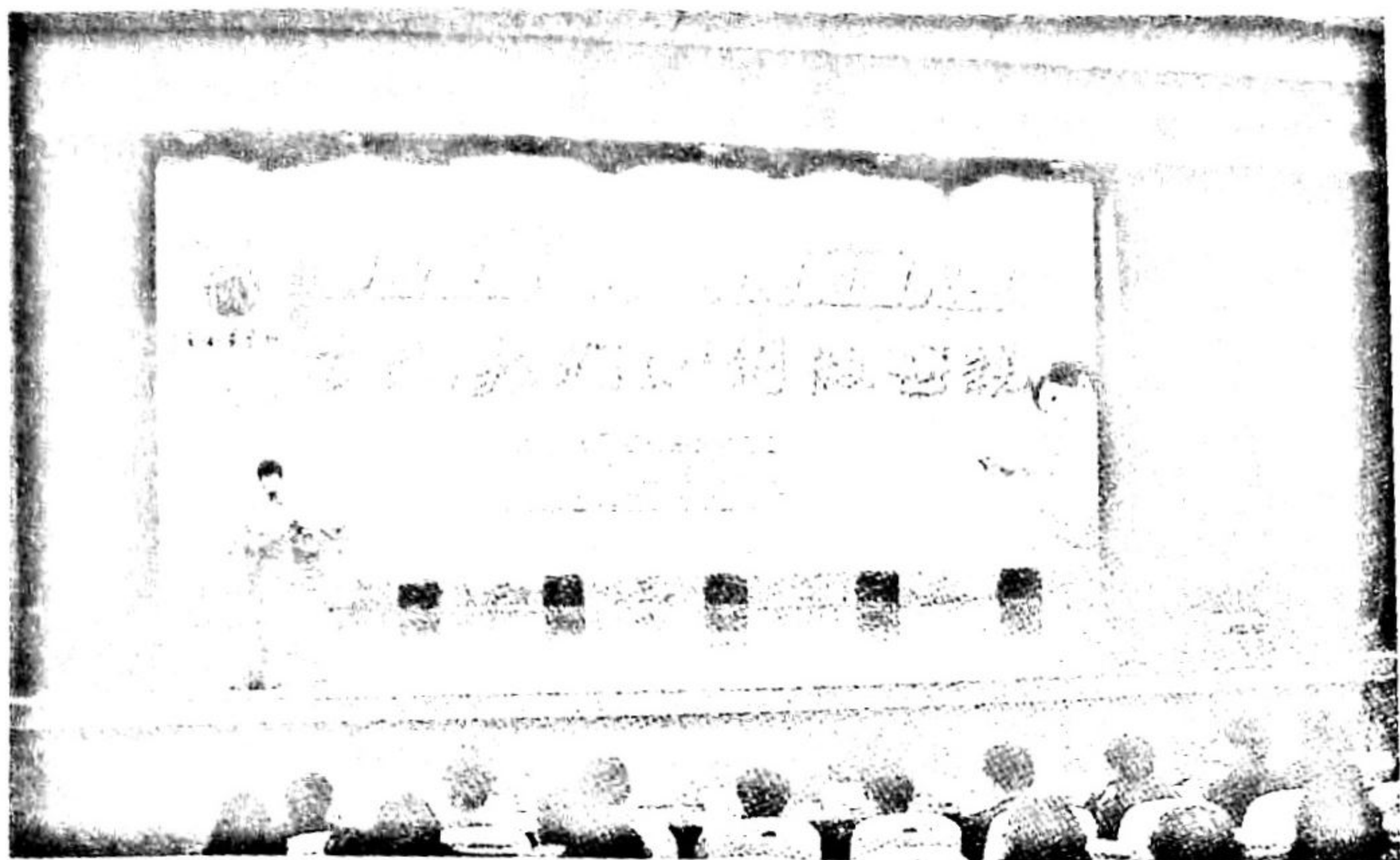


百名孝儿女表彰大会

“议”、“评”四个环节展开。

倡。通过《吴江日报》、制作海报、吴江妇女网等方式向全市的儿女和母亲发出呼吁，引起全社会的共鸣。从颤颤巍巍徒步到妇联提供情况的老汉，到专程骑自行车从七八里外赶来推荐典型的热心人，再到千里来信表达对母亲感恩之情的北京游子，“百名孝儿女”、“百名好母亲”寻访活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

访。市、镇、村（社区）妇联三级联动，整合媒体力量，深入全市各村、社区家庭广泛了解情况，挖掘典型。在每一份“百名孝儿女”、“百名好母亲”候选人登记表上都分别附上了晚辈和长辈的感言、子女和丈夫的感言。拍摄七都孝儿女朱付生和同里好母亲刘永妹的先进事迹时，都有村民自动围过来，拉着工作人员的手，说：“人民政府，你们终于来了，他（她）累了一辈子啊，真的不容易啊！”一个个孝儿女、好母亲寻访了出来，一件件感人的事迹也涌现了出来。



寻访百名好母亲启动仪式

议。市妇联联合吴江日报社分别邀请先进典型、专家、法官、妇女干部等社会各界人士举办了主题为“21世纪我们怎样来当孝儿女”、“珍视生命 感恩母爱”新闻沙龙。“百名孝儿女”寻访活动得到了《中国妇女报》的热烈呼应，历时半年在全国推出了“今天我们如何做孝顺儿女”征文讨论活动。寻访“百名好母亲”活动则是以开展“母爱有声”格言征集为载体，依托“江城女性发展论坛”，广泛开展“母爱大讨论”，得到了全市乃至外省市群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收到母爱格言二千余条，十佳格言在“母亲节”真情演绎。

评。寻访活动挖掘出了朱付生等一百零五名孝顺儿女和钮水宝等一百零六名伟大母亲。他们的事迹真实、可信，平凡、琐碎，但一件件、一桩桩都感人肺腑。比如演绎近半个世纪母婿情缘的朱付生、冲破世俗为婆做媒的邵小芳；比如用心抚育视同己出的四个侄儿女的韩素兰，用爱心创造医学奇迹的周煜沁等等，在对他们进行隆重表彰的

同时，市妇联也将他们的事迹编印成册，加大宣传力度。因为，“评”不代表活动的结束，而是扩大社会效应的开始。

“百”字系列寻访活动引发了铮铮有声的回音，营造了“美德新风吹遍鲈乡万家”的良好社会氛围。朱付生、石锦梅等典型纷纷被评为省、市级道德模范，寻访“百名好母亲”活动被评为吴江市“十大新人新事”，“百名孝儿女”寻访活动被评为苏州市“十大新事”，吴江市妇联被评为全国“美德在农家”活动先进基层妇联组织，吴江市被评为江苏省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县级先进协调组织”。

后记

为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这一国际盛事，集中展示我市妇女的精神风貌，我们选编了《芳雪疏香——吴江妇女史话》一书。

吴江历史悠久，吴江的妇女史也是吴江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一分子。古代的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拳”痛击，“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古代妇女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在与封建传统礼教的抗争中，吴江的历史上，涌现了一个个才女，一个个慈母：沈宜修、叶小鸾、柳如是、吴珊珊……成了吴江妇女的代表；在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主张都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实现，金松岑的《女界钟》、柳亚子等人创办的《新黎里》报、任传薪创办的丽则女校，张应春创办的《吴江妇女》……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郑佩宜、沈华昇、杨纫兰、殷明珠……站在了时代的潮头；而在吴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更有一个个巾帼英雄，一个个建设英豪脱颖而出。张应春、沈月箴、倪淑英、费达生、杨秀云、黄宝珣、杨德、柳

盛……是吴江的骄傲；沈宜宝、王瑞娟、范小青、王芳、梁懿、王娟……在新时代弄潮。多少人写出了可歌可赞的人生诗篇，在中国妇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我们收集整理编撰这本《芳雪疏香——吴江妇女史话》，意在通过这一则则故事，凭我们的微薄之力向大众传播，化成一种精神力量，给人们以启迪。编辑过程中，力求通俗易懂。

本书是吴江妇女史料集，由吴江市妇联主编，吴江市文联和作家协会协编，资料选自吴江以前出版的书籍、档案资料和网上查寻。在资料收集、整理、编撰中，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党史委、市政协文史委、市文广局、档案局、体育局、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吴江日报社等单位和李海珉、韦利红、朱建明、张舫澜、徐文初、陈志强、徐宏慧、朱晓红、沈昌华、黄亚倩、谈鼎保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市委书记徐明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专门为本书作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成书，这也是我们献给“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的礼物。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掌握的局限，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2月

史料主要来源

- 《吴江百贤思想品德故事选》 俞前主编 广陵书社，2006年
- 《莲子雨》 俞前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思鲈石》 俞前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平望史话》 倪海江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柳亚子传》 张明观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 《金松岑传》 徐宏慧著 2002年
- 《不可磨灭的记忆》 徐国平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2009年
- 《吴江与南社》 李海珉编著 吴江政协文史委，2009年
- 《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吴江分卷》 金明 徐惠民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 《中共吴江地方历史（第一卷）》市党史办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 《绸都赋》 李炳华著 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
- 《古镇黎里》 李海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 《毛嘯岑》 俞前著 吴江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2000年
- 《吴江英烈》 钱士坤 谢阿金主编 吴江县党史工作委员会、民政局，1992年
- 《血火鲈乡土》 袁一匡主编 吴江市教育局、党史工作委员会
- 《记忆》 蒋蕊娟主编 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
- 《走向卓越》 蒋蕊娟主编 王雪蕉等人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
- 《吴江名人录》 曹雪娟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 《张应春纪念集》 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吴江市政协文史委，1999年
- 《王绍鏊纪念册》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1987年
- 《同里》 陈志强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
- 《吴江县志》 吴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
- 《同里镇志》 同里镇志编纂委员会 广陵书社，2007年
- 朱萸文《午梦堂印象》
- 刘晓伟文《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位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叶小纨》
- 陈正卿文《特科尖兵王绍鏊》
- 朱建明文《大放异彩的吴江民国女性杨纫兰》
- 杨江波文《听退思园后人说园解事》
- 谢柏梁文《江南有幽兰——记王芳的艺术求索》
- 王仿子文《大姐黄宝珣与耕耘出版社》
- 张敬丽文《与潘玉良相伯仲的唐蕴玉》
- 曹鄂、余广彤文《费达生——我国乡村制丝工业的首创者》
- 张舫澜文《陆阿妹小传》
- 徐文初文《姚美凤的艺术生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芳雪疏香: 吴江妇女史话/孙虹主编.—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474-0095-1

I.①芳… II.①孙… III.①女性—历史人物—列传—吴江市
IV.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8960号

- 责任编辑 吴 兵
特约编辑 长 岛
装帧设计 长 岛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5×210毫米
 6.125印张 91幅图 80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